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梦与昼思/柳萌. —兰州:兰州大学出版社, 2003
(心海夜航文丛)

ISBN 7-311-02174-X

I. 夜... II. 柳... 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5442 号

心海夜航文丛·夜梦与昼思

柳 萌

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:8617156 邮编:730000

E-mail: press@onbook.com.cn

http://www.onbook.com.cn

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

白银恒贵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 12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51 千字

印数: 1~5000 册

ISBN7-311-02174-X

定价: 22.50 元

总 序

王春瑜(1)

往事今情

永远的愧疚 \ 3

关于雨的记忆与怀念 \ 9

家不再是个符号 \ 22

恩恩怨怨王府井 \ 31

饺子随想曲 \ 39

难忘草原那段情 \ 45

温馨的秋夜 \ 49

怎不忆江南 \ 52

北大荒风光和白桦树 \ 55

未摸过枪的老兵 \ 58

灯火的记忆 \ 62

路至远方有佳境 \ 65

囚禁歌声 \ 71

少年起步正当时 \ 76

雪落无语 \ 82

蓟运河恋歌 \ 86

难中拔牙记 \ 90



被关爱的小草 \ 97

101 \ 跟着足球一起风光

105 \ 两都步行街的黄昏

110 \ 富建胡同往事

背影侧身

119 \ 走近诗人艾青

126 \ 想起作家秦兆阳

131 \ 心静者寿高

133 \ 迟到的送行

138 \ 悠然自若一轻帆

143 \ 猜想张光年先生的遗憾

146 \ 好一尊“笑佛”

150 \ 幸福的高莽

153 \ “长大不”的老画家

156 \ 结识于苦难中的画家

160 \ “泥土”上的“苦难草”

165 \ 玩伴儿林希

172 \ 阳债难还阴界人

176 \ 巴山蜀水育诗情

180 \ 雨天的怀念

184 \ 卖“傻”不装“疯”



192 \ 冷观闲说高占祥

在歌唱艺术天堂里跋涉 \ 198

凡人智者陈木匠 \ 203

酒劲儿冲不走书生气 \ 208

大雅之声 \ 211

实在人冯苓植 \ 214

诗人的“酒论” \ 217

岁月欢忧

土地礼赞 \ 223

花潮漫地 \ 226

日子开始变得温馨 \ 229

福在哪里 \ 232

有友更是老来福 \ 234

好马自奋蹄 \ 237

鸡鸣报“好” \ 239

生活短章 \ 242

忘却有时也是一种幸福 \ 246

前方有车,身后有路 \ 248

西部不再遥远 \ 251

只要你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\ 254



永远铿锵的旋律 \ 256

259 \ 简单数字和复杂人生

262 \ 电视中的往事

冷暖景色

267 \ 何必非得吃“满汉全席”

270 \ 当“家”何必非要争“大”

273 \ 评点电视歌赛评委

278 \ 主编应该既要主又要编

281 \ 研讨会应该既要研又要讨

284 \ 畅游在“子夜星河”

287 \ 无心插绿的柳枝

289 \ 暑天

292 \ 闲说唐装

294 \ 另一种“鸟语”

297 \ 拿起背包就出发

微言轻语

301 \ 凡人说美二题

305 \ 在宜昌听“喊酒”

308 \ 称谓小事莫闲看

312 \ 平安大道随想



316 \ 笑声和好玩的忧思	
尊严与耻辱 \ 319	
冷静下来说奥运 \ 322	
哪儿来的那么多“国家级” \ 326	
评说与建议 \ 329	
自费出书与名社“宰”客 \ 334	
自找的“活该” \ 337	
朋友面前别摆谱儿 \ 340	
装修岂止是咬人的狗 \ 343	
掏掏城市“耳朵眼儿” \ 346	
世事评说 \ 348	
后 记 \ 373	



总 序

王春瑜

我将这套文丛起名《心海夜航》，并未深思熟虑，只是灵机一动而已。昨晚得闲，插上炉香，听着光盘里传出悠雅的古琴声，闭目寻思这“心海夜航”四字，觉得还挺耐琢磨。心者，思也，我国最古老的诗集《诗经》中《小雅·巧言》那一首，不就分明吟咏过“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”吗？虽说历代统治者实行牧民的愚民政策，总是想箝制、扼杀百姓——特别是士中有识之士的思想。但是，思想辽阔如大海，无边无际，永不停息地在激荡，在奔腾，在咆啸。中国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史足以证明，有出息的学者、作家，无一不是在心海中扬帆远航，中流击水。加盟本丛书的老、中、青三代作家，自然是概莫例外，或许以杂文鸣于时的牧惠先生、邵燕祥先生，更以思想敏锐为读者所熟知。夜航，同样令人遐想，令人神往。就以近三百年来的书史为例，同样叫《夜航船》的就达三部之多，最有价值的还是明、清之际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张岱（公元1597~约1689）所著小百科全书式的《夜航船》。他在此书的序中，引一故事，颇耐人寻味：“昔有一僧人，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。士子高谈阔论，僧畏慑，拳足而寝。僧人听其语有破绽，乃曰：‘请问相公，澹台灭明是一个人、两个人？’士子曰：

‘是两个人。’僧曰：‘这等尧舜是一个人、两个人？’士子曰：‘自然是一个人！’僧乃笑曰：‘这等说起来，且待小僧伸伸脚。’”这位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，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不具备，却有脸高谈阔论，而且倘一旦逮着机会，位居要津，肯定摇身一变，立马就成了大儒、文化名人。谓予不信，就看时下某些红得发紫、到处高谈阔论的“士子”好了，若问此辈澹台灭明是谁？恐怕不是张口结舌，就多半胡说是武侠小说里瞎编的人物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学而劣则仕，神气活现，像煞有介事。加盟本文丛的作家，皆饱学之士，我敢担保，倘若那位和尚活在今世，面对这几位，是难以伸脚的。

俗话说：“三世修来同船渡”。我与本文丛的作家一起心海夜航，是难得的缘分，虽说都是我的友人，但能同舟共渡，也并非易事。牧惠、邵燕祥、柳萌三兄，皆年长于我，他们的作品，风行海内，自然无需我说多余的话介绍。刘庆林先生虽是老报人，但杂文、散文俱佳，其长篇巨构《倾斜的年轮》，更是纪实文学领域揭露“文革”惨祸的优秀作品。伍立杨先生不断有散文佳作问世，享誉文苑，他的古文根基，更属难得。前年文学评论家袁良骏兄给我打电话，说：“伍立杨的古文很好，大概有七十几岁了吧？”其实他生于一九六四年。郭梅小姐是加盟本文丛的青年作者。但是，她写的可不是令人难以回味的小女人散文。她是研究中国戏曲史有素的女学究，治学、教学之余，写了不少散文，这次结集，能与她仰慕的几位前辈一起问世，她是深感欣慰的。这还是要归结“缘分”二字吧。

癸未年三月十九日下午于京华西什库老牛堂

WANGSHIJINQING

往事今情

倘若我仍然在内蒙古，得到母亲生病的消息，就是我日夜兼程地赶，最快也得走一天时间。路途上的劳累且不说，只是那焦急的心情，恐怕就很难承受得住。按照咱们老祖宗的说法：“父母在不远游，游必有方”，可是我总有二十多年的时间，因为“右派”的问题，不只是一直在远游，而且还多次中断信息，让母亲在痛苦的等待中，忍受思念和猜测的折磨。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家庭妇女，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母亲，她招谁惹谁了，在那个没有道理可讲的时代，却要陪着她的儿子受罪。这个世道对她实在不公。

路上，一边凝视着窗外景色，一边想着母亲的一生，我的心比列车的声响，还要沉重还要压抑许多。这时那些陈年往事，在我的脑海里，一幕一幕地闪过。尽管回忆有时是痛苦的，尤其是当年我正值中年，还不到应该回忆的时候，但是我仍然愿意承受痛苦，跟随母亲艰难的步履，走过风风雨雨的岁月。

我的老家是个县城，三面环水一面陆地，在北方算鱼米之乡。我们家四世同堂，曾祖母、祖父母、父母、叔婶、姑姑，一大家子十几口人。我是我们家的长孙，在家中属于众人宠爱的人，所以在我的童年时期，记不得有什么烦心的事。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但总还算说得过去，不然，我的三祖父和二叔，就不可能读到大学，我父亲和三叔及姑姑们，就不可能读到小学中学。至于家里靠什么维生，我就完全知道了，只还依稀记得小时候，祖父在外地一家商店，当掌柜的也就是现在的经理，我想那收入还是可以的吧。我父亲和三叔俩人，起初好像也是生意人。长大后看见过一张照片，足有半米

L. S. H. S. N. S. S. W. S. S. H.

心海
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多高的镜框里，镶着父亲年轻时的全身照，他穿着深灰色的西装，人显得很帅很精神。直到他后来落魄时，还保留着这张照片，想必是眷恋有过的得意。这起码说明父亲年轻时，经济上曾经宽裕过，倘若是个经济拮据者，哪里还有钱摆这个谱儿。所以我在懂事后，一直主观地认为，老家的男人好像有分工，谁将来得读书，谁将来做生意，我就想我也不会逃脱这个模式。

在老家的大家庭里，历来是曾祖母当家，老太太说一不二，我的长辈又都很孝敬，对于曾祖的话可谓言听计从。正是在这个家庭背景下，当我父亲突然失业后，不知怎么惹恼了老太太，她就把无名火经常发到母亲头上，母亲觉得实在忍无可忍了，在我的祖父母劝说下离开老家，带着我回到外祖母居住地，开始独立门户自己过日子。外祖母是母亲的后娘，两个人的感情并不好，不可能给母亲实际上的帮助，只是提供个落脚之地罢了，从那时起我就再很少回到老家。父亲呢，自然也就不好用家里的钱，他就跑到天津在商界讨生，我和母亲两个人住在乡下，靠父亲寄来的一点钱过日子。从县城乍到乡村，等于进入一个新天地，对于我一切都是新鲜的，很快就什么都适应了。只是觉得母亲变了，经常的自己发愣、叹息，认真地算计父亲寄的钱，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钱得省着花。”但是在我的吃上穿上，母亲从来还是很大方，比方每到过年过节时，我总能穿上新衣服，衣袋里也照样少不了零花钱。可是母亲她自己，就很少做新衣服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最多买一朵绢花戴头上，增加点节日的喜庆劲儿。这样的日子过了有几年，后来父亲的境况好了，把母亲、我和大弟接到天津，母亲这才不再为钱的事发愁。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舒心的日子未过多久，父亲又丢掉了饭碗，这时弟弟妹妹们，相继来到世界上，家里人至七口，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。待我参加了工作，每月六十多元工资，在50年代的中国，一个单身汉花不了，总可以寄二三十元，助父母亲一臂之力。谁知好景还是不长，突然降临的“反右”运动，一夜之间我被贬为贱民，工资也降了许多，给家里寄的钱就少了。紧接着就是天灾人祸，整个国家都在挨饿，母亲愁家里人吃喝，更惦记在北大荒劳改的我，吃不上喝不上还要劳动，不知瘦成啥样了呢？听家里人后来说，那时她都快“魔症”了，像鲁迅小说《祝福》中的祥林嫂，老是念叨：“不知你大哥（指我），咋饿呢？谁去救救他呵。”所以当我从北大荒回来，母亲借了许多肉票粮票，起早贪黑地去商店排队，买各式各样的食品做给我吃，说是补补亏欠的身子骨。她把好东西全放在我跟前，自己却舍不得轻易往嘴里放，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脸上不时闪过会心的微笑，仿佛比她自己吃还高兴。这时我就默默地想，不管世上的人怎样对待我，只要有母亲在，生活就会总是美好总有希望，我就应该坚强愉快地活着。

好不容易盼到我摘了“右派”帽子，表面上算是可以自由地走动了，这时又轮到两个小弟弟要上山下乡，母亲刚刚平静的心又开始不安。虽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，父母无权无势的子女别无选择，只能被赶到“广阔天地”里去，但是像我家这样两个弟弟，同时上山下乡的并不多见，母亲所受的心灵折磨，母亲所受的劳累辛苦，自然也就是双倍于别的人。

有一年的秋天，出差路过天津，顺便看望父母。我一走进家门，只见母亲独自一人，站在桌子前用菜刀切

肥皂，一条两块的肥皂从中间切开，然后把两块分放两个地方，那种认真劲儿真让人感动，我问：“妈，您这是干啥？”“给你下乡的弟弟呵，两个人不在一个地方，这点东西总得分开吧。”我一看可不是，不光是肥皂，桌上还摆着别的东西，像虾酱、虾皮、咸菜、针线，等等，她都是不偏不倚地平分开，或用瓶装，或用纸包，小心翼翼地一样样地打点好。这时我不禁看了看母亲，她眼角的细纹又加了许多，过去乌黑的头发明显变得花白，映衬出原来慈祥而安静的心，正在变得忧虑、憔悴和不安。人说儿行千里母担忧。在那样的年月里做母亲，岂止是担忧呵，对于远行多年的儿女们，还有着更多的无望的思念。

现在，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好了，儿孙们也都已长大成人，生活很少有什么难处。本该可以颐养天年的母亲，谁知却临近了生命尽头，如同一盏明亮的油灯，连需要积存的油都耗费了，还怎么让她再照亮呢？想到这些就越发觉得，生活实在太亏待母亲。她在天津住了几十年，算是真正的大城市人，她竟然连劝业场都未逛过，更不要说享受城市的欢乐。唉，简单地用一个“命”字来说母亲的这一生，难道能完全概括吗？

我和儿子到达天津时，正是早晨，上班时间，公交车人多车稀，实在没有心情等待。可是当时又没有出租汽车，只有私人驾驶的三轮摩托，不安全也好，是黑车也好，这时已经无暇顾及这么多了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爷俩总算匆匆忙忙赶到家。心想这回母亲可以得到安慰了，我们爷俩能赶过来，子孙们全都在她身边，这不正是她早就盼望的事吗？老年人希望的儿孙满堂，母亲早几年无条件享受，现在她病了能够看到，多少会让她

的心情好些。我在这样想。

当时母亲跟着三弟生活，我跌跌撞撞攀上楼梯，推开三弟家的门一看，迎接我的竟是一张冰冷的床板，端端正正摆在屋子中央。母亲平直地躺在床上，面容异常清癯，神情倒还安详，瘦小的躯体罩在新被下，仿佛是劳累后休息。放在床前的三炷香火，袅袅轻烟在屋子里缭绕，家中大小都穿着孝服，个个脸上都挂着哀伤。我一看就明白了，一把拉过来儿子，扑通跪在地上，给母亲磕了三个头。多少年从没有过的悲痛，像针刺似的让我撕心裂胆，禁不住地嚎啕大哭起来。母亲哪，儿子来迟了，您生前不曾尽过孝心，我就已经是羞愧万分；您现在永远地走了，走前又未赶上送行，这老天太不成全我了。

人的一生再做错事，有的都可以原谅，唯有对父母的不孝，无论如何是不能宽恕的。所以每每想起这次奔丧，我的心中立刻就会不安，总觉得对母亲有种歉疚。怕是永远永远都难以彻底解脱了。

2001年11月12日

关于雨的记忆与怀念

人生有四季，哪能无风雨

——题记

—

桂林。春天。早晨。

睁开惺忪的睡眼，朦朦胧胧地听到，窗外传来沙沙声。连忙披衣凭窗张望，葱茏密匝的暗绿色树叶，像低垂的浓浓乌云，遮挡住我的视线。用耳朵仔细搜索，那声音好像来自树丛，却又没有明显的摇动。真怪了，这“甲天下”的桂林，难道是在捉弄我吗？穿上衣服走出居室，到了楼门口才看清，原来是蒙蒙的细雨，轻柔而急促地飘洒，点点滴滴地落在树上，发出清脆匀称的声音。

莺雨难晴。看来一时半会儿，这雨是不会停歇了。虽说雨中游漓江，兴许会别有一番情致，但是总不好麻烦朋友，让人家陪我去淋雨吧。再说已经游过几处景点，跑了好几天也有点累了，索性在这雨天的桂林，美美地睡上一天觉，岂不也算是一种享受。

我泡了一杯茶，摆在硬木的茶几上。学闲适人饮茶的样子，先观赏碧绿的茶叶，在玲珑剔透的杯子里，漂漂浮浮地沉落。直到片片绿叶伸开，杯底铺成圆型绿茵，散发出阵阵的清香，水也显露出淡淡的清晕，端杯慢慢地呷了一小口，整个脾胃都感到舒畅。稍候片刻茶

渐渐地温了，这才倾杯一饮而尽，然后就钻进被窝儿。

谁知这雨，比起刚才，下得越发大了。雨点落在树叶上，声音自然就更响，如同一位多嘴的老女人，絮絮叨叨地说话，而且说的尽是往事，让我不得安静入睡。可能是受了这雨声的影响，我的思绪也滴滴嗒嗒地，回到早已经消逝的远年，唤来那关于雨天的记忆。

那是个初夏的下午时分，参加完一家杂志社的会，我和C并肩走进中山公园。临近黄昏的公园里格外清幽宁静，宁静得能够听到蜜蜂飞翔的扇翅声，清幽得能够听见彼此心灵的呼应，我们信步走在公园的林荫小路上。好像是不忍心破坏这宁静清幽的气氛，开始谁也不想多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往前走着，任凭草色花香浸润着各自的感官。

走着走着，迎面出现一张长椅，用手绢擦了擦尘土，然后并排坐在长椅上，谈论起彼此都喜欢的话题。什么高尔基的小说，普希金的诗；什么北图举办的文学讲座，人艺演员的诗朗诵；什么苏联生活题材电影，什么中央乐团星期音乐会，以及各自美好的青春梦想。说了多少话，谁也没有注意；说了多长时间，谁也没有理会。反正从天色尚明，说到天色转暗，我们还在不停地说着，仿佛都想起把积存多年的话，在这个夏天倾诉给对方听。

突然，一阵轰隆隆的滚雷，从遥远的天际扑来，震得四周都在战抖，跟随其后的是闪电，扯个云的缝隙跳起，放出短暂耀眼的光亮，紧接着是急雨顿时倾盆而下。我们赶忙跑到附近一棵粗树下，这棵树树叶浓密而蓬松，如同一把张开的硕大雨伞，遮挡住这突然袭来的雨。急促的雨声像震天的鼓点，敲打在厚实的树叶上，

增大了雨声的原有音量，用正常语调交谈很难听清，只能靠拢在一起说话，还得多少提高些嗓门。我们说着说着，这场不停歇的雨，拉近了晨昏的距离，也拉近了我们情感的距离。

雨终于停了，天空晴朗。公园里更显得宁静清幽，空气比雨前更加清爽，我和C都很兴奋。是这场雨让我懂得了，青春如何美好，生活多么宝贵，以及友谊和爱情，有着怎样的区别。这场雨对于我，是记录青春的雨，永远难以忘怀。

不期而遇的雨呵！让我对你说什么好呢？初尝幸福的果实，让我感到无比甜蜜；后吞刺心的蒺藜，让我难解苦涩人生。

就是从这个雨天开始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。

正当我沉浸于雨天给予的惬意之时，那场比自然界雷雨更凶猛的政治雷雨——“反胡风运动”，残暴而迅疾地劈头盖脸向我袭来，往日的宁静，过去的梦想，都被这场政治雷雨无情地击毁。到大学读书的机会，刚刚萌芽的爱情，一下子全都连根拔掉，只剩下无助的哀叹留在心中。我的情绪从此开始消沉，觉得世间太少宽容，对于属于个人的抱负和追求，这欠佳的世风都要蚕食，哪里还有青年人的个性和创造。我不愿意完全丢失自己的天性，更想保持住正直人的应有尊严，就依然我行我素地处事待人。这样的日子仅仅维持了两年。

两年以后，比前一场更为猛烈的政治雷雨——“反右运动”，再一次降临我的头上，而且比前次还要残酷，恨不得连我的肉体都要吞噬。从此以后，我就苟活于风风雨雨中，连昂头走路的资格都被剥夺，更不要说享有人的无尚尊务之急严。这场雨一下就是二十几年，渐渐

沥沥，大大小小，连我最后的希望都淋湿了。捱到政治天空雨霁风清，我可以无忧地抬头走路时，已是人到中年，赶上个好日子的尾巴，想多干点有益于国家的事，噢，这时又到了应该“退隐”的时候。

这就是我年轻时经历的雨天。此后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每当下雨的时候，总会想起1954年中山公园的自然雨，1955年和1957年那两场“人造雨”，它们给予我生命的欢愉与忧伤，常常会出现在无尽的痛苦思念中。即使是在四十几年过去的今天，在这远离北京的美丽桂林，在这春天绵绵的微雨中，想起1954年那个湿漉漉的夏日，我的心仍然还是潮润润的。这时我才真实地意识到，1954年那场记录青春的雨，还在我的心空上飘飘洒洒着。唉，多半儿是永远也不会停歇了。

二

今天出入北京的人，上下火车大都在新车站，如北京站北京西站，很少人知道南站东站，至于那座前门老火车站，甭说，那就更是鲜为人知。偶尔走过前门火车站，看到这座老式的洋楼，淹没在无数新建筑之中，我就替它感到愤愤不平。难道自然界的生存规律，都是像阔佬穿鞋似的，有了新的马上扔掉旧的吗？这种现实，实在残酷。就拿这座前门老火车站来说吧，可以说它是北京历史的见证，多少风雨沧桑都在它的记忆里。假如它会说话，我相信它一定会如实地告诉你，在它身边发生的那些或喜或悲的故事。

这是一个节日的晚上，看过百里长街灿烂的灯火，我信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南侧，目光不经意地掠过前门老车站，情感的绳索立刻牵出往日记忆。

1958年4月一个早晨，大批政治蒙难者流放北大荒，在雨中跟亲友告别的情景，此时仿佛又在我的眼前出现。我那时年岁不过20出头，还不曾有过离别的体验，就连离别的情景也是初见，真可谓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。因此在心灵上引起的震撼，当然也就比别人更为强烈。

那时候北京的街头，人少车稀，店铺零落，整个城市都很清静。就连人来人往的车站，都少有喧嚣的时刻，这天又是春雨蒙蒙，挡住不少远行的脚步，车站内外比往常更静。我们这批被称为“罪人”的人，别说是下雨了，就是天降刀子，让走恐怕也得照样地走，对于我们这些人根本没商量。中央各单位的“右派分子”，心怀忐忑，拖着行李，一个个从城里城外赶到车站，从这里踏上前程茫茫的驿站。除了像我这样家在外地的单身汉，一般有家室的人或北京当地人，大都有一两位亲友来车站送行，这原本清静的车站因有这些人到来，顿时显得热闹起来也沉重起来。

生离死别本来就是人生无奈事，谁摊上都免不了会伤感动情，何况这又是在非正常境况下分离，远行的“罪人”和送行的亲人，每张脸上都写着牵挂和惶恐。走的人年龄最大的不过50来岁，最小的也就是20来岁，从这样的年龄段来看，即使经受再大的磨难总还能扛住；送行的人年龄最大的有的已近八旬，最小的不过五、六岁十来岁，从他们这种年龄看，无论如何是没有多大承受力的。尤其是那些为人母为人妻的妇女，我真担心在日后的等待和歧视中，她们有没有能力应付这段艰难的日子。

这天早晨的雨，仿佛是老天故意安排，用这种方式表达怜悯，缓解人间的感伤与痛苦。不然怎么早不下晚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不下，偏偏在今天这个早晨下，而且如此缠绵悱恻，让每颗心都在流泪。倘若我是老天的话，我就痛痛快快下场暴雨，把积存多时的郁闷和愤慨，像骂街似的倾泻出来。那该多么畅快淋漓，有种男子汉的真气概。

我一个单身“右派”，肯定是无人送行的，尽管北京有几个朋友，有的已经划清界线，有的想来也不敢来，只能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在这车站随意走动。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抽泣声，以及这样的话语：“在外边自己多多注意，家里的事情，你不要惦记。”“我走后，你的日子会很难，老人、孩子全靠你了。”“记住，要按时吃药，病犯得厉害时，一定要去医院看。”“你一个人出门在外，要懂得照顾自己，说话时格外要加小心，千万可别再出事。”这些哭泣声和叮嘱话，我听了心情跟他们一样，忧郁压抑得就像这雨，点点滴滴不停地洒落在心田。

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世界上的事情，大概都有好坏和得失两方面，好事情都让一个人摊上似乎并不多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情感经历，在“反胡风运动”中无奈地戛然而止，当时也让我痛苦了许多时候，自此就再未敢考虑婚恋的事。现在我被流放到远方，没有任何情感上的纠缠，天大痛苦都由自己承受，哪怕上刀山赴火海都利利索索，这反而让我感到没有负担。这也许是一种阿Q心理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此时，比有家室的人，比热恋中的人，对我来说岂不是幸运。

离火车开车的时间近了，我们这些远行的人，陆续走进各自车厢。这时雨还在下着，只是没有人注意，道别声哭泣声，哗哗啦啦的雨声，汇成一部《悲怆命运交

响曲》，在我们的心中奏响。这支曲子一奏就是22年，比任何曲子响得都长久，留给人们的印象最深切，只可惜它并不那么伟大。它的作者当然更不可能，像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这些大师，让人们永远地怀有崇敬之情。

今天当我观望这前门老火车站，看见闪闪烁烁的似雨灯光，耳边立刻又响起那支乐曲，雨天离别的情景似在眼前。这人生世事真的像一部书呵，看前几页还在为命运叹息，再翻几页岂料是另一种结局。这样仔细地一想，被冷落的前门火车站，不过是一座老式建筑而已，又有什么价值呢？难怪你在默默之中忍耐。相信吧，我会永远记住你的，就如同难以忘记，1958年春天那场凄惘的离别雨。

三

雨，在哗啦啦不停地下着，十几个人居住的茅草屋里，除了漏雨屋顶落下的雨，溅在脸盆里嘀嗒嘀嗒的声音，整个屋子安静得让人想哭。我看了看屋子的周围，雨水在顺着屋檐哗哗地流，纸糊的木窗棂都湿透了，阴冷的潮气呼呼扑进屋里。跟我同室的这些难友，用棉被或披或卷地护着身子，唯有我一人只披着棉袄，我毕竟比他们都年轻。我好奇地看了看每个人，想弄清楚为啥这样安静。实在受不了这沉闷的氛围。

我们在北大荒已经劳改两年多，这样的日子何时会结束，好像连点影子都没有，人们的烦躁不安显而易见。不过总不能老是愁眉苦脸吧。依我的想法，在这阴雨天里，不用去外边劳动，正好可以休息，大家一起玩玩，美美地热闹一番，那该多好。现在一个个都这么静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处，真不知他们都在想啥，反正跟我想的不会一样。我这样猜。

我们睡的是个土炕，长长的一字排开，大家都正在炕上。

有的趴在被窝里，信封信纸摊在枕头上，八成又是在写家信，不然，那笔不会写写停停。自从来到这北大荒，让人最发憊的事情，就是不知如何写家信。把这里的生活说得再好，总觉得有违自己的良心，如果照实地讲述情况，又担心家人会更惦念，所以写信的时候就得“编”。第一次意识这种情况，是一位难友逝世后，在他的遗物中发现，他妻子写给他的信里，讲述的好几件事，跟实际对不上牙口，原来是这位难友，为安慰远方的妻子，说了些善意的谎言。看到这遗留的信件，有几个人都流了眼泪，他们说，真也难为他了，其实我们也是经常说谎呵，说谎总比让家人惦记好。

有的人披着棉袄，坐在炕上缝补衣服，手里粗长的针线，吃力地穿进拉出，那针脚足有一寸长，一看就是个老“力巴”。这也难怪了，在家的时候，不是母亲，就是老婆，反正有人伺候，像这种事哪能自己干。到这儿来则不同了，什么都得亲自动手。这让我不禁想到，我们刚刚来的那会儿，由于干的尽是苦重活儿，衣服每天被划破开缝，许多人不会用针线，会用的人也没时间缝补，十有八九都是用橡皮膏贴，或者用大头针别上。哪种德行别提多狼狈，所以被人称为“二劳改”，因为判刑的劳改犯穿劳改服，我们穿的衣服还不如人家整齐呢。

写家信和缝衣服的人，都在聚精会神地忙着，当然不会出什么声音，屋子里也就必然安静。还有两个人端

坐炕边，用棉被包着半个身子，面对那落雨的窗外，安然自在地饮酒吸烟。其中一位原是某报社记者，他经常这样自斟自饮，我们大家都早已经习惯，这次让我纳闷的是另一位，中央某部的一位仁兄，今天怎么也喝起酒来了，而且还边喝边唉声叹息，并不时地出现嘍酒声，多少打破点这沉闷的空气。出于年轻人的好奇和无聊，我凑到这位难友的身边，悄悄地问他：“今天这是怎么了，你也喝起了酒，是想凑热闹吧。”他看了看我，说：“你一个小光棍儿，有些事跟你说，你也不懂。”

我心想，什么事呵，我不懂，没那么严重吧。后来我听别人讲，前天他接弟弟来信，告诉他，妻子跟他离婚的申请，最近已经被法院判准，两个孩子判给他一个，他正在为孩子的处境犯愁。难怪在这阴雨天里，他独自在那里饮酒，原来是借酒浇愁呵。我一个光棍汉的确不很懂，不过听了还是能理解的，这种事放在正常人身上，都不是很容易承受住的，何况是身在逆境里的他。过些天他的情绪好些了，在地里一起劳动时，他主动跟我提起雨天的事，他说：“妻子要离婚，也就是个迟早的事，这我早有思想准备，我也不想牵累人家，最担心的就是孩子，怕他幼小的心灵受不住。”未想到一个大男人，还有这么深沉的情怀。原来在雨天里他想起家事。

别的人——写信的缝衣的睡觉的看书的，在这遥远的北大荒雨天，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呢？想起童年的无忧，想起工作时的快乐，想起常人的幸福，想起自己的“过错”，我想这些都可能会想到，但是有一点是绝对想不到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未来会怎样。就像屋外越下越急的雨，什么时候下，什么时候停，那完全要看老天的意

愿；我们头上这顶帽子，什么时候戴，什么时候摘，那要看主宰者的安排。我没有那么多的家事，在这百无聊赖的雨天，惟一想的就是自己的未来，成家不成家这是小事，关键是今后的日子怎么过，一想到这里我就没了情绪。干脆也钻进被窝睡阴天。

这场雨整整下了一天，除了如厕打饭不得不出去，其它时间大家都在屋里，一天的时光都是死一般的宁静，静得让人害怕，静得让人压抑。直到吃过晚饭，通知开全体会，这种沉闷才打破。雨却依然不停地下着。散会以后回到屋里，悄没声地钻进被窝，睡着未睡着谁也不知道谁，只是那雨声听得更清晰了，心情自然也就更烦躁。我想在这下雨的夜里，有人也许会作起梦来，这梦会是啥滋味呢？我不知道。反正一想起来总是觉得苦涩，即使是在平静的今天，仍然都会感到齿根发紧。

四

居住过的团结湖那处房子，是我实际上的第一个家，在此之前，一直过着有家无室的日子，那时有人问我家在哪里，总是支支唔唔难以回答。自从有了这处房子，这才算真正地有了家，感受到家的温馨与欢乐。那处称为家的房子不算好，可是在我来看却比皇宫还神圣，您想想看嘛，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汉子，婚后跟妻子分居16载，各住各的集体宿舍，各过各的“独身”日子，好容易有了属于二人的天地，这跟皇上登极有什么区别？反正我有种美滋滋的满足感。

这处楼房的门前有一排白杨树，高耸入云，挺拔屹立，像一列忠诚卫士守候在那里。进出它为我击掌，推

窗它跟我聊天。尤其是在微风细雨的夜晚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时，听白杨树在风雨中哗哗摇响，就像有人在絮絮叨叨地说话，立刻就会勾起我许多记忆。时光这时就会倒流，情绪这时就会复旧。搬进这座房子的情景，当时深嵌我的脑海，过去20年依然历历在目。

那是1980年的秋天，原来本不由自己掌握的命运，这时开始有了真正的转机，我可以按正常人方式生活了，就思忖着如何安置这个家。由于是第一次住楼房，不知道清洗水泥地板，不知道煤气灶怎么开，就连查水表都得问邻居，我也算土得快掉渣了吧。当然，这都是历史性的新式笑话，今天重提已经毫无意思，倒是搬家的那个雨天，给予我的狼狈与尴尬，恐怕是永远都难以忘记的。

记得小时候在家乡，人们迁居外出都看历书，择吉日良辰才行动。生活在今天的人，当然不再讲这些俗套了，听听电台的天气预报，找个风和日丽的好天，视情况安排迁居出行，总还是应该和必要的吧。可是久已习惯听从命运摆布的我，20年前根本未曾想到视天气好坏搬家，好容易有了一处新房子给我，就像怕被别人抢走似的，趁一个星期天找两位同事帮助，就风风火火地来了个急搬家。

那会儿还没有搬家公司，公家汽车想不到动用，搬家全都靠自己想辙。好在我的东西不算多，吃穿用的全部加起来，两辆三轮车就全拉走了。搬家那天天气有点阴沉，总觉得还不至于下雨，就没有任何防备，车就快要到达新居了，天空响起隆隆雷声，接着就是不紧不慢的雨，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。连拉带推地赶忙走，在新居门口停下来，人被淋成了落汤鸡，物被浇得如水洗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过，弄得我们好不狼狈。从三轮车上往下搬东西时，有的装衣服的纸箱子，被雨水泡得简直变了型，已经无法整个抱下车来，只好几件几件地倒腾衣服。狼狈之中又增加了一份尴尬。天气晴朗时光晾晒衣服就有好几天。

这就是多年无家的我，第一次安家的景象。过去了也就未往心里去。因为在我几十年的流放生活中，比这更狼狈更尴尬的事情，可以说是无法准计其数，这点区区小事不过小菜一碟，哪能跟有房居住的快乐比。

搬完家几天后的一天，单位领导来找我，说是有什么事要谈谈。这是我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后，领导第一次要找我谈话，虽说改变了“右派”身份，但是多年养成的“怕”性，此时又倏忽间袭上心头来，猜想是不是有什么新麻烦，去时走路脚步都很迟疑。见了领导看那和气样子不像有“诈”，这才一颗心完整地放进肚子里。他问：“家搬完了？”我“嗯”了一声做为回答。他又说：“看你怎么找个雨天搬家呵，听说把衣物都浇湿了。”我说：“光顾高兴了，就没想那么多。”他又说：“听说你连点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居家过日子这怎么行？我跟房管处打了招呼，卖给你几件旧家具，你到库房挑去吧。还有什么困难就说。”后来才知道是这两位帮忙的同事，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这么寒酸的人，出于同情就动了恻隐之心，把我的情况汇报给了领导，这才有了卖给我家具的事情。

听了领导的这番话，我的眼泪立刻涌出，一时不知应该说什么好。说实在的，“右派”问题改正时，我连个“谢”字都未说，更不要说感激涕零啦，这次的关心却让我很感动。22年苦难的贱民生活，除了被人像牲畜似的呵斥，有谁曾给过如此的温暖，就是为这次恢复人

的尊严，我从心底流出了感激泪水。因此这次的雨天搬家让我长久不忘，想起来就有种“春雨润物”的欣慰，不能不为赶上的这场喜雨高兴。那些狼狈和尴尬，自然也就不在话下，想起来反而觉得好笑呢。

记得是在迁入新居不久，一个秋雨绵绵的傍晚，我坐在新居的窗户旁，听冷雨敲打窗棂的唰唰声。这声音其实只是单调的重复，并没有什么悠扬婉转旋律，而在我听来却像一首美妙乐曲，让我的心灵感到无比畅快。这时我不禁强烈意识到，原来人的悲喜忧欢的情绪，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，更多时候是受外部影响。倘若我的处境没有改变，依然是地道的贱民一个，在这凄风冷雨的瑟瑟秋天，谁能说我不会感叹：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呢？

上边讲述的关于雨天的往事，不过是经历中的几个片断，无论是喜是悲都成过去，今天想起来都很亲切。人的情感有时就是这么古怪，甚至于还有点不可思议和理喻，当你生活在某个特定环境里的时候，因为喜悦而激动，因为痛苦而诅咒，把自己折腾得死去活来都不觉得，这时什么心思都会有什么蠢事都会做。可是一旦这些事情随着时间推移渐淡，一切的一切都会成为遥远的往事，再次想起来就会有着无尽的怀念。有过的怨怼会消解，有过的感动会减弱，就连心情都会归于平和，生命信念也会回到原始状态。我在回忆这些雨天往事时，尽管件件都跟命运相系，想起来有时会揪心撕胆，但是绝对没有丝毫当时的情绪。今天有的只是记忆与怀念——清晰的记忆，亲切的怀念。

2001年11月10日

家不再是个符号

总有许多年，说是有家，其实无家，家只在我的渴望中。那时我经常这样问自己：“家是什么？”我真的无法回答。有人说，家是情感的驿站；也有人说，家是爱情的巢穴；还有人说，家是痛苦时的抚慰；更有人说，家是欢乐中的笑声……这些浪漫的比喻，都是独自的感受，好像都有一定道理。可是对于我，那时候，家只是个符号。家真正成其为家，是最近20年来的事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了遮雨的房舍，有了煮饭的锅盆，一家人到了一起，只有在这时候，我才毫不犹豫地说，家就是家。可惜，这样的感觉，来得太迟了，这时我的儿子，都已经16岁。

—

我被划为“右派”时，不过二十几岁，属于“右派”中的小字辈，去北大荒劳改，到内蒙古流放，都是拿起腿来就走，没有妻子受牵累的苦恼，没有子女受影响的内疚，许多有家室的“右派”都很羡慕我们这些光棍儿。但是他们哪里明白，我们也有自己的愁事，这就是想成家而成不了家。在政治至上的年代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，都很难找到理想的对象，何况我们这些明码“右派”，就更没有谁肯于嫁给你。我还算幸运，到了而立之年，总算有了妻子，不再打光棍儿。

1963年结婚时，正是全民族挨饿的时候，没有钱是

自然的了，即使有一点钱，也休想买东西，还需要各种票证哪。当时，妻子在唐山一所中专任教，我在内蒙古一个工程队劳动，俩人都是住的单身宿舍，各自拥有一张木板床，还都是跟公家借用的。俩人商量了好久，在北京购了个“大件”——一台“美多”牌收音机，这就是我们的结婚信物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积攒了一些钱，又借了几张购物票，买几斤糖果、半斤茶叶，在妻子任教的学校，请了她的几位同事，像开联欢会似的，大家一起聚了聚，这就算是大婚之礼啦。有两位老师实在觉得素淡，临时找来红纸写个条幅，这“洞房”才算是有点喜庆。领了结婚证，举行了婚礼，从名义上讲，算是结婚了，可是实际上，依然是光棍儿。照样在食堂吃饭，照样在宿舍居住，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，这就是多了思念和牵挂，因为俩人相隔千里之遥，哪能没有思妻念夫之情。

1964年的春天，我跟随一支野外工程队，在腾格里沙漠劳动，突然接到家里电报，告诉我儿子出生的喜讯。本想立刻请假回天津，看望妻子和儿子，顺便也尽点人夫人父的责任，结果被上级一口拒绝。就这样欠下了妻儿情感债。妻子一说起来就有埋怨，今生今世怕是再也还不上，谁让那时我是个“右派”呢。儿子出生是件好事，我和妻子却犯了愁，俩人都是单身，又分居内蒙河北两地，谁带着都不方便，只好交给爷爷奶奶照看，三个人从此分居三地。所以那时有人问我：“你家在哪里？”我实在不好准确地回答。有时人家问得紧了，我只能含糊其词地说：“家在天津”，因为父母儿子都在那里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应该算是个完整的家。每年为了跟儿子团聚，我们夫妻俩的一点钱，全都扔在了铁

路上，就是这样，儿子跟我们，还是很生分。那时春节吃食凭票供应，有年春节到父母家，我刚抓把瓜子吃，儿子就说：“你别吃我们家的。”听后我的泪水险些流出来，为了儿子的天真，更是怜惜自己的命运。

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说法，结婚就算成家，我连儿子都有啦，当然更应该是有家之人。可是我的家在哪里呢？我跟妻子结婚后就分居，折腾许多年都调不到一起，这时候在我的心目中，家只是个娶妻育子的符号。

俗话说，夫妻二人，一个是秤杆，一个是秤砣，谁也离不开谁。我们结婚以后的数年间，每年一次的探亲假，每次12天的假期，那是我们的“七夕”。妻子在学校单身宿舍，有自己的一间房，我去她那里休假总还好说，总不会惊扰别的人。我在单位是仨人一间房，妻子要来我这里休假，就得提前半个月，跟同屋的人商量，请他们另找地方住。我们这对牛郎织女，匆匆地相会几日，被窝还未焐热就又分开，我们成了“假日夫妻”。

房子这时对于我们，只是个冷冰冰的空壳，它不曾有过家的温馨。有时也想营造点家的气氛，比如高兴了包顿饺子吃，把办公桌擦擦，就当案板使用了，没有擀面杖，就用瓶子擀皮儿，包出来的饺子味儿，总觉得不够纯正。像孩子作过家家游戏，想体验家庭生活，却没有真正家的味儿。所以那时我最喜欢唱的歌曲，就是那首洋歌《可爱的家》，只要是独自一人时的时候，我就会悄悄地轻轻哼唱：“纵然游遍美丽的宫殿，享尽富贵荣华，但是无论我在哪里，都怀念我的家。”用这首少年

时代学会的歌，寄托我对家的无尽思念。

就这样日复日年复年的数日子，家这个符号，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六七年，希望它能谱出美妙的乐章。谁知它依然像水中月镜中花，只能在情感上给与享受，却不能称为实际拥有的家。看来依靠别人，哪怕是所谓的组织，都难以成全我，只有自己靠自己了。我决心跟妻子调到一起，有个实际的家，结束这两地分居的生活。

我的亲人都在内地，要调当然得我调，首选之地，一个是天津，一个是唐山，理由很简单，我生在这片土地上，祖辈都在这里生息，谁不愿意离家近些？可是一联系才知道，原来我这理由，根本不是理由，联系单位无一例外，非常干脆地回答：“你是摘帽‘右派’，我们不便安排。”噢，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这顶戴了多年的帽子，仍然在起着专政的作用，如同孙猴儿头上的紧箍儿，只要有人一念就会让我头疼。

得，既然咱是另册之人，就别往正常人堆里挤，于是跟妻子说：“你既然嫁给了我，两个人总得在一起，我调回来有困难，干脆你就调内蒙，将来有机会就一起回来，回不来就在边疆呆着。怎么还不是一辈子。”妻子总算通情达理，愿意跟我调到内蒙，谁知正在联系的时候，中国大地上刮起“文革”妖风。原来能不能调到一起，尽管没有什么把握，但是做为向往和希望，毕竟还能给人以安慰。倘若连这样的诱惑都没有了，这个世界就实在太可怕了，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然而，谁知这样可怕的事情，竟然说来还真的来了。

三

这场以破坏为目的的运动，把个好端端的国家，一夜之间搞得天翻地覆，毁坏了人间所有美好事物。中国的无数家庭如倾覆之巢，一些人有家难归，一些人守家哀叹，被抄家的人说：“要是没有家多好啊，他们想抄也抄不成。”可是有家的人哪里知道，我这个没有家的人，连对家的一点渴望，此时都被扫荡殆尽。

我和妻子都被关在“牛棚”里，时时讲天天讲的“阶级斗争”，使我们如临世界末日。妻子所在的学校的学生，在个别教师的唆使下，以莫须有的政治罪名，对妻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，险些在那场灾难中丧生。我是个“右派”死老虎，不好再折腾什么新花样，反正也没有安生的日子过。俩人从“牛棚”里放出来，我风尘仆仆地赶到唐山，本想跟妻子团聚几日，享受点劫后余生的欢欣，到了那里才知道，这时妻子连宿舍都没有了。我们在教室里拼几张书桌，搭个临时睡觉的窝儿，有天三更半夜睡得正酣，坏学生往教室里扔石头，差点砸中我们俩的头脸。这时我不得不暗自感叹，要是有个家多好，我们总可以避避难吧。

“文革”后期经过学习班审查，又经过五七干校劳动锻炼，最后把我分配到集宁市，而且是在《乌兰察布日报》当编辑，生活相对安定了许多，我就劝说妻子调内蒙，以免“三四年来一次”的运动，我们就更没有机会到一起。就这样，我们这对一直分居的夫妻，在唐山大地震前半年，总算调到一起生活。倘若没有这个机会，妻子仍在唐山的话，从地震的时间上推算，我和儿

子正都在唐山，我们这个家很可能被毁灭，幸亏有老天的可怜保佑。这时我们人是调到一起了，可是仍然没有房子，就住在报社办公室——这就是我们奋斗多年，所拥有的没有正式房子的家。

没有正式房子住，是不是有什么家具呢？从我来说，除了公家借给的木板床，再有就是两个纸肥皂箱，用来放几件换洗的衣服，还有个帆布作的手提包，用来存放自己喜欢的书。妻子的情况，似乎比我要好些，有个掉了漆皮的板箱，还有个粗柳条编的箱子，用来存放比我要多的衣服，以及读大学时用过的教材和琴谱。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“镇家之宝”，别的值点钱的东西，就是那架“美多”牌收音机，以及妻子骑的女式自行车。

把我们俩人的这些物品，通通地放在一起，勉强算是家档，难道就有家的模样了吗？我不相信。我没有过家的感受，却有过对家的观察，家中的物什，总得有点家味儿，就连家庭扔出的破烂儿，都是别处代替不了的。我们的家仍然像个宿舍。报社的一位同事实在看不过，自作主张帮助定做两个板箱，用优惠价给我买回来，又有朋友代买一张桌子两把椅子，这屋里才好歹算个家，尽管房子是报社办公室。

四

好在老天有眼地不绝人，1978年枫叶泛红的时候，我的“右派”帽子还未真脱，就从内蒙回到了北京。这里是首善之区的福地，是我年轻时起步的地方，是我事业开始的地方，尽管在这里我倒了霉，后来被发配北部边疆，但是北京对于我，仍然有着难以抵挡的魅力。从

地域上讲距亲人们近了，从发展上看有了回旋余地，只是回来了不等于有了家。那时我被借调在《工人日报》社，除了在单身宿舍有张床，周末回去住住，更多时候都是在文艺部办公室，拼几把椅子当床睡觉，一来是值夜班方便，二来是图个起居自由，这时连作梦都是关于家的。

家对于我真正成为家，而不是符号，是在1980年。

在这一年的秋天，我的“右派”问题改正了，妻子调来北京，儿子上了高中，我们有了两间楼房，有了简单生活家具，有了自己的户口本，户主一栏上写着我的大名，这时才有对家的真实感觉。这感觉就像一块磁铁，无时不在吸引着我。那时我在《新观察》杂志社供职，杂志社地处王府井闹市区，有的同事下班就随便逛逛，我是下班就赶紧往家跑。是什么东西在等待我呢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想往家里跑，觉得在家里呆着舒服。有时跟妻子一起去逛公园，都要老远地跑回家吃饭，这并非是舍不得钱，俩人多年都在集体食堂吃饭，实在吃烦了吃腻了，就想吃家里做的饭。偶尔跟朋友同事聊天儿，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说：“过去打光棍儿，不知家的滋味儿，如今有了家，才知道有家真好。”

可是由于长期无家，有了家却不会住。当我拿到新房钥匙时，觉得这两室一厅的房子，简直比小礼堂还敞亮，我们急不可耐的想住，只是简单地扫了扫，洒了洒水，就匆忙地搬进去了。事后才发现水泥地上，还残存着不少灰块，窗框上沾着零星灰点，更不懂得房屋装修。为了享受这家给予的欢乐，没有买床就先席地而眠。我和妻子望着天花板，看着窗外投进的斑驳月影，想起过去近于流浪的日子，这头一个夜晚谁也未睡好。俩人的目光偶然相碰，笑而无语又胜似有语，仿佛都在

探问：“你说，这是真的吗？”只有我们这对中年夫妻，相拥着满屋里跳起舞，表达有房的满心喜悦时，这时才切实感到是真的。我们的的确确正在属于我们的家中。

几天之后两位同事来串门，觉得我们屋子非常宽敞，再仔细看看才忽然发现，屋子摆放的只是几个木箱纸箱，原来连件必需的家具都没有，经他们跟领导反映，机关房管处以处理价，卖给几件旧桌椅箱柜，这家才算多少像个家了。我又花几十元钱，买了一套简易沙发，摆在紧靠窗户的屋角，这家就更显得神气了。同样是改正“右派”的一位外地作家，那时他正想办法往北京调，有天来到我家，颇有感触地说：“我能有这么一套房子，就好了。”后来这位作家，混上了较高的地位，当然也就有了更好的房子，他当时的感慨，如今早成了历史，恐怕今天连提都不想提了。我们这所房子是管道煤气，由于没有见过煤气灶，不知道怎么点燃，划着火柴晃了许久，找不到喷火灶眼儿，后来请邻居帮忙，这才知道没有推开阀门儿。

五

我和妻子婚后两地分居16年，我们的第一个真正的家，在1980年就这样建立了。而这第一个家的所在地，就是在新住宅区团结湖。在粉碎万恶的“四人帮”不久，国家百业待兴经济并不富裕，首先拿出钱来给老百姓盖房，我们做为首批新房受益者，思无家时的苦恼，想有家时的幸福，心里有着多少要说的话呵。

当我们又有机会，在单位调换新房时，这一晃又是16年。新房无论是地段还是布局，都要比老房好上许多倍，可是在要不要搬家上，我和妻子合计了好久，两个

人的意见才算一致。从理智上讲当然住新房，在感情上又舍不得老屋。留恋这住了16年的老屋，不能说没有“故土难离”的成分，以及难变的长期居住习惯，但是主要考虑的恐怕还是，这老屋毕竟是我们第一个家。这第一个家，表明我苦难命运的结束，宣告我漂泊生活的终止，它如同一道温暖的港湾，使两个奔波多年的疲惫身躯，在这里得到只有家才会有的安抚。

然而，人的向往和追求，又常常是变化的，最后，我们还是迁入了新居。这新居的条件比起老屋更好，妻子有了琴房，我有了写作间，而且几个房间全部朝阳，即使在寒冷的冬天里，都觉得暖洋洋地如春日。这个小区的大环境也不错，尤其是这里花草树木多，不说是四季都有绿色，起码不像别处那么荒败。像我们这样过去居无定室，多少年盼望有个家的人，到了中老年总算圆梦，个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。

最近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，我们把这套房子买了下来。以我和妻子两人的工龄总合，再加上妻子做为教师的优惠，应该说花的钱并不算多，我们的经济情况可以负担。两个人未假任何思索，就决定了这件大事，而且心里也踏实了。干了一辈子，漂泊一辈子，最后，总算有了栖身之处，我们感到非常满足。只是一想起那些无家的日子，想起几十年来的苦难历程，借用现在流行的“精神损失”说，对照我们的得与失，又多多少少有些想法。我们的“青春损失”，我们的“身心损害”，又是多少金钱可以赔偿的呢？这么一想，这套称为家的房子，它的价格太贵太贵啦。这时在我的思想里，家又变成了个符号，一个含“金”量很高的感叹号。

1998年12月20日

恩恩怨怨王府井

名声赫赫的王府井大街，告别百年老旧，走向现代文明，成为一条漂亮的步行街。

在它开街不久的一天，沐浴绚丽的晚霞，坐在一条长椅上，我静静地观赏街景，心情却像店铺里的灯火，忽明忽灭地跃动着。从我身边走过的行人，神情悠闲，步履散漫，随意地在这条街上徜徉。哦，这时我多想也有这样的闲情逸致，享受这难得的无忧无虑清福，可是无论怎样努力却很难做到。对于王府井大街的回忆，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，死死地压在我的心上，不管我是挪动还是不挪动，它都会使我的神经疼痛。王府井大街呵，是一条与我生命攸关的街，只要置身在这条街上，我的心就不可能平静。

从听说王府井大街改造那天起，我就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它，希望早日一睹它的新颜。有时在媒体的报道中，偶尔知道它的消息，脑海里的记忆波涛，马上就会不停地翻腾，有时还会伴有无尽的遐想。那天去人大大会堂开会，车正好从王府井经过，看着施工的繁忙景象，惊喜同时又颇感不安。既希望它有崭新容颜，又惟恐它的原貌全非。

如今的王府井大街，可以说是今非昔比，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。新建筑如东方广场、新东安市场，气势恢宏清爽，透着一派勃勃的现代气息；老商店如盛锡福、东来顺，名号未变门脸却很讲究，仍然保留着古香古色

的面目。至于街道花卉铺地，街饰点缀错落有致，更是老街无法比拟的。从整体上看还算有些特色。

对于只来购物闲逛的人，今天的王府井大街，无疑是个不错的去处。然而对于像我这样跟王府井大街有过千丝万缕关系的人来说，却是人生日记沉重的一页，什么时候哪怕轻轻翻阅，都会有着刻骨铭心的伤痛。无论它的面貌变得多么新艳，我的记忆仍会带着往日沧桑。

可以说，活到这把年纪，逛过的商业街，应该说不算少。那么，为什么单单对王府井大街，让我如此关注和钟爱，它的哪怕很微小的变化，都让我这样牵肠挂肚呢？我想，这跟我与这条街的缘源，恐怕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
最早跟这条街结缘，是在40年前，缘起是王府井书店。那时北京的书店不多，像摆布在棋盘上的棋子，全城这一家哪一家，书的品种也不多不全，就近选书购书极不方便。唯有王府井大街上，聚集着多家书店，如新华书店、外文书店、美术书店、音乐书店、古旧书店、内部书店，等等，而且书的品种也齐全。要想看新书买新书，就必须得去王府井，久而久之，王府井大街上的书店，自然就成了读书人的宝地。假如说，年轻时候还算读了几本书，积累了一点点各种知识，我得好好地感激王府井，正是它那里的书店用智慧钥匙，启开了我蒙昧的思想大门。但是，对于给过我知识的王府井，过去我却又常常有所怨怼，因为我的政治恶运和生活遭遇，同样是从在王府井购书开始，思想上难免会打上宿命的情结。

那时我正是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，像许多同辈人一样单纯正直，对于未来充满着天真理想，希望通过自己

的努力增长才干。所以一有时间就往王府井书店跑。我那会儿正迷恋着诗歌，见报纸新书预告上刊登，鲁藜的《星之歌》诗集出版，在附近书店问过几次都未到书，就又想到了王府井书店。跑去一看，果然有《星之歌》，摆在书店柜台上，就买回来一册。

这册买回来的诗集，我习惯地放在床上，还未来得及看，“反胡风运动”就开始了。因为我喜欢诗歌且在学习写作，又有俩位跟胡风沾边的朋友，我所在单位就拿我当靶子，对我进行政治审查和思想批判。有个同公寓的人来过我屋，见报纸上被点名的人中有鲁藜，他就表现一次“进步”，悄悄地向领导打小报告，说我有一本鲁藜的诗集。这在斗争至上的那个年代，没有理由都可以整人哪，何况我还多少搭点界，自然也就会在劫难逃了。斗争组织者依据这些“罪证”，又是批判又是审查，狠狠地把我瞎折腾了一通，恨不得从我身上创建功勋，最后却因为找不出“硬货”来，不得不无奈地放我一马了事。但是以组织的名义干的事，总不能让组织丢面子，就给我下了个结论：“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严重”。

这样一顶非政治性的帽子，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，可是在极左风行的50年代，即使压不死你也得焖蔫你，反正不能让你有好日子过。我就是在这顶帽子的捉弄下，失去了到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，同时经受了一次爱情打击，从此，情绪开始消沉，理想开始破灭，原来满以为宽广美好的前程，现在变成了狭窄暗淡的景象，生命之火再也燃不起欲望。如果不是轻轻的年纪支撑着，我单薄的躯体恐怕早就垮塌，哪里还会忍受度过那段艰难？！这就是王府井大街，跟我的第一次孽缘，从此以后再无幸福可言。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有人说，性格决定命运。此话，绝对是真理。我这个人的性格，就是大小事较真，只要自己认为有理，你再压再整我也不会服，有机会我就要表白。1955年“反胡风运动”，我被好没样地整了一通，读书和爱情都遭遇重创，我当然要时时耿耿于怀，连这样的命运大事都不介意，那还叫有血有肉的男子汉吗？所以在1957年共产党整风，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真话时，我对自己被无端批斗的事，真诚却激动地说了些看法，结果又酿成了更大的灾祸。1957年“反右”运动中被划为“右派”，由一个正常人沦为政治贱民，从此离开北京离开王府井，过起了流放人的无望生活。在北大荒劳改的那些日子里，有时想起北京自然就会想到王府井，以及那些有关王府井的往事。偶尔跟一起劳动的难友闲聊，说起王府井时常常有人问我：“如果有一天可以到王府井的话，你最想去的是王府井什么地方？”我几乎未假任何思索地说：“先逛逛王府井书店，然后就到大华或红星，看一场新上映的电影。”

结束了北大荒的劳改生活，又转手被流放到内蒙古，从地域的距离上来说，内蒙距家乡天津要近得多，而且从天津到内蒙，或者从内蒙到天津，都必须得在北京换车，这样在每年休探亲假时，我总会两次经过北京。当然也就有机会再逛王府井，只是次数再没有过去那么多，时间再没有像过去那么从容，我成了王府井的匆匆过客，感觉和感情都是异样的。尤其是想到在北京的那些日子，我的内心立刻会涌起淡淡苦涩，像初冬早晨的薄雾笼罩在心头，许久都无法完全挥之而去。这时的王府井，这时的书店，就如同两个“冤家”，我真是又爱又恨呵。可是下一次再经过北京时，哪怕有一点宽

裕的时间，我又会下意识地移步王府井，在对现实的感受和对往事的回忆中，重新去承受爱与恨的再次折磨。真的没有办法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所在的野外工程队，刚从东北施工完毕，回内蒙路过北京时，换车要停三个多小时，我就从车站信步走到王府井。这中午时分的天气又热又闷，热得我嗓子都快冒出烟了，就走进一家书店旁的冷食店，买了一杯冰激淋，正想找个座位坐下吃，忽然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，我不由地寻声看过去，呵，正是那久违的听过的声音。还好，他跟和他说话的人，并未发现我在旁边，我赶紧拿着冰激淋，像小偷似的匆匆走开。这是我被划为“右派”后，离开北京多年回来，第一次遇见熟悉的人。自从被“阳谋”政治套住以后，我真的不想看见相关的人，更何况这次在冷食店看见的这位，是跟我曾经有过非同一般关系的人，后来在政治运动中被迫跟我绝交，倘若我们两个真的四目相对，无论是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那该会是多少尴尬。

人在自己一生的经历中，会遇到许多这样那样的事，会认识许多这样那样的人，这都没有什么关系，要紧的是永远要记住美好的人和事，只有这样才会保持住一个美好心态。有了这个美好的心态，碰到什么艰难经历什么坎坷，都不会失去生活的勇气和信心。

不知是命运的安排，抑或是生活的巧合，我跟王府井大街，好像有种冥冥缘分，不止是绕不开走不脱，而且还越凑越近乎。当22年之后流放归来，我供职《新观察》杂志社，居然就在王府井大街上，从此我成了王府井的街民。那时杂志社办公条件极差，几间简陋破旧的小平房，除了必要的书橱办公桌椅，别的东西都很难放

下，连主编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，我们这些人就更是大家挤在一起。中午吃完饭没有地方休息，也不能老是泡在屋里，这王府井大街上的店铺，就成了我们经常光顾的所在。尤其是街上的几家书店，几乎天天都要去上一次，几下年来，营业员都觉得面熟，看见了都要点头示意。我这时在王府井上班，天天都要进进出出这条街，虽然在表面上不像过去那么激动，但是一想到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事情，感情上依然沉浸在剪不断的状态，内心深处时不时地泛起莫名的情绪。这时我才真切地意识到，尽管时光悄悄流过22年，苦难早让我的心结老茧，原来这王府井大街呵，却还在不断地折磨着我。

我在《新观察》杂志主持时事杂文版，这是这家杂志的重头版面，直接评说政治时事和社会生活，是个让读者喜欢让官员讨厌的栏目，闹不好还会给杂志社招致祸害，所以我经常处在忐忑不安之中。杂文家、漫画家大都目光敏锐，思想深刻，而且对于社会不良风气敢于直言，我负责这类稿件也就决定了我的命运，这期间零星的麻烦不断，好在当时政治气候不错，杂志社的领导又能扛住，我适当做些说明交代，差不多都能够化险为夷。惟有一事差点酿成大祸，这就是组织发表白桦文章《春天对我如此厚爱》。

事情的经过和动机，其实非常地简单，绝不像有人想的那样。那是在电影《苦恋》上映之后，全国文艺界掀起批判的浪潮，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借机反华，说作家白桦被官方如何如何了。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，白桦所在单位写了一封信发在《北京晚报》上，介绍白桦的工作生活近况。我看了这封信以后，觉得这毕竟是间接介绍，还不能完全让人信服，最好让白桦自己写文

章。因此，在杂志社讨论选题的时候，我建议约一篇白桦的文章，并且封面上给白桦发张照片，这样会更有利澄清事实。当时恰好主编戈扬去了外地，就由杨犁和张凤珠二人拍板，指派我向白桦联系约稿拍照，杨犁时任副主编，张凤珠时任编辑部负责人，主编不在就是最高领导，对他们能够当即决定很钦佩。我立即给白桦打长途电话联系。

我是1978年认识白桦的，跟他算是老熟人了，我把情况一说，他就爽快地同意了。没过几天就寄来文章，这就是那篇《春天对我如此厚爱》，发表在1981年第14期《新观察》杂志上。后来白桦从长春来北京，我陪《新观察》杂志美术组组长潘德润，在东单公园给他拍了张照片，只是最后没有在杂志上用出来，却留下了一段文坛往事和“老照片”。白桦这篇文章发表后，读者的反映还是积极的，我感到如释重负的轻快，就打算去北戴河休假。当时中国作协正组织作家们在海滨避暑。

在我动身去北戴河的前一天傍晚，我和妻子正在家里做晚饭，突然听到有人急促地敲门，我拉开门一看是主编戈扬。待她在沙发上坐定后，我给她倒了一杯茶，这时她拿出一张纸条给我看，是当时负责宣传的一位领导写给冯牧和戈扬的，大致意思是批评《新观察》，不应该发表白桦的文章，并让杂志社消除影响。主编戈扬问我怎么办？我当即提出两个办法，一是请这位领导人写文章，亲自阐述他的看法；二是由杂志社派人采访他，让他发表他的意见。这两个办法主编觉得都不妥，那我就没辙了，最后只好把难题留给了主编，我于次日去了北戴河海滨休假。当然，这件事绝不像我说的这么轻松，过程也不是这么简单，因为这篇散文是说我与王府

井，就不想在这里过多谈论了。此事的最后结局还算不错，解脱我的是一封“读者来信”，以及巴金在一次国际笔会的发言。这件事可说是我与王府井大街，在22年“右派”生活结束后，又一次政治上的风雨人生。所幸这时祖国大地已经朗日晴空，再不会随便定罪于人了，否则我又会因此事招祸。不过事后想起这件事，我还是觉得余悸在心。

这一次，我在王府井大街一呆就是五年，后来调到作家出版社工作，办公地点在沙滩老北大院里，距离王府井也只有几站路，只要是购书买日用品，仍然是首先想到王府井。有时去人大会堂、北京饭店开会，更会早走一些时候，先到王府井大街逛逛，或者到书店去翻翻书，几乎没有任何目的性，就是有种感情的需要。只要在这条街上走走，我的心情就不会平静，那些恩恩怨怨的往事，就一股脑地撞击我的胸膛。

现在的王府井大街，已经完全变新变洋，成了时髦的商业街。我熟悉的书店，我供职的190号院，有的消失了，有的改建了，再难以寻觅当年踪影。在为这条街新颜高兴的同时，我的心中难免有种淡淡的惆怅，别说是到了我这样的年龄，就是比我再小上十岁二十岁，我想也不会忘记留有自己踪迹的地方，尽管这个地方给过你许多痛苦。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缘故。

2001年6月29日

个饺子好吃方便的结果，这饺子也就没有了最早的意义。饺子原来负载的那种人情韵味儿，随着现代的冷冻食品技术一起，被渐渐地冷冻得没有了亲合力。饺子跟面包饼干一样成了纯粹的吃食。

如今我也常吃饺子，大都是买速冻的半成品，放在冰箱里储藏着，想吃了拿出来一煮，绝对的省心省力省时间，而且味道比我自己包的不差。可是也绝对的没有了包饺子的情趣。因此常常在吃饺子时想起过去包饺子的情景，尽管那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，并且有着或忧或喜的关于饺子的经历，但是今天想起来依然觉得异常温馨。

我虽然是个地道的北方人，但是生长在盛产鱼米的水乡，对于米面两种食品都习惯，面食中惟独对饺子有种偏爱。小时候在县城的老家居住，四世同堂的十多口子人，平日里吃的是单调的饭菜，哪天当家人曾祖母发话改善生活，准是全家总动员一起包饺子。家中的女人们是包饺子的主力不必说，就是男人们也得干些剥葱摘菜的事，我们几个孩子帮助传递面皮数饺子，全家男女老少说说笑笑其乐融融，饺子无形中成了让全家人亲和的食品。曾祖母是一家之长，她从不具体干活儿，可是每逢包饺子，她好像也很高兴，要点面儿和馅儿，独自在她屋子里包几个。她包的这几个饺子，除了一般的饺子馅儿，她还悄悄的放点别的东西，比如块糖山楂片杏仁等，并按照她自己的意思，赋予这些饺子以寓意。饺子煮熟了端上桌子，谁吃到她包的什么馅儿，说甜说酸说苦这类话，曾祖母听过都有解释，总的就是有苦有甜才叫过日子。

我有过几次过集体生活的经历，在部队，在“右

派”劳改营，在五七干校，那时一到节假日说改善生活，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动手包顿饺子吃，既减轻了炊事员的一时劳动，又让别的人得到些许乐趣，真可谓是休假过节的好方式。集体包饺子，与家里不同。先由厨房的师傅们拌好饺子馅儿，准备好生面粉和必要的炊具，班组领取时按人数多少分发。把馅儿和面粉领回到宿舍之后，就由班组长按每个人特长分配任务，有的活面，有的搅馅，有的擀皮，有的摆桌案，大家一边干活儿一边说说笑笑，政治上的界线和精神上的负担，此刻都暂时被抛到九霄云外。集体包饺子最有意思的是煮饺子。饺子包好都放在床板上，由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床板，到厨房排队等候煮饺子，饺子如片片银鳞整齐地摆开，顺着次序一缕儿地排在院子里，远远地望去犹如一条静卧长龙。临到煮饺子下锅的时候，一个人把床板抬起到适当斜度，另一个人把饺子轻轻往锅里推，饺子就忽拉拉地跳进水里。然后用大铁勺一搅活，饺子犹如银色小鱼，一个个地沉下又漂起，布满在整个锅面上，腾腾的热气散放着香味儿，这时不由你不口水欲流。煮熟了吃起来也自然会有另一番情趣。

正是因为饺子好吃，在生活贫穷的年月，在一般人的眼中，谁家能够吃上饺子，那这家就必然富裕，不想露富的人家，有时吃饺子都怕别人知道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，全国城乡闹饥荒，我正在一个工程队劳动，有位老工人家中人口多，生活比较困难，经常靠公家救济度日。住的单位宿舍是个大杂院，平日里谁家吃什么饭，经过的人隔着窗户玻璃，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，其实那时吃喝都差不多，就是不看也能猜得出，还不是各种粗粮加菜呵，饭的好坏只是看粮多少。有天傍晚，还

不到拉窗帘的时候，一位老工人家的窗帘，却早早地就拉上了，恰好这时有位工友去串门儿，走进屋里一看，全家围坐在炕桌上，正在欢欢喜喜吃饺子，弄得主人和客人都很尴尬。这位老工人一再解释，是小女儿馋饺子啦，怎么说也不听话，只好包顿素菜饺子。此事传出去以后，有一个月的补助费，这位老工人差点未拿到。可见这饺子在过去的年月里，在不富裕的人们眼里，有着多么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如今生活富裕了，饮食的花样也多了，即使人们再怎么钟情饺子，它都不能算是高档食品，要想让饺子上正经宴席，就得制作精良多些花样儿。南北城乡的地方，这些年我未少跑，各式各样的饺子，当然也未少吃。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只有西安和长岛的饺子。前者因为个儿小馅儿的样子多，后者因为个儿大馅儿的样子少，这一小一大一多一少的对比，就形成了我鲜明的记忆。

在西安市那次吃饺子，由陕西省作家协会作东，请去延安开会的北京作家。西安是个古老的都城，饮食也沾着点皇味儿，我们就餐的那家饭店，据说专营宫廷膳食，更以宫廷饺子闻名。开始端上来的几盘饺子，除了馅儿上的区别，个头样子并没有特点，觉得宫廷膳食徒有其名，或者纯属后人演绎，想借皇家的名气挣钱而已。各式各样的饺子吃得差不多了，只见侍宴小姐端上一只铜火锅儿，我以为是北京的涮羊肉或汤菜，就越发觉得这所谓的饺子宴，不过是蒙普通人的假御膳。稍候又端来一盘小巧饺子，放入沸水的火锅里。这才知道，原来是现煮现吃的珍珠饺子，尽管也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，这种吃法却满有情调儿。一个个各种馅儿的小饺

子，在放有佐料的锅里煮熟，捞出来放在小碟里数着个儿吃，确实得有如数珍珠般的耐心。宫廷里是不是真有这种吃法且不说，反正这些小巧独特的饺子，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，因此留在脑海中的记忆远比香味儿更长久。

山东长岛是个水上花园，树木葱茏，幽雅宁静，好客的主人见我喜欢这里，特意让我们在岛上住了一宿。次日日本想在上午离开，主人非让吃顿中午饭再走，只好客随主便留下来。在长岛吃饭，鱼虾蟹之类海鲜，顿顿都会摆满桌，而且都是新打捞上来的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海鲜。这天中午的饯行饭，除了照例各种海鲜，堆得满桌满席都是，还特意加了几样青菜。刚一落座主人就说：“为了给远道来的客人饯行，今天中午的饭，除了老一套的海货，还想请客人尝尝长岛的饺子。”心想，还不是面皮儿包馅儿，南北城乡都一个做法，尝不尝都是一样的饺子。

海鲜佐酒，微薰未醉，喝得恰到好处。这时只见两位小姐，各端一个大盘子走来，一位端着的是平常的饺子，让我一眼就认了出来，另一位盘子里放的是什么认不出，大小个头好像是两只鸡，却又没有鸡的模样儿和肉质。经主人介绍后才知道，敢情这是一种大饺子，包的全都是海鲜馅儿。这种跟鸡差不多大小的饺子，是当地渔民最喜欢的吃食。因为在海上行船做饭，没有时间和条件讲究，渔民就把鲜美的海产做成馅儿，用一个盆大的面皮儿一包，在锅里煮熟捞出来，一个人端一个找个地方一吃，既省吃饭的时间又解饱。后来发现这种吃法不错，岸上的人家都来效仿，渐渐就成了饭店的食谱。像这么个儿大的饺子，很少有人能自吃一个，一般

都是先在宴席上摆摆，作作样子，然后再由大家分而食之。当然，如果哪位愿意，又有本事独吞，也行。这是我生平看到的最大的饺子。

西安的饺子过于小，而且有各种荤素馅儿；长岛的饺子实在大，而且是一水儿的海鲜馅儿。这两个地方的饺子，个儿一小一大，馅儿一个多样一个单一，都属于有自己特色的饺子，因此也就让我记忆至今不忘。看来世界上的东西，不怕都一样，只怕无特色，睬着别人脚跟的创造者，终归没有太大的出息。想想这饺子的各种往事，回头再来看今天的饺子，平常之中又似乎不平常。这饺子好吃与否，跟人的生活处境，有着一定的关系。试问今天吃饺子还有往日的感觉吗？

2002年11月4日

难忘草原那段情

前半生四处奔波，有家室而无居处，那时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有个属于自己的窝儿。经过多年的祈盼争取，最后总算如愿以偿，有了一套说得过去的住房。没有豪华的装修，住着却很舒适；没有高档的家具，使用却很方便。从此这个叫家的天地，就完全任我来驰骋，既掌握总统般的权力，又享受平民样的自由，活得真真正正像个人了。这时再听人唱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”，对我都形不成怎样的诱惑，倒是那首《可爱的家庭》外来歌，让我听着非常动情动心。

朋友说，你这是怎么了，乘能跑能颠时，还不多往外走走，老呆在家里多没意思。话是这么说，有时也想这样，只是临到出发时，常常会变卦，找个理由打了退堂鼓。想想过去到处流浪，这会儿好不容易有了个家，恨不得把过去失去的日子，找回来重新组合在家庭的温馨里。这就是为什么，这些年本来有机会，去九寨沟，走张家界，到新疆，进西藏，而我却并不十分热衷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
可是，在今年竟然有个例外，全国政协和国家林业局，组织首都文化界人士，去内蒙赤峰翁牛特旗，参加“保卫绿色，关注森林”活动，我未假任何犹豫和思索，当时就爽快地答应了。尽管因脑供血不足正在输液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反正只要一说是去内蒙，本能上就来情绪，有着游子归家的感觉。

在这次同行的作家中，有两位曾在新疆工作过，一位是剧作家陆天明，一位是报告文学作家文乐然。当我跟他们说起此事时，他们跟我有着同样的感觉，怀念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陆天明是上海人，后来去了新疆；文乐然是湖南人，后来去了新疆。我是天津人，后来到了内蒙。我们三个人跟新疆、内蒙，都没有任何乡缘关系，只是因为在那个动荡年代，身不由己地被送到边疆。陆天明、文乐然俩老弟，是什么原因到的新疆，我没有细问过他们，从当时年代推测，我想不会是自我选择吧。而我去内蒙完全是流放性质的，对于一个摘帽“右派”来说，哪里会有自己的自由自愿。

由于有这段不寻常的经历，时不时会有人感到不解，甚至于被认为是一种矫情。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，或者还有“知青”那代人，去边疆受了不少的苦，怎么还要留恋那个地方呢？简直不可思议。于是我跟陆天明进行探讨。我们的共识是：地域情感和苦难经历，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给苦难唱赞歌，是矫情；恋生活的土地，是常情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即使是经过苦难，还要缱绻不舍。人在许多时候就是生活这样的心境中。

说到这里，我忽然想起一次聚会。那是在今年春天，浙江作家汪浙成来北京开会，会期只有三天，他哪里也不想去，他说，他在内蒙工作那么多年，调回家乡了，还是经常想内蒙，这会儿就想跟内蒙人见见。于是，我们这些在北京的内蒙人，相聚在北京广播学院两位教授那里，淋漓尽致地神游了一趟草原。席间又是说又是喝又是唱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，就像在白云蓝天下的草原，任着性子跑马、摔跤、打滚、呐喊，要有怎么畅快就有怎么畅快，高兴得忘记了都是年逾六旬的人啦。

尤其让人奇怪的是，说的事都是内蒙的事，什么内蒙人如何实在呀，什么内蒙莜面如何好吃呀，等等；唱的歌都是内蒙的歌，什么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呀，《呼伦贝尔园舞曲》呀，等等，说时是那么动情，唱时是那么动心，好象我们就是土生土长的内蒙人。其实，我们这几个人，全部是外地人，有的是大学教师，有的是报刊编辑，有的是部队将军，在六十年代初期，以不同的情况，以不同的身份，从内地来到内蒙，一呆就是二三十年，直到改革开放时，才都陆续地调回来。可以说，把自己的青春年华，把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全都献给了内蒙草原，献给了大西北的开发。我们可以无愧地说，在支援西部建设方面，我们是一批先行者。

当然，我们在内蒙的几十年，同样也有过不愉快的事。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，在身心上也都不同程度地，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痛苦。但是这些不幸的遭遇，如同一片暂时的小小乌云，并未遮住我们心灵的天空，只要想想内蒙这块深情的土地，只要想想内蒙那些纯朴的人民，情感上依然有种难以舍弃的眷恋。而这种眷恋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的，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情感，你可以说它是一种习惯，反正不管你怎么说，只要它潜入你的血脉里了，你就再也没有办法摆脱掉。就如同进入江河的水流，总是不停地往前涌动，涌动。

我的故乡在冀东平原，十几岁便跟随父母离开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。对于家乡景物的记忆，完全是儿时的那些，一点都形不成感情震撼，可是仿佛有种东西，总是冥冥中来诱惑我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亲切的故乡身影，都会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只要想起故乡，我就会兴奋，恨不得立刻回去，看看那可能完全陌生了的土地，

这是什么情结呢？这大概就是通常说的乡恋吧。

那么，对于生活过的地方，对于受过苦难的地方，并没有一点相承关系。而且留下的记忆完全是外乡人的，却同样有着刻骨铭心的思念，有的时候比对故乡还要强烈，这该怎么解释怎么说呢？我想应该说是一种“地域情结”，似乎更恰当更能表达真实情感。不然没有这种经历的人，就很难理解这样的事，必然会说是矫情的表现。

在我认识的外地“内蒙人”中，有这样一位文化界朋友，他原本是四川人，60年代大学毕业分配来内蒙，可是总想调回家乡去，后来终于有了个机会，调回到四川家乡了。到了家乡他才发现，除了景物是熟悉的而外，别的什么尤其是人情，他完全都是很陌生的，就连气候都不适应了，他只好又回到了内蒙。这时的四川对于他，只是个籍贯上的故乡，而生活惯了的内蒙，却成了他心灵上的故乡。有次跟一位原在内蒙工作的作家，说起这位四川朋友的事情，他说他也有同样的感觉。他从内蒙调回江西以后，尽管他的乡音未改，人们也承认他是老表，说话做事都很方便，但是在感情的勾通上，总觉得跟内蒙人更容易。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呵。

这时我就想，人的感情之舟太奇怪了，一半装着生养的故乡，一半装着心灵的家园，悠悠荡荡，从从容容，永远行进在时光的河流上。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风浪，都不会轻易地失去平衡。这也正是人的可爱之处。噢，心灵的家园和生身的故乡，都是我真诚情感的圣地，只要挚爱的泉水不枯竭，我就会永远精心地浇灌它们。

2000年6月10日

温馨的秋夜

几乎没有过度的季节，暑热炎炎的夏天刚过，两场骤然而至的秋雨后，这京城的天天气就变了。似秋，又没有秋的清爽舒畅；像冬，又没有冬的凛冽寒冷。就如同世间的许多事情，应该是这样却又不是这样，让你在疑虑之中奈何不得。这正是“最难将息”的时候。

不过，秋天毕竟是秋天，夜晚毕竟是夜晚。沉寂萧条的秋天夜晚，街头比之夏天更显宁静，走在华灯映照的大街，远比夏天更惬意更舒适，就也随意地多走了一段路。刚才跟朋友们聚会时的开心，就像大块的晶莹冰糖，依然甜蜜地含在嘴里，久久舍不得嚼碎咽下。边移步边回想地往前走，不知走了多少时辰，觉得实在有些力不从心了，就想到赶快乘车回家。偏巧这是个不靠车站的地方，“打的”吧也不在路边儿，就又犹犹豫豫地走了几步。

突然一辆红色夏利车，稳稳当当停在我的身旁，一张微笑的脸探出车窗：“这位先生，您好。请问您是要打车吧？”我犹豫了一会儿，勉强地嗯了一声。这时开出租车的师傅，主动帮我推开车门，热情而利索，我再不好说什么了。跨进车门刚一坐定，司机师傅打开计时器，喇叭里传出录制的问候声。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自在，几乎没有任何生硬的感觉。

司机是一位中年人。有着一张微笑的脸，更有一张

善谈的嘴。我们边走边聊。谈变化的天气，谈夜晚的街灯，谈堵塞的道路，谈偷税的影星，谈黑心的贪官，谈下岗的工人，谈“的哥”们的种种奇遇，总之，凡是他能想到的事情，这一路上都谈到了。他那滔滔不绝的话语，就像他车的四个轮子不停滚动，几乎让我没有机会插话。后来终于我可以问话了，就说：“我刚才只是想打车，总有十来辆出租，从我的身边很快地开过去了，我想拦都拦不住，就又往前走了走。你叫我的哪个地方，紧靠便道，可是你怎么就知道我想打‘的’呢？”

“您看，这您就不明白了不是吧。其实是您自己在告诉我的。我见您走一走又回头看一看看，那种想走又不想走的犹豫劲儿，说明您是在找车，所以我就主动地开过来问您。您看这不就是咱们的缘分吗？”我听了不禁暗自称赞。的确，我是想打“的”走，可是我的眼神不好，不知道哪辆车是空的，随便招手拦一辆坐，又怕拦一辆“富康”，舍不得多花几元钱，自然就要犹犹豫豫。就这么边走边回头，结果走到了这个地方，又不是个适合停车的所在，就在这时碰到了这位师傅。

接着他告诉我说，他比别的开出租车的司机，每天少说也得多挣一两百元，窍门就是他有眼力。他说：“咱开车不就是为了挣钱吗，想挣钱就得找钱挣，您刚才不是说了吗，从您眼前开过好几辆车，您想拦都拦不住，这不就等于把钱丢了不是吗。我不是这样，只要不在交通主干线上，尽量开慢点儿观察行人，看有的人想打车又犹豫，我就上前去问问，就是人家不打，对我也没什么，万一有个正犹豫的，我一问不就走了不是吗，您说是吧？”

“有道理，这也算是顾客心理学吧。刚才你要是不

主动来问，我肯定还要再走几步，起码要找个靠路口的地方等车。”我这样说。他听后笑了笑说：“我总觉得挣钱就要挣个聪明。我们开出租车的，算个体力活儿，可是你要是稍微动动脑筋，就会多挣个百八十块。比方说，有的出租车司机中午不愿意动，认为顾客中午都休息没有活儿，但这要看你在什么地方，我就经常中午在大机关附近停车，有时活还挺多的呢。女干部没有时间上街购物，有的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上商场，来来回回就都坐出租车，这会儿又不塞车跑得又痛快。这样方便的钱干嘛不挣呀。”这同样是对顾客心里的揣摸。

从朋友的住处到我的家，其实只不过20分钟的路程。由于中途不断地塞车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大概足足用了40多分钟，路上幸亏有这位善谈的司机聊天，不然谁知会有怎样难捱的寂寞呢？而且他的一番话，就像这秋天的风，让我感到一种快意。更使这个秋夜温馨了许多。

2002年11月12日

怎不忆江南

四月。杭州灵隐寺旁。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之家。居住休息十天。

这几个词组合到一起简直是一种诱惑，一种无法抗拒的向往已久的诱惑。尽管还未真正到了一动不如一静的年龄，只是由于思想的懒惰已经很少远行，可是一说去杭州就再也耐不住性子了，于是就有了春四月的江南之行，而且在灵隐寺旁一住就是十天，总算做了一回“天堂”里的人。其实，杭州并非陌生的地方，少说也去了七八次了，早没有了最初的好奇和兴奋，然而那种打心眼里的喜欢，却依然不减三四十年前。依我的年岁和经历，走过的地方并不算少，喜欢的地方也还有几处，能够长久保持新鲜感的，恐怕就只有江南之地，其中也包括杭州在内。

有时我也扪心自问，既不是江南人，又不是在江南生活过，你怎么就那么喜欢江南呢？是江南的什么让我如此沉醉如此钟情呢？想来想去无法回答，因为喜欢就是喜欢，喜欢还需要理由吗？有理由的喜欢是理智的喜欢，无理由的喜欢是感性的喜欢。真正的喜欢从来都是水乳交融难解难分。我对于不属于我的江南就是如此。至于说到喜欢江南的什么，绣山画水，深宅幽巷，文人雅士，故事传说，这些就不必去多说它了，就连江南人也厌烦的梅雨，我都觉得有着缠绵温馨的诗意。

这次的江南之行，我没有重游熟悉景点，即使是近

在咫尺的西湖，也只是在湖堤上走了走，重温一下曾经有过的感受。倒是两项意外的活动，在我记忆的画册里，又增加了两幅美景，对于江南有了新的印象。一次是走马观花的千岛湖行，一次是雨中的朋友山间茶叙。说到这里我得感谢汪浙成和张坚军这两位作家友人。他们二位都是江南人，生活工作在杭州，对于这里自然熟悉，倘若叫我自己选择，无论如何不会想到，除了西湖还有别的让人动情的去处。

人说，观景不如听景。到了千岛湖之后，看着这清翠欲滴的山，望着这幽深宁静的水，我立刻被惊呆了震住了，不承想还有这么好的地方。我马上改变了观念，觉得应该改过来说，听景哪有观景美。置身在这碧水翠山之间，眼前的景物立刻突现心中，人世间的尘垢杂物通通都忘掉了，只有洁净温馨的清风，在我的怀中撒欢儿激荡。我跟同行的作家友人程树榛、杨匡满说：“二十年前，我去过奥地利，那里的山水，洁净清幽，至今都难忘怀。不曾想这千岛湖的山更青水更幽。”这二位游历的地方比我多，他们跟我一样也有同感。可惜的是来去匆匆，停留时间不过半日，这千岛湖的美景，算是浮光掠影瞟了一眼，而那种氤氲浓郁的氛围，怕是永远也不会从我的心中消逝了。

几次去杭州都要饮茶，饮茶又必是在虎跑，据说只有虎跑的水，泡出来的龙井茶，茶味才更清淳爽口。谁知道呢？我不是正经的饮茶人，再好的茶水也品不出，跟着行家充雅人罢了。这次在杭州没有去虎跑饮茶，浙成兄安排我们在山间饮茶，倒是颇有一番山野的情趣。这座山的名字记不起来了，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，在这里歇息曾饮过茶，事情是真的还是后人附会不得而

知，反正这地方的确是个品茶佳处。坐半山亭屋里，仰头观云，低头看树，人在云与树之间。这会儿正细雨蒙蒙，云被雨洗着，树被雨洗着，空气越发显得清新。文友们边品茗边聊天儿，天南地北，海阔天空，无拘无束，想起就说，倒也满适合文人的秉性。

这次的江南十日小住，比之前年到青田过温州，去年的绍兴参观游览，是少去了些许走动的情趣，却有着静下来的全新体验。这两者都不能相互替代，就如同江南的山和水，各有各的美丽特色，总是让你看不够玩不够，看过了玩过了还时时会想起。我对于江南就有着永远解不开的情结。

这几天京城连日小雨绵绵，不紧不慢，悠洒轻飘，很有些江南梅雨的韵味儿，早晨凭窗往远处的小公园一望，那片微雨洗着的碧绿树丛，跟我看见过的江南景色相同，只可惜天空没有江南的湛蓝。记得在创作之家小住时，推开那扇对山的小窗户，仰望辽远的天空，总会有一抹幽蓝的云彩，拥着地上翠绿的茶田扑来，顿时觉得抱着一怀江南的景色，别提多么惬意多么自得啦。

哦，江南如此美好，怎能不忆江南。

2002年10月25日

北大荒风光和白桦树

说话已经40多年过去了,不知怎么,对于北大荒的印象,我总是无法真正地忘怀,在别处无论什么地方,只要看见一派相似的风光,心海就会涌起遐想的波涛。其实,北大荒,既不是我的家乡,也不是我的生地,更不是我向往的所在,如果说还算有缘分的话,倒是1957年那场政治灾难,让我和北大荒结下了情缘。时间不过短短三年。

在不正常的情况下,被迫接近的地方,按理讲,不会带给我美好的记忆,何况已经过去这么多年,总该渐渐淡忘乃至消失了。然而,它却常常地出现在我的脑际,而且有些景物异常清晰可见,仿佛我们依然置身在那块土地上。想到这些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。

也许有人会说,你太过于自我多情了吧,在那里受了那么多苦那么多罪,险些把小命儿搭进去,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好留恋的。道理是这样。可实际上,绝非如此简单。人为造成的灾难,跟大自然的景物,是不同的两回事。我憎恨苦难,却赞美土地。北大荒那片土地实在太美丽了,假如不是在开垦的名义下,对它进行毁灭性的破坏,我相信它跟九寨沟、张家界一样美。这也正是我时不时想起北大荒的缘故。

我们刚到北大荒那会儿,黑油油的蛮荒野地,给人一种厚重沉实的感觉,抓一把泥土闻闻气味儿,就如同跟祖先用心对话,冥冥中的神圣充满心灵。这时不管你有多少烦恼事,也不管你处在怎样境遇中,就如同孩子依偎母

亲怀里，总会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。我就是从这一时刻起，真诚地爱上了这片土地，并愿意为它献上赤诚。

由于地处高寒地带，北大荒的四季景色，似乎不那么分明，然而对于热爱它的细心人，总还是可以感觉到的。冬日的积雪在春天融化以后，黑土地到处散发着清香气味，这时彩羽巧嘴的云雀鸟，被这气味醉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就尽情地在蓝天上低翔歌唱。到了夏天绿草繁花开遍四野，欢乐的江河条条碧水长流，给这千古沉寂的土地，带来一派勃勃的生机。秋天是个收获的时节，北大荒的田野由绿变黄，就像由金子铺成的宫殿，随便看上一眼都会喜悦盈怀。而到了漫长寒冷的冬日，完全成了白皑皑的世界，这才是北大荒最独特的美丽，就连不善辞令的普通人，这时都会张口，说上一两句诸如“好呵好”之类的话，借以抒发内心的感受和激动。

而我更喜欢和更留恋的，则是亭亭玉立的白桦树。它们是我白日朋友梦中情人。即使是在离开多年的现在，只要有人说起北大荒来，首先让我想起的景物，依然是记忆中的白桦树。白桦树实在可爱呵。

那年油画家张钦若先生要送画给我，问我画什么内容的画面，我未假任何思索地说：“画白桦树。”这位我北大荒的难友，立刻懂得了我的心意，不久就送来一幅白桦树的画，而且是水库旁的白桦树——我们亲手修建的水库，我们亲手栽植的白桦树。我高兴地把画悬挂在客厅里，有时候静坐在沙发上观赏，许多北大荒往事都会再现眼前。出于同样的情感和想法，重返北大荒的那年秋天，正赶上白桦树浑身披金的时候，我特意在白桦树下拍照，只可惜未能拍出白桦树的绰绰风姿，不然我一定会放大悬挂在室内。

在北大荒有各种各样的树木，还有不少的无名奇花异草，以及不时出没的飞禽走兽，那么为什么，我只对白桦树情有独钟呢？说出来不怕人笑话。我觉得白桦树很有平民个性。它的体态不像松柏高壮，天生有种权势气质；它的叶冠不像榆槐蓬乱，给人一种不羁印象。白桦树体态单薄却很直挺，而且躯干比任何树木都清爽，尤其是它临秋时的金黄色叶子，在阳光照耀下越发显得落落大方，不萎靡，不衿夸，永远平静安详地自在生长。更可喜的是，它不畏惧严寒，它不羡慕荣华，生活得非常坦荡。

大概正是因为白桦树，太过于平和、平常了，因此，它的命运才更多舛。像柞树、水曲柳、椴树、杨树等等，在北大荒也很常见，总的数量绝不算少，而在砍伐时却很慎重，派用场也都是重要地方。对于我喜欢的白桦树，则从来没有那么客气宽容，什么时候想砍就抡起锯斧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。用场不是烧炕、垫路，就是盖马棚、猪圈，最好的用场也不过扎篱笆墙。至于人们随意践踏，更是再简单不过了。我喜欢的白桦树，没有抗争，没有哭泣，只是默默地承受。

我的植物知识，几乎近于零点，只知道枫树的叶子经秋由绿变红，白桦树的叶子染霜由绿变黄，别的还有什么树木，经历外界的磨厉后，敢于如此张扬个性，我就再也知道了。在我不算完全的印象中，大多数花草树木的叶子，都是在临近枯萎时暗淡，根本不会留下最后的光彩。所以对这两种树的品格，我才会有着爱意和赞赏。由于在北大荒那种特殊的境遇里，白桦树跟我相伴于艰难中，又默默地给了我生存启示，当然也就让我格外钟情。哦，美丽的北大荒；哦，寂寞的白桦树。

2000年7月26日

心海航
L S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

心海航

夜梦与昼思

f

未摸过枪的老兵

我也当过兵，而且是解放军序列里，正儿八经的兵，可是很少跟人说起。即使熟人聚会时，某个相关话题，勾起在座老兵心思，议论起军旅生活，我也是缄口不语。所以我敢断定，知道我当过兵的人，在朋友中恐怕很少。我从军的历史，写在我的档案里，留在我的记忆中，成为我生命的历程。

好像是只有一次，跟一位陌生人，说起我当过兵。那是在一列长途火车上，坐在我对面的一个人，不知是排遣旅途寂寞，还是想起了什么事情，他凭窗凝视着远方，轻轻地吹起了一串口哨。他口里飘出的音调，立刻把我吸引住了，情不自禁地打量他。这是一位年近50的人，一双眼睛闪着聪慧的光芒，只是眸子上略显忧郁，那一张黑里透红的脸上，明显地刻着岁月风霜。在他的脸上和口哨声中，我判断眼前这个人，很可能跟我有过相同经历，抗美援朝时期参军参干，在部队里干了几年转业，属于50年代那批学生兵。

为了验证我的判断，更为了跟他攀军缘，我主动地跟他搭话：“同志，你是当兵出身吧？”“是呵，你怎么知道？”这位旅伴惊奇地说，本来就很大很亮的眼睛，此时显得更大更亮了。我说：“我不只知道你当过兵，而且知道，你是50年代参加军干校的，对吧？”他一听马上兴奋起来，移正了身子，两眼直视着我，说：“这就怪了，咱们不认识，也从未见过面，你怎么说的这么

准呢？”“这有什么难的，你刚才吹的口哨，那音调是一首歌的，歌名叫《走进军干校》，我现在还记着歌词。当年学生参军参干都唱过。”我这么一说，他就更来了神，说：“这么说，你也当过兵，也是那时参军的？”我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。

两个同时代人，两个同期老兵，就这样相识了。在列车隆隆的滚动声中，我们一起回忆那段峥嵘岁月：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，南韩北朝两国打起仗，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边，中国人民个个义愤填膺，誓死保卫危急中的国家。许多大中学生投笔从戎，唱着“让我们走，走进军干校”，唱着“共青团员时刻准备着”，离开家乡、父母和学校，走进绿色军营，走向朝鲜前线，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军人。我和这位旅伴儿，都是那个时候，穿起军装的学生兵。从谈话中知道，他去过朝鲜前线，真正地打过仗，这在当时很了不起。而我却没有这样的机会，参军后在军校未毕业，就进了部队的大机关，成为“当兵四年未模枪，抗美援朝未过江”的军人。这也就是我所以不敢自称老兵的原因。

但是，不管我敢不敢承认，在有的场合里，在别人的眼里，我还是被当做老兵。就拿眼前的事情来说，这位打过仗的真正老兵，跟我谈话时，总是一口一个“咱们这拨老兵”，说得我简直无地自容，却又不好解释和推脱，只好以点头表示默认，谁让我属于他那拨人呢？就算我沾光占便宜啦。这样我们之间也更显亲近。

说起我们那拨儿50年代的学生兵，我们俩人的心绪都很不安，当时的情景又都重现在眼前。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最初几年，是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，几乎每个人都是那么真诚——年长者真诚地忏悔自己的过去，年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轻人真诚地憧憬自己的未来，对于国家发出的每个号召都相信。正当国家号召青年学生参军参干时，许多大中学生放弃读书，坚定地投身到解放军的行列，当时的情形颇像60年代，青年学生的上山下乡运动，人们争着抢着要走，我就是背着家里报名的，以至让母亲着急许多天，直到接到我从军校来信，家里人这才放下心来。参军参干成为一种时尚，被我们那一代人追求着，当时好像谁也不想落后。

在这些十几二十几岁的学生兵当中，有的人出身富裕家庭，却未留恋那个安乐窝儿，而是毅然决然地参了军，不料在当时“极左”路线下，有的人仅仅因出身不好，或者因有海外港台关系，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。我眼前的这位旅伴儿，就是因为出身地主家庭，在部队多年未能提干，最后只好复员回家。他说：“其实提不提干，对我来说也没啥，不管怎样，有了那段当兵的经历，我也就很满足啦。”噢，一个多么豁达开明的老兵，一个多么真诚单纯的老兵，一个为理想献身的50年代的老兵。

老兵自有老兵的情怀，老兵自有老兵的骄傲；当然，老兵也自有老兵的烦恼。尽管我是个未摸枪的老兵，没有多少可以夸耀的本钱，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，但是做为一个50年代的老兵，我仍然有着自己神圣的尊严，如同我戴过的军帽上的军徽，绝不能让人随便地亵渎污辱。然而在万恶的“文革”后期，我却被人无情地数落了一顿，倘若不是自己的“罪人”身份，我真想跟他好好地理论一番。在我当时的下意识里，他可以对我不恭不敬，但绝不能说老兵坏话，因为老兵是个通称，它代表着所有的老兵。

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：经过几年的造反瞎折腾，考

考虑到内蒙是边防前线，“文革”后期中央决定，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。机关干部全部进学习班，一边学习一接受审查，管理人员由北京军区指派，实际上是人也被军管了。既然要由军队来管理，自然少不了军训和拉练，在部队时我没有摸过枪，转业地方又被错划“右派”，连当民兵的资格都没有，这样就又失去了学武的机会，因此在作各种操练时，我作的动作远不如当过民兵的人。一天学习走队列正步，我的动作怎么也不规范，连长对我很不高兴，他怒气冲冲地说：“真笨，简直是乱弹琴，连个正步都走不好，亏你是个老兵哪。”他的这句话很刺激人，很伤我的情面和感情，当时本想当面质问他，后来考虑再三还是忍下了。不过私下还是给他提了意见，不为别的什么，就是想维护老兵的尊严。连长他也是个军人，我们是不同代的战友，他应该真正懂得，尊严对于军人——尤其是对老兵，是多么至关重要的事情。

有了这次对老兵尊严的维护，从此以后，连长对我格外地客气和尊敬，即使我再作不好操练动作，他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数落我，总是耐心地告诉我应该怎样作。他好像开始意识到，我再有天大的错误——假如真的有的话——我的老兵身份也是抹不掉的，这是我的历史和生命的一部分。而我自己从此以后，也再没有客气过，不再有自卑之感，因为当兵时没有摸过枪，就自以为矮人一等。不，摸过枪与未摸过枪，只是工作岗位上的区别，我穿上了军装就是军人，我在那么早当上的兵，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兵。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不过我还得如实承认，在扛过枪的老兵面前，不管怎么说，总还是觉得有点“理亏”，谁让咱是个未摸过枪的兵呢，再老不也是少了些英武之气吗。 2000年1月29日

灯火的记忆

生活中离不开灯火。但是，生活在城市的人，夜晚总有华灯陪伴，他们很难意识暗夜的可怕，更不会感到灯火的可贵。只有那些在茫茫旷野里，走过漫长夜路的人，他们才会知道灯火多么重要。

年轻时候，我在北大荒农场劳动，曾有过一次迷路的经历。那是个冬天的夜晚，我们几个命运相同的人，从总场办事回来，途中突然刮起了“大烟炮”（暴风雪），一时间，刚才还是好好的天气，此刻却来了个风狂雪怒，百米之内难见道路，人如同在黑锅里扣着。我们毫无把握地，探着路向前挪动。这时风雪更大更疯了，如同千万头凶猛的野兽，伸着只只锋利的尖爪，撕扯着棉絮般的雪花，而且还不停地吼叫着，怕得人毛骨悚然。当时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：这要是前边有灯光，那该多好啊。

倘若不是在这样的天气里，即使这块土地再荒凉再辽阔，总还会有些许忽明忽灭的灯火，给走夜路的人指引方向。可是现在灯火全被风雪吹熄了，我们只能凭着感觉一点一点地往前走。就这样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，风还不见停，雪还不见歇，却不经意地撞见了豆秸堆，别提多高兴了，就停下来依偎着豆秸堆，乘着躲避风雪时闲聊天儿。这时忘记是谁了，轻声哼唱起了苏联歌曲《灯光》，别人立刻也随声跟着唱，在这风狂雪虐的旷野

里，顿时飘荡起“静静深夜里，灯火闪着光……”的歌声。尽管歌声被风雪压盖着，微弱得几乎听不出，但我仍然觉得声音很大，仿佛有着无数灯光在眼前闪烁。

风停雪息之后，天还是黑黑的，却透出了微光，当我们站起来，向四野张望时，只见远处有点点亮光，像亲人的眼睛，在向我们眨动。我们知道，那正是一个小村落，还没有熄灯，这太好了，我们赶紧奔它而去。这时的这几点灯火，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明亮，在我们心中的地位，远比任何都重要。

这次的风雪夜迷路，这次闪烁的点点灯火，给我留下的记忆特别深，在以后的许多年来，只要是家中因故偶尔停电，或者是置身黑暗的夜晚，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次遭遇。有时走在漂光流彩的大街上，观赏那高大建筑上的璀璨灯火，我也会像别人那样激动不已，甚至会脱口说几句称赞的话。但是内心深处想得更多的，依然还是迷失道路以后的灯火，在那种特别的环境里见到的灯火，我觉得比节日里城市的灯火更美丽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还有一种灯火，同样是明亮的——这就是艰难岁月里，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，它所发出的如豆光亮。它的光亮是那么安详、平和，连飘出的缕缕黑烟都很随意，看着它让你想到自己的生活。似乎只有像它一样地随遇而安，不求光大，只想微亮鉴人，这是多么地符合平常的心态呵。

用墨水瓶做的油灯照明，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有过两次，一次是在北大荒，一次是在内蒙古，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内蒙古。

那是在“文革”的后期，我们这些臭老九被轰到干校，生活中的许多习惯、毛病，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改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掉了，惟有一样可以说是“死不悔改”，这就是对书的钟情和喜欢。其实在那个以书为敌的年代，真想读的书并不让你读，必读的只有毛泽东的著作。终日里翻过来掉过去，把书页都搞脏了破了，还得一遍遍地再读，现在敢说真话了，说句对老人家不敬的话，这样“百读不厌”，目的就是出于多年习惯。我从年轻时就有个臭毛病，临睡觉前不翻几页书，就很难沉沉地入睡。可是在干校过集体生活，没有那么多个人自由，晚上一吹哨就得熄灯，没辙，我就自己做了一盏小灯，用作睡觉前看书用。

我从农村信用社要了个空墨水瓶，打了几两当地产的胡麻油，然后找块小铁片挖个洞，再从棉被里揪块棉花，搓成长条捻子穿过洞，一个小小油灯就做成了。这墨水瓶的小油灯，挂在我的床头，照着我的书本，给了我不少的快乐。那时候白天不是下地干活，就是没完没了地“斗私批修”，弄得你身心都不得安宁，只有晚上在灯下才自由，这小油灯无形之中，就成了我困难中的朋友。有时看书看得烦了，就瞪着两眼观灯花儿，见那灯花儿啪啦啦爆响，我就想，人这盏灯也有爆响的时候，最佳时间应该是青年时代，可是像我这样年轻罹难的人，还未容你爆响青春之火就熄灭了，连这盏小油灯都不如，这不能说不是人生的最大悲哀。

这小油灯的灯光，是那么微弱，是那么短暂，摇曳摇曳地亮着。在灯光如撒金泼银的今天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大概很少有人再点这样的灯了，点过的人也许早已经淡忘了。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发配过的人，它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轮明月，想起它我就会想起那段生活。

2002年6月6日

路至远方有佳境

1988年的春天，我和老作家康濯等人，出访了一次奥地利。在这个被誉为音乐之邦的国家，施特劳斯、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、舒曼等，这些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们，都在这里留下了艺术的足迹。我们在这里10多天的访问，不仅感受了一次美的历程，而且也领略了北欧的风光，使我这个有机会跨出国门的人，知道了外边世界的真实情况。只是由于我们与世隔绝太久，对于许多事情的陌生，难免因无知而出“洋相”，完全暴露出封闭中的人，跟高度现代化世界的差距。

那是在游历过奥地利几个州之后，我们回到首都维也纳，大家在交谈感想时，我忽发奇问：“奥地利怎么没有火车？一路上竟让我们坐汽车。”陪同的“中国通”、汉学家施华滋教授，听后颇为风趣地说：“老弟，你太‘土包子’啦，高速公路这么发达，谁还坐火车。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“高速公路”，再回想一下几天来的出行，可不是，从维也纳的宾馆门前上车，在到达地宾馆门前下车，没有一点换乘的劳累，的确要比火车方便舒适。公路两旁的田园风光，苍翠欲滴的积雪山峦，在澄碧穹隆复盖下，使天地交融之处越显清远，乘车人如在画中行驶，整个身心都感受轻爽。这其后有许多天，在我的脑海里，都是关于道路的画面。

最先想到的是故乡的道路。我很小就跟随父亲离开



故乡，几十年后的今天想起来，许多景像都还依稀记得，但是最清晰最亲切的，要属故乡通往外界的道路。那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呢？晴天是疙疙瘩瘩的硬土块儿，走路稍不注意就会崴了脚，雨天是粘粘糊糊的烂泥巴，刚拔出后腿前腿又陷进去。最令人难以忍受的，还是雨过天晴时，在太阳的暴晒下，牲口粪草沤在一起，那股难闻的气味，简直要把人呛晕。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，我们这些乡村孩子，一天天地走过晨昏，从孩童走成了大人。

尽管那时并不知道，故乡以外的道路，是不是也是这样，但是只要说起道路，总还是免不了抱怨。孩子们在一起胡扯乱侃，有时说到将来的打算，总会有人说：“哼，要是我将来成了大官儿，先修一条平坦的路，让乡亲们舒服地走”。可惜我那时的伙伴，没有一个人当官儿，留在记忆中的路，依然是那么坎坷难行。所以在许多年以后，有人说起乡村的道路来，我总是摇头不止，无论别人怎样啧啧夸奖，我都不会十分相信。

当有朝一日离开故乡，乘坐着一辆铁轮马车，吱吱扭扭地走在土路上，亲切和苦涩两种滋味，同时涌上心头，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。这脚下的道路，是系着我情感的带子，无论走到何时何处，它都会拉扯着我，让我跟故乡永不分离，应该说些感激它的话。可是想到行走时的艰辛，又觉得还是离开它的好，就不能不悄悄地高兴，这时藏在心中不便说出来的，竟是庆幸自己离开的话语。怀着这样两种复杂的心情，就这么依依离开了故乡，带走的只是对道路的记忆。

走出了家乡的村镇，本以为外边的世界，道路比故乡的平整，灯火比故乡的明亮，岂知那只是我的想象。

从家乡出来几年后，开始生活在大都市里，道路自然是平坦的，也就淡忘了往日的艰难，后来被发配到北大荒，碰到的头一件难事，就是在荒原上走路。在我们到来之前，这亘古荒原很难说有路，只是走的人多了，这重叠的足印，渐渐地拓宽光滑，人们才管这叫道路。在这样的道路上走，晴天也还算惬意，路的两边有花草，路的远方有蓝天，偶尔还有云雀，唱着好听的歌飞过。只是一到了化雪季节，或者雨过放晴的时候，道路上就会是泥泞满地，走路带来的麻烦，要比别处多得多。

头次领教这里道路的泥泞，是在北大荒过第一个劳动节。运送节日吃食的汽车，陷在了半路的烂泥塘里，农场派我们几个人去推车。几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，满以为可以把车推出来，谁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这汽车光动弹就是不走。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在司机师傅的指导和呵斥下，把车上的物品一一卸下来，再推空车还是纹丝不动，物品只好由人扛着背着运回来。负重在泥泞中走路，我们还是头一次，一路上深一脚浅一脚，不是摔倒了，就是挪步走，10几里的路程走了半天。到了农场卸下物品，我们几个人像散了架子，一个个狼狈地坐在地上，好久都不想爬起来，懒的连句完整话都不想说。事后谈起这件事来，一位同济大学毕业生说：“将来有机会改行，我一定做公路工程师，把咱中国的路修得棒棒的，就是再有人下放劳动，起码在走路不受罪。”

这位同伴的这席话，是理想也好，是感慨也好，总之，说出了我们的心情。当我在奥地利访问时，乘车行驶在高速公路，沉浸在道路的遐思中，不禁想起了北大荒的道路，更想起了这位同伴来。当然也想到我们的国家，长期的这样闭关自守，使我们失去了多少机会。假

如不是改革开放，我们仍然像老牛破车似的，慢悠悠地走在土路上，我们跟世界的距离就会更大。那位感慨道路的北大荒同伴，他的那点微薄愿望，恐怕短时间内很难实现。所以当我从遐思中走出来，大胆地跟康濯老说：“康老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们也会有高速公路，让出行的人享受方便。”康老微笑着点头。

出国访问回来不久，就从报纸上看到，许多地方在喊：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。这就说明人们开始意识到，没有道路的艰难，拥有道路的方便，尤其可贵的是，把道路跟富裕连在一起，这不能不说是个进步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应山东一位朋友邀请，我作了一次公路上的旅行。从在济南下榻的宾馆上车，而后我们到了几个城市，以及沿海的小村镇，一路之上都是在汽车上，真实地感受到了公路，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方便。在建有高级公路的地方，我还看到了不少的乡村，盖起漂亮的二层楼民居，这跟我在奥国见到的没有两样。经这位朋友介绍知道，山东是个公路大省，由于经济比较发达，各类公路建设都比较快，反过来公路的迅速发展，又促进了经济的繁荣。

我还想到了内蒙古的道路。我在内蒙古流放过18年，对于那里的道路情况，应该说还算有些了解。在阔别10多年后，重新回到熟悉的地方，我发现最大的变化，同样是道路。我在内蒙的那些年里，从集宁到呼和浩特，一般都是乘坐火车，火车即方便又快捷，就连有小轿车的官员，无急事都很少走公路。实在受不了那份颠簸，更不要说时间的浪费。我这次回到集宁来，想去趟呼和浩特，跟朋友们说坐火车，他们不禁惊讶地说：“都是什么年代了，还坐火车，走公路两个小时，轻轻

松松就到了”。结果真的像朋友们所说，从集宁宾馆门前上车，到《内蒙古日报》社门前下车，如同从这个家门进那个家门。小车在平坦的公路上奔驰，说说聊聊地很快就到了，大地的距离仿佛在缩短。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有一次乘坐一辆吉普车，从集宁到呼和浩特，一路风尘，一路颠簸，路上走了四五个小时，到了呼和浩特想办事，机关都已经下班，只好再住上一宿。

现在有了畅达的公路，别说是在集宁、呼和浩特之间来往了，就是从北京到内蒙古，许多有车的人都是开车去旅游。内蒙的朋友们要来北京，常常是早晨打来电话，如果不堵车中午就会到达，再不会像乘火车那么受限制。看到朋友们进北京这么方便，就会羡慕中想起早年的自己，我那时在内蒙古工作，每年春节要回家休假，为了买一张火车的坐票，得提前一个月托人走后门儿，有时还往往落空。有好几年就是坐在手提包上，迷迷糊糊地日夜兼程，大年三十的晚上才到家。这种狼狈的旅程，如今当作笑话说，恐怕还有人不相信。但是对于我却是一段辛酸的往事。倘若是在今天，有了公路就多一种选择，我可以抬腿就走，真正成了生活的主人。

这些年外出的机会比较多，即使乘坐飞机来回，到了访问的目的地，也要坐汽车到乡镇。这些天南地北的城乡，给我感触最深的变化，就是一条条新建的道路。繁华地区有高速公路，偏远地区有普通公路，像交错纵横的蜘蛛网，编织在祖国的山水间。有的道路平坦宽阔且不说，道路两旁的绿化带更是悦目赏心，乘车在绿荫覆盖的公路上，人的心境宛如长了翅膀，不由你不在想像中飞翔。我再次到北大荒和内蒙古——我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地方，它们道路的变化实在让我感动。这种变化

正在预示着，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活，总有一天也会像这道路一样，渐渐地平坦开阔起来，开始充满勃勃的生机。

不过从我个人来说，还有个小小的愿望和向往，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家乡，重温那没有消失的道路的记忆，更想体会重建道路上的风光。尽管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回去过，家乡的一切似乎都已经陌生，但是我知道那条京津唐公路，正好从我的故乡擦身而过，她肯定会有一番繁荣的景象。从家乡艰难坎坷道路上走出来，如今再从平整的高速公路走回去，连我自己都一时想象不出，在我的心中会涌动怎样的情感。那就让我在新建的道路去感受吧。

1999年1月12日

囚禁歌声

——北大荒纪事

离开20几年后，正是白桦树披金的季节，我们10多个难友结伴，重访了当年流放地——北大荒。尽管时光冲淡了当年的荒芜，经新一代农工的辛勤劳作，北大荒面貌全新，诸如“马架子”、“草棚”等，这些我们流过汗水的印迹，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，但是置身在这片土地上，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气息。当走过一片白桦树林时，首先让我想起的就是歌声，仿佛至今还在不停地缭绕。

那是在“反右派”运动结束不久，地方和军队中央机关的“右派”，踏着早春的泥泞来到北大荒，开始了罪人的流放生活。这些被划成“右派”的人，年龄不同，经历不同，职业不同，地位不同，只是由于有了相同的命运，此刻才站在同一队列里。可能是在挨批斗时，心情过于郁闷和紧张，因此在北京刚上火车，还很难看到一张笑脸，到了北大荒军垦农场以后，置身在清新的大自然里，如同飞出笼中的鸟儿，政治神经得到些松弛。这时，不仅脸上有了笑意，而且嘴里有了歌声，开始恢复正常人的神态。

在我们这支“右派”队伍里，有几十位国内一流艺术人才，这些演奏家、歌唱家、作曲家、大演员，有的来自文化部所属院团，有的来自军队各文艺团体，不少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人曾活跃在首都舞台。出于对艺术的崇敬和热爱，即使身陷苦难的劳役中，依然没有放弃专业的想法，他们中有的人连乐器都带了来。所以后来在苦中找乐时，几个人一凑就是一台戏，除了没有灯光布景，演技绝对是精湛的，用我们这些观众的话说：“甭花钱买票，就欣赏一流演出。”只是说话的语调，多少带些凄楚和无奈，不管怎么说，一场残酷的政治运动，就毁灭这么多人才，总不是什么好事情。

我们来后没有多久，就谱出了一首歌，歌名是《我们战斗在北大荒》，词作者是一位杂文作家，曾任文化部某副部长秘书，曲作者是一位来自延安的小提琴家，曾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。教唱的是中央乐团的歌唱演员。很快这亘古荒野上就飘起了：“完达山下，兴凯湖旁，我们战斗在北大荒……”的歌声，显示出老“右”们宽容的襟怀。但是，这样的歌曲毕竟过于庄重了些，很难说会引起人们多少感情共鸣，喜欢唱歌的人独自哼唱的歌，则是一种感情色彩更浓的曲调，像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《喀秋莎》《灯光》《红莓花儿开》，像中国30年代歌曲《叫我如何不想他》《黄水谣》《送别》等，我知道的一些动听的歌，大都是在那个时候听来的。比如马思聪的《思乡曲》，在北京的时候听过小提琴演奏，并不知道它还配有优美的歌词，有次跟一位比我年长的难友外出，在路上他轻轻地哼唱着，那委婉的曲调，那缠绵的词句，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流放人的心，不由地想起了家乡和亲人，两滴清泪顺着眼角，悄悄流了出来。

刚到北大荒的时候，我们都住在“马架子”里，这些简陋的草木窝棚，肯定无法度过寒冷的冬天，连队就

决定盖一些住房。有次我们去山林里扛木头，此时正是朗月高悬时分，银色的月光透过宽枝密叶，班班驳驳洒在森林里，使人的心情感到无比舒畅。可能是这景色太迷人了，使我们这些热爱生活的人，有的只顾观赏林中夜景，一时忘记了扛木头的事，结果几十人的队伍稀稀拉拉。走在前边的人怕后边的掉队，领头的人就高喊：“跟——上——来，别——掉——队——”，这喊声飘荡在幽深的山林里，发出悠远宽厚的回声，给人以激动给人以兴奋；后边的人就从不同的位置回应：“听——到——了，就——来——”。这声音比刚才的更有气势，于是大家就像一群顽皮的孩子，一路上不时地前呼后应着。一位原在空军文工团的歌唱演员，显然是被这景色这气氛感染了，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东北民歌《丢戒指》，这支诙谐幽默的东北爱情小调，立刻把我们大家都迷住了，唱完了有人要求他再唱一支，于是他又唱了《瞧情郎》《看映歌》。大家一边走着一边听着歌，这样的劳动倒也还算轻松愉快。只是这样的好事情维持不久，人们再不敢唱自己喜爱的歌了。

我们这些“右派”，刚来北大荒时，都集中在云山畜牧场，后来就都分散开。我从云山畜牧场出来，先是调到杨岗烧砖，后来到二分场排水，这些劳动都比较苦重，大家就用歌声缓解劳累，在休息时互相拉歌，你唱一个，我唱一个，很快就把熟悉的歌唱完了。轮到一位年长的难友唱，大家不让他唱重复的歌，想了想，他就唱了一支美国歌曲《老黑奴》，我们这些年轻人未听过，觉得这些歌挺好听，就让他再唱了几支，同样都是美国歌曲。他是用外语唱的这些歌曲，内容一点也听不懂，只是欣赏优美的曲调。可是谁也不曾想到，就是这么几

心 航

夜梦与昼思

支歌曲，后来在整顿思想时，竟给这位难友带来了灾祸。我们这些当时撺掇他的人，感到非常的难过和惭愧，觉得很对不起这位难友，但是没有办法解救他。

所谓的整顿思想，说白了，就是整人，或者叫“右斗右”。给这位唱歌难友发难的人，原是国家某部干部学校党委书记，论此公的出身、经历、官职，都应该是个响当当的左派，却阴错阳差地被划成“右派”，用大家猜测的话说，可能是未斗得过同类人。可是他依然有种优越感，在组织面前他认为自己委屈，在“右派”面前他认为自己革命，当然也就总想表现得比别人进步。因此在整顿思想开始时，开会别人谁也不言语，这位“老革命”就抢先发言：“我们都是犯了错误才来劳改的，在劳改期间还不老实，大唱美国国歌，这不是明显地想变天吗？这还了得。这样的人一定要老老实实地交代。”大家一听就知道，他是说哪位难友。令人奇怪的是，这位发难者文化不高，更不会懂得外语，怎么能够知道，唱的是美国国歌呢？后来才惭惭弄明白，揭发人原来是外交部的“右派”。这样一来这位唱歌的“右派”，成了第一个因歌罹难的人。

幸亏转业军人指导员，是一位比较温和宽厚的人，在会议上明确地说：“不管谁原来是干什么的，职位有多高，资历有多深，这会儿犯了错误，大家都一样的人。同样都有个改造的问题。这唱歌的事情，只要认识就行了。”这才使个别心数不正的人，想利用此事表现“进步”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但是这件事却提醒了大家，尽管现在都是“右派”，每个人情况也不尽相同，还是要格外小心为好。从此我们之中的歌声少了，就连说笑话都得注意，生怕因嘴把不住

门，再给自己招惹是非。那些喜欢唱歌的人，那些爱讲笑话的人，只能在忍耐中度日，或者是在没有别人时，自己轻声哼唱几句，借以抚慰孤寂的心。

我们在苦难的劳役中，就这么点愉快和乐趣，如今都被无形地“囚禁”，大家的精神痛苦可想而知。尤其让大家不解的是，“囚禁”歌声的并非官方，而是“右派”中的一些人。这时我们才真切地意识到，即使同样都是遭难的“右派”，由于人们的心态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行为就有别。所以这些年里有人说到“右派”，以为被划过“右派”的人，都有一颗清澈如水的心，都有一张敢吐真言的嘴，我总是报以理解的微笑，却不想多说一句话，也实在没有必要多说。然而只要听到歌声，特别是听到那些在北大荒唱过的歌，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，在北大荒劳改的时候，那些有歌和无歌的日子……

1999年2月17日

少年起步正当时

倘若把人的一生比为四季，十四五岁是最美好的季节。身体开始发育，头脑正在健全，对未来充满幻想，见什么事情都很新奇。总之，这时的生命如同一棵树，只要日照水分充足，它准会渐渐长大成材。如果这个时候有机会读书，就如同施用催花养料，说不定还会绽放出美丽花朵。许多后来有些生存本领的人，一些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，大都得益于中学时代所受教育。当他们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，无不感激中学老师的教诲，以及学校打下的良好基础。我自己也是如此。

我曾经有过到大学读书的愿望，并且做了充分的应考准备，就在即将走进考场的前一天，那场突然袭来的“反胡风运动”，好像一阵恶劣的风暴击毁我的梦想，紧接着又是一场更为残酷的“反右运动”，连我做为正常的权利都被剥夺，整个的生活秩序和命运都发生变化。遇上这种不测的打击，我相信对谁都是致命的，哪能想到22年以后，还能有机会让你做些事情，而且这些事情又符合自己心愿——当编辑和从事写作。所以每每想到这些，就会想到中学时，我所受到的良好语文教育，不然即使有机会吃文字饭，怕是也不会有这个能力的。

那么，在中学读书时，我受到的是怎样的教育呢？

我读过两所中学，一所是河北省立宁河中学，一所是天津市立第一中学，在当时都是所谓的官立中学。尤

L. S. H. S. N. S. S. W. S. H.

心海
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其是最后就读的天津一中，在天津市跟南开中学齐名，就是在华北地区都颇有名气。这个学校的师资，我上学那会儿，几乎全是北师大毕业生，就是有从别的学校毕业来的学生，肯定也是名牌学校的高材生。这所学校出了不少作家、艺术家、体育健将，更出了不少科技人才。

教我语文课的几位老师姓名，现在真的一时记不起来了，但是他们的那套教学方法，好象一直都不曾经忘记，而且给了我受用不尽的益处。在写这篇短文时，仿佛又回到课堂，聆听他们的授课。

首先走进我记忆的是，一位上了年岁的语文教师，圆圆脸，驼着背，架着比瓶底儿还厚的眼镜，因此当时被淘气的我们，给他起了绰号“眼镜”，还因为他留着个八字胡，有时我们也叫他“胡子”。这位老师说话讲课慢腾腾，念古典诗词课文的时候，他喜欢摇头晃脑拉长声，据他自己讲这叫吟诵，读古典文学作品就应该这样。我们这些孩子却不这么想，只觉得他的念法好玩好笑，因此也就更觉得格外新奇。大概正是他的这种新奇念法，无形之中产生一种魅力，我后来能记住的古诗词，都是这位老师教授的。这位老师讲授古典文学作品时，如果课文里故事性特别强，总是先讲故事给同学听，大家把课文的故事记住了，又有了学习的愿望和兴趣，再结合故事讲解写作知识，这样的教学方法效果特别好。我之所以渐渐喜欢上语文课，我想跟这位老师的讲课，肯定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后来我自己阅读名家文章时，总是先粗略地了解内容，而后再仔细地琢磨文章写法，这大概正是那时养成的习惯。

还有一位中学语文老师，给我的帮助也很大，尤其

心
航
夜
夢
與
晝
思

心
航
夜

夜
夢
與
晝
思

是在指导写作上。这是一位中年老师，北京人，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在讲述某种文章体裁时，他不是简单的说说特点，更多的时候是讲解范文，让学生在熟记范文的同时，学习一种体裁的写作。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：“语文语文，语就是说，文就是写，说话有条理，算你学好了一半儿，作文能成篇，算你学好另一半儿。会说不能写，能写不会说，都不算语文学的好。”所以他特别注重学生的实践。在课外活动的时候，他经常组织学生搞讲演比赛，由他出一个题目让同学们即兴讲演，即锻炼了学生的口才，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，同时学习了词语结构等语文知识。在写作的实践上，他主要是让学生写作——写学校生活，写身边事情，然后在教室里定期出《壁报》，《壁报》上刊出的文章，先由同学自己互相评议，最后再由老师综合评论优劣。有时还找来名家的同类文章，由老师结合我们的写作，对比着讲述名家的写作方法，以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。

我当时在天津一中就读时，好象并未觉得功课怎么重，起码不像现在学生这样，整天在减负的叫喊声中读书，这也许是我太不用功的缘故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们学习写作就是边玩边学的，好像并没有什么压力。那时学校里有不少课外社团，像新闻社、文学社、话剧社、歌咏队，等等，学生根据个人爱好随意选择。我喜欢文学又想学习写作，先后参加过新闻、文学两个社。

新闻社在学生会的领导下，每个班都有特约通讯员，负责报道班里的好人好事，以及班里的其它活动，写成稿件由新闻社统一出版。新闻社平日在学校出黑板报，稿件的组织和板面的安排，全部都是同学们自己动手；如果碰到类似五一、国庆等节日，或者学校举行运

动会、歌咏比赛等活动，新闻社还要出版油印的小报，稿件采编和报纸刻印全由同学负责，老师只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启发。因为学校新闻社跟报社电台有联系，他们经常派编辑记者来组稿，顺便也给我们一些新闻写作辅导，他们认为好的稿件有时拿去发表，这就更加增强了我们的写作兴趣和信心。这些新闻机构的编辑记者，无形中都成了我们的写作老师，对于我们学习写作的帮助，比在课堂上得到的还要大。直到过去40多年的现在，《天津日报》、《天津青年报》、天津广播电台的编辑，我还能清楚地说出他们的名字。可见他们在我学习写作过程中，对于我的影响和帮助多么大。

参加文学社是从听讲座开始的。20世纪50年代的天津各学校，经常组织不同的讲座，请一些学者、作家、科学家，通俗地讲解历史文学科学知识，培养学生对科学知识的兴趣，以便确定自己将来的发展方向。我听的第一个文学讲座，是老作家周立波讲的，其后又听过赵树理、孙犁、方纪、阿垅、鲁黎、肖也牧等人的讲座，从此对文学总是有种说不清的向往。正式参加学校文学社以后，辅导老师和高年级同学，经常鼓励我学习写作，我也悄悄地写了些诗文却羞于见人。有一次班里组织参观天津钢铁厂，回到学校后老师跟我说：“你看工人师傅的劳动干劲，多么让人感动呵，你参加了文学社，还不试着写写参观感想。”在老师的鼓励和启发下，我写了一篇叫《可敬的人》的文章，当做作文交给了老师，不曾想未过几天，这篇文章在《天津青年报》上发表出来，原来是老师觉得写的不错转去报社的。文章发表后老师告诉我，像你这篇文章的样式，归类应属于散文类体裁。这时我才知道这样的文章叫散文。

心
航
夜
夢
與
昼
思



夜
夢
與
昼
思

这次写作实践的“成功”，是我的文学处女作，更是我真正迷恋文学的开始。虽然连朦胧的文学写作梦都没有，更不敢有将来当作家的奢望，但是一定要吃文字这碗饭的想法，这时却在我的脑海里形成。所以在后来的许多年里，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况，我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。特别是到大学读书的机会丧失后，那时我已经在一家报社当编辑，每天忙完编辑部交给的工作，只要有时间我就读文学书籍，有时也悄悄写些诗文，然后投寄给各种报纸和杂志。当然，那时我还只是个文学爱好者，在写作上连个门道都未摸到，寄出的稿件退回的多于采用的，可是我并没有太多的灰心丧气，我相信只要我能够坚持下去，即使写作成不了什么气候，起码也会有益于我的工作，反正我已经实现了吃文字饭的愿望。

正当准备探索有无可能从事写作时，在那场残酷致命的“反右运动”中，一顶荆冠戴在我的头上。从此有嘴也不让说话——丢掉了语文的一半儿；随后又发配边疆不能动笔——丢掉了语文的另一半儿，读书时学过的语文，长大后有过的愿望，这时通通地烟消云散，留下的只有残存的美好回忆。在笨重的体力劳动之余，偶尔跟喜欢文学的难友，悄悄地谈点文学上的事，那不过是过把文学瘾，根本想不到会有出头之日。

忽然有一天，政治气候开始从阴转晴，让我重新走上编辑岗位，经过简短的适应过程，我又可自如地说话和动笔，语文再一次回到我的身上，别提我多么高兴了。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教过我课的老师，那些辅导过我的编辑，是他们给了我文学启蒙教育。假如没有中学时代打下的基础，没有后来自己坚持的读书写

作，我是绝对不可能重操旧业的。所以我一直认为，要想学好语文，中学时期的教育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别说像我这样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，就是有些大学其它非文学专业的毕业生，后来改行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或者业余写作，那还不同样是中学时代打下的基础。学习语文以及学习其它知识，少年时期都是最佳阶段，有志于吃文字饭的少年人，一定要珍惜这大好的黄金时光。从这里起步坚定地往前走，将来准会进入美好的境界，实现你的人生梦想。

2001年12月4日

心海航

心海航
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雪落无语

——一份迟交的作文卷

按自然界的时序，现在正是冬天。昨天夜里静静地飘了一场雪，把整个城市都盖得洁白如玉，让人一时忘记了人间的龌龊。这是新的一年也是新的世纪，天公馈赠给我们的最好礼物。由于这场雪的降临，公园里街道上都有人赏雪，处处洋溢着朗朗的说笑声。我想人们的心情都会格外地好。

不想隐瞒地说，在一年四季中，我最喜欢冬季，有时面对一派大好春光，好象也没有多少兴奋，思绪常常地滞留在冬天里。只要一想起漫天飞舞的雪——这个自然界的美丽精灵，我的心胸就如同被雪浸润着，顿时就会感到无比的舒畅，眼前总会呈现出清新的景色。童年时光它是我玩耍的伙伴，成年后它是我解惑的老师，随着时光渐渐地推移，我越来越想亲近这洁净的雪。

我出生在冀东一座县城，那里有平坦的原野，那里有开阔的河流，每当冬季来临的时候，原野就会被大雪覆盖，河流就会被坚冰封锁，这时我的故乡是一片纯白。我读书的学校在郊外，放学回来要走过一段乡路，同学们就仨人一伙俩人一伙地，在这雪路上打逗戏闹，把无尽的欢乐撒在这冬天里。所以一说起少年时的冬天，我几乎没有寒冷的记忆，更多的却是充满雪趣的印象。那是个不懂忧愁的年龄，那是个不谙人世的岁月，

那是个不知畏惧的时候，就跟现在的少年一模一样。

有次语文老师上语文写作课，他出了一道作文题《雪天》，我们班上的许多同学，都无一例外地写雪景，写在雪天里愉快玩耍，如实地记录雪天生活。平日语文课比较好的同学，满以为这次的作文卷，准会受到老师的赞扬，个个都在高高兴兴地等待。评点作文的时候到了。老师一开口就说：“你们这次的作文，扣题、文字都不错，应该受到表扬，但是我却不想表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”大家都不解地愣住了，一腔期待的热诚，顿时变成了冰凉。

老师这时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同学们，写文章说是作文，其实也含有做人的意思，你们把生活场景，写得再有趣再真实，那顶多算是照相。还应该学会思索，学会在文章中，融入自己的发现”。这是我在读初中一年级时，一次作文课给我留下的记忆，从此，每逢冬天落雪的时候，看着纷纷扬扬的雪花，就会想起这堂课老师说的话，只是仍然没有领悟老师说的“发现”，当然也就再无机会写新的作文，就这样又度过了许多的时间。

当时光的手无情地把我拖进青年，很快就让我经历了一场苦难，这时的我一下子仿佛成熟了许多。

那年在北大荒的军垦农场劳动，这里冬天的雪比我的家乡还多，只要下起来总是没个完没了，好像非把这大地盖得喘不过气来，那才算是寒冷的北大荒真正的雪天。我们刚到北大荒的时候，居住在自己搭建的土屋里，为了防御零下45度的严寒，总是把屋子捂得密不透风。就连窗户都是用双层棉纸糊着。屋里通常都砌着热炕，还要生起旺旺炉火，这在我的家乡很少见。然而，就是防寒到这种地步，有人还要合衣而眠，可见北大荒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是多少冷呵。

有天早晨醒来想推屋门，两三个人一起推都推不开，有的劳动伙伴说：“别是熊瞎子抵住了，不然怎么这么大劲儿”。大家一听吓得浑身冒冷汗，如果真的被熊挡住出路，在北大荒这一片蛮荒旷野里，每间房都封得很严实，喊破嗓子都无人会听到，有谁能来解救我们呢？那会儿又没有手机寻呼机，就连电话都不是很普及，何况我们是被劳动改造的人，更不会有这种先进装备。

正在我们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我们当中一位年长者，果断地用手指捅开纸窗户，然后扒在洞口朝外一望，他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，弄得我们这些惊恐人，更是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，都着急地询问他看见了什么。他卖了个关子，而后不紧不慢说：“告诉你们吧，你们听了可别害怕——是一群白色的野熊。”这时有的人神情更紧张了。他说完又是一阵放肆地笑。笑完才告诉我们说：“哪儿来的那么多熊呵，是大雪把门封住了。”听后大家不禁“啊”了一声，对于这雪可以封门的说法，我们都有些半信半疑，别说是南方长大的人了，就是我这北方的孩子都不相信，雪怎么会把房屋门堵住呢？

不过事实总归是事实。我们轮流趴在窗户洞前，真切地看过那一片白雪，确实有半人高度时，十几个人都不想说话了，好像都在思索什么事情。最后还是那位年长者，带领着我们大家，连推带撬地把门打开，又一点点地清除积雪，我们才从厚雪的包围中解脱。走出屋门放眼远望，茫茫雪原连着蓝天，一缕杏红色的阳光，正透过薄薄云层，照射在皑皑白雪上，简直是一幅绝美的

油画。大地上一切污浊肮脏，人间的许多忧愁苦闷，这时完全被雪覆盖住了，雪给与的愉快和联想，雪给与的清新和宁静，实在让人觉得雪是那么神圣。

过后许多人说起这场大雪，说起这次雪天的自我惊吓，都觉得雪是美的精灵。它把美好献给我们的时候，总是悄悄地不吭不响，绝不像风似的呼叫不停，也不像雨似的哼唱不止，而是默默地完成它的使命。想到雪的这些美好品质，这会儿真像当年老师说的，在这雪天仿佛有了发现，只是比老师说的晚了几十年，这就怪我这个学生过于愚钝了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有了自己的发现，这也算是我迟交的作文卷吧。

2001年1月6日

蓟运河恋歌

我的童年是在蓟运河边一个小镇度过的。尽管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以及生活阅历的逐渐增加，童年的许多往事正在淡忘，但是蓟运河上的秀美风光，以及两岸的乡村景色，如同一幅故乡的风情画，镶嵌在我记忆的镜框里。每当思念童年的故乡，我就会用深情的目光观赏，这时心灵就会得到些许抚慰。蓟运河，故乡的河啊，你是这般牵动我这游子的心。

当我眺望黄浦江的夜景，灯型船影是那么让我如痴如醉；当我漫游在诗境的漓江，多姿多彩的翠峰是那么让我感叹；当我在南海的渔舍听涛声拍岸，我的心被撩拨得是那么欣喜；当我在万里长江上昼夜畅游，江上的宁静让我思绪万千，祖国山河的美丽这时对于我，再不是诗句音符中的形象，而是具体到可以跟我的心灵相撞，整个生命都融汇在这情境之中。可是请原谅我吧，这时我还是想起了你，故乡的蓟运河。

离开我的故乡几十年，东奔西闯，命运多艰，心中有多少委屈和怨艾，这时我是多么想跟你诉说啊，蓟运河，而你在我心灵的距离上却很遥远。我只能在睡梦中跟你对话，这对于一个远走他乡的浪子，会是多么的痛苦，蓟运河，相信你是绝对想像不出的。可是我绝不会

怪罪你，我知道那时的你又能为多少幸福呢？先是人为的苦难，后来又是地震天灾，你那时还不是跟我一样，只能默默地自己承受。这就是命运啊，不认也得认，别无选择。

总算捱到了这一天，祖国的命运开始好了，我们大家的命运也有了转机，这时我对你的思念比过去也更加殷切。从各种媒体中捕捉有关你的信息，从故乡的来人中打听有关你的情况，只要是关于你的事情哪怕很小很小，在我看来都很重要都很亲切。特别是当我天南地北地走了走，领略过各具风姿的大江大河，越发希望有一天投入你的怀抱。看到南方乡村敞亮别致的小楼，我立刻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，如今我的乡亲们会住上什么房子呢？看到北京城开的农家饭店红红火火，我马上就会联想到，我家乡的吃食怎么就不来风光一番呢。这时我跟故乡的距离实在太近太近啦。

记得是前年秋天吧，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，在天津几位文友精心安排下，我和北京四位老作家，一起到了一趟七里海。到了那里才知道，这七里海就在宁河县，属于我故乡的领地。虽说距生养我的小镇还很远，几乎没有什么回家的感觉，但是北方水乡特有的气息，却也着实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愉悦。同行的几位作家，林斤澜是温州人，李国文是上海人，邵燕祥是萧山人，江南水乡柔美的风景，早就浸润他们的心灵和语言，对于这略显粗犷的北方水乡，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？我不得而知。同行的另一位作家姜德明，算是一位天津人，可是他毕竟多年久居京津城市，对于乡村也并不熟悉，那是

他又是怎么想呢？我同样不好猜测。

我们匆匆地走过七里海，然后应我的请求又来到蓟运河，车子沿着河岸慢慢地行驶，我这离开家乡经年的游子，这时比谁都兴奋都贪婪。我摇开半个车窗玻璃，从有限的缝隙里，大口大口地吸气，那久违了的熟悉的平原气息，轻轻地柔柔地飘进我的肺腑，顿时我的整个身心都有种轻灵欲飞的感觉。此时用什么语言都无法表达我的心情，从心底涌出的又在默诵的只有“回来了”这三个字，如果它能包含着更多的意义的话，那就是我的几十年对故乡的全部思念。而这种思念常常是无须解释的，就如同无法确切地用语言表白，最简便的方式也许正是最好的方式。

我们这次的七里海之行，时间不过半日，匆匆去匆匆回，却满足了我些许思乡之情。当晚接到林斤澜和李国文二位的电话，林老说“真没想到，你老家还有这么好的螃蟹，多少年未吃到过啦。”国文兄说：“嘿，你们家乡的葡萄真好，又香又甜，我以前不怎么吃甜食，这回都管不住嘴了。”我知道这两位老作家，见多识广赞语匮乏，能从他们口中说出这些话，说明我的故乡感动了他们。我这蓟运河的孩子自然高兴。

有次跟李国文、叶楠、邓友梅、张洁一起饮茶，国文我们两个无意间说起这次的七里海之行，张洁马上说：“再有这好事儿想着叫上我。”叶楠和友梅同样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当时我就想，这次实在太匆忙了，倘若真的有机会再来，赶上秋天水产收获的时节，请朋友们尝尝各种螃蟹，以及新下来的稻米、银鱼，相信他

们准会有更美好的印象。那时我的家乡我的蓟运河，说不定会跟作家朋友们，结下更多美好的缘分呢。我的家乡也是散文家罗兰和诗人郑愁予的家乡，我的家乡也是天才女画家周思聪的家乡，这方水土养育了这么好的文人，谁能说她不会让更多的作家文艺家钟情呢？

蓟运河呵，我想总会有那么一天，我再次投身你的怀抱，有更多的时间亲近你。我也一定会用我的方式回报你。因为我对你有着永远的真诚爱恋。

2002年12月12日

心海
夜航

心海
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心海航

心海航

夜梦与昼思

难中拔牙记

这几天牙疼，越到夜晚越疼，疼得难入睡。索性起来走动，或者打开电视看，转移注意力。实在撑不住，就吃药，泰诺林、芬必得，两种洋药混着吃，说明书上让吃两片，我偏吃三片，结果该疼还是疼。药不管用，就骂药商。骂得解恨了，两眼发酸了，就吃安眠药，好歹睡一会儿。

次日，牙照样疼，干不成事，枯坐在书桌前，发呆。

突然电话响起。我喂过两声，对方说了两句：“久违啦”，我却听不出是谁。只好不礼貌地问：“哪一位？”“我是维熙呵”对方说。原来是作家从维熙。“怎么声音变了？”我问：“我这几天牙疼。”我不尽笑起来，说自己也正牙疼。维熙接着说：“昨天跟刘心武通电话，他说他也正牙疼”。这就怪了，怎么都闹牙病，虽说牙疼不算病，疼起来却难受异常。记得作家爱伦堡说过，谁能把牙疼描述出来，谁就成了半个作家，可惜我描述不出来，当然也就连半个作家都当不成。。

维熙夫人是医生，他自然会点医术，就告诉我，诸如用盐水漱口，吃点止疼药一类的话。次日就如法对付这该诅咒的牙病。稍稍好一点儿。本想去看医生，一想维熙尊“妻嘱”说的，疼几天就会好，就又忍下了。我平生最怕上医院，如今年纪大了，小病总是不断，不去

医院还不行，所以是能拖就拖。

日前答应中国文联出版社，主编一套生活类的书，其中有一部是专谈吃的。作家们的文章陆续地寄来，今天就忍着牙疼读这些文章，倒是转移了注意力，牙也不那么疼了。读到李国文老兄的文章，偏巧有一篇《你还有几颗牙齿？》，不禁又诱发起我的牙疼，而且勾起我关于牙齿的往事回忆。

这几年，跟国文兄一起吃喝的事不少，他如今虽然年逾七旬，但是却有一口好牙，尽管比广告姐的美齿差点儿，却比我辈的牙齿要酷。所以在文章中他才敢说：“牙齿很重要，千万不要得牙病”“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人，其标准，首先是要牙好；而人老了以后，能有一副好牙，则是绝顶的幸福”，他甚至于说“作家也应该有一副能吃会吃的好牙齿，广泛吸收营养，才能写出好文章”，等等。这就对了，我说我怎么写不出好文章来呢？原来是牙齿不好。当然，照我的理解，国文说的作家的牙齿，似乎有点一语双关，不单单指自然牙齿，还有个咀嚼知识的牙齿。

那么，我的牙齿不好到何种地步呢？借用国文的话问，我还有几颗牙呢？这都纯属个人隐私，恕我暂不奉告。我的牙齿怎么会这么糟，倒是无密可保，在这里简单说说无妨，算是牙齿的经历吧。

且不要说天天要用的牙齿了，就是人体的别的任何部位，我想也同样非常重要，健全总比残缺要好得多，没有人不想十全十美的。只是有些事情由不得自己。在过去那个扭曲的年代，什么荒唐事都会发生，人身体的好坏完缺，有的也带有时代烙印。比方“文革”中受迫

心海夜航

心海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害，被棍棒毒打致残，被关牛棚得胃病，都是最典型的时代病。

我年轻的那会儿，牙齿不算整齐，却倒也算结实，起码吃蹦豆没问题。在运交华盖以后，三年的北大荒劳改，多年的内蒙古劳动，终年在艰苦的野外，断不了牙齿疼痛，吃止痛片不顶用，看医生无治疗手段，惟一彻底的办法，就是：拔。拔了不疼，拔了省心，拔了踏踏实实劳动，表现得好，改造就好，就有希望回到人民队伍。就这样，一颗颗稍有小病的牙齿，毫不犹豫地拔掉了，一直拔得说话走风漏气，遮住头脑光龇牙误为老者，命运仍然不见如何改变，这时才感觉自己吃了亏。因为牙齿拔得再多，劳动表现再好，感动不了神圣的天公，他不在生死簿上划圈，我照样得规规矩矩捱着。牙拔了，决定不了我命运，就是拔成个“无齿之徒”，都无人可怜。

说到拔牙，倘若是正常地太平地拔掉，那也算好。由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，医生多为“赤脚光足”档次，有时若再不用心操作，类似相声中说的拔牙笑话，就难免会有发生。我碰上的就有两起。

一起是在北大荒。正赶上全国闹饥荒，春天气候燥热，又无正经食物，还要干苦重活儿，睡眠也不充足，身体自然失调，口腔立刻不适起来。先是牙床长出浓包，疼得说话吃饭都困难，就自己用针挑开，硬是挤出浓血，再用盐水漱漱口，然后就去野外劳动，结果感染发了炎，脸肿得像个死猪头。得，只好去农场医院。大夫一看，既不问情况，又不跟你商量，一句话：“你这牙得拔”。我明明是牙床肿，牙齿并未松动，干嘛非要

拔牙呢？我有点想不通，就央求大夫说：“您看我这牙，能不能不拔，等牙床不疼，如果牙出毛病，那时再来拔行不？”“不行。拔了彻底，不会再疼了，省得你再跑，好好安心劳动，不是对你更好吗？少一两颗牙算什么。”我所在的生产队，距离总场还挺远，跑一趟确实不容易，请假过多不利改造，这大夫完全是替我着想，就同意拔掉这颗不疼也得拔的牙。

注射完麻药针，估计药劲疏散，大夫就开始动手。这是我第一次拔牙，害怕得就像上刑场，口腔死死地不愿张开，大夫边训斥边用手抠嘴，汗珠子顺着脑门往下流，流到嘴里跟口水混在一起，由于情绪过度紧张，是个啥滋味都没有尝出。这时只听得嘴里滋滋地响，有个坚硬东西在钻搅，那声音搅得人撕心裂胆，这时才理解“毛骨悚然”，这个成语的形容多么准确。乍一听到这样的声音，恨不得立刻站起来就跑，可是一想到大夫说的“拔了彻底”“安心劳动”，只好乖乖地听任大夫摆布。大夫显然是拔得累了，用白大褂衣袖抹抹脸上的汗，像是自语又像是对我说：“嗨，这颗牙，你别看疼，长的还挺结实。”心想，我可未说这颗牙疼，是你非要给我拔的。最后总算拔出来了，大夫用镊子夹到我眼前，我一看差点晕回去，这颗牙没有一点毛病，由于长得结结实实，拔时连血肉都带出来了。一颗好端端的牙，就这么“光荣”了。

就是从这次拔牙开始，拔了又不能及时镶补，有好几颗牙依次松动。此后，牙再疼，宁可吃大量止疼片，都不想去医院治疗，怕碰到“彻底”医生，再给我来个“彻底”。可是这牙疼并不听我的，疼起来恨不得撞墙打

心海航
L E N G U A G E

心海航

夜梦与昼思

滚儿，说不去医院到时还得去。结果又碰上一次新鲜事儿，医生倒不是“赤脚”的，情况却比“彻底”更糟。

这是在“文革”中期，革命者造反我逍遥，在流放地内蒙闲居。一天突然牙疼难忍，自己用尽所有办法，对疼痛都无济于事，只好又去医院治疗。有过第一次拔牙遭遇，这次说什么也得到大医院，就到了呼和浩特市医院。这家医院仅次于内蒙古医院。医疗设备大夫技术都不错。给我看病的大夫，是位中年男子，人很精干爱说，我一坐上牙椅，他就主动跟我说话。从说话中知道，绥远（现在内蒙）解放以前，他跟一位比利时大夫学医，后来在这家老外诊所干活，“文革”当中被说成特务，审查批斗了好长时间，这才算被解放，重新让他看病。他自然对污陷非常不满，边给我看牙边发牢骚，我怕他不专心就不搭茬儿，光出耳朵听，不开口说话，他这才渐渐不说话了。认真地给我看了看牙，说：“你这颗牙，得拔。不然以后还得疼。牙身都快断啦。”这是个正经大夫，还跟老外学过医，拔牙又是洋医术，我当真一百个放心。就让医生拔了这颗牙。

我所在单位的两派革命者，他们瞎折腾的真正目的，就是要在本单位夺权掌权，过一过当官管人的瘾，心思并不真的放在革命上。对于我这样的老“右派”，知道再怎么也不敢翻天，自然也就放弃了监督，只要隔一两天汇报一下，让他们知道我未乱说乱动就成。此时掌权的一派头头，往日跟我关系不错，尽管表面上对我严厉，其实内心里并没有那么恶，起码我还能跟他说话。就趁他掌权时请探亲假，结果他还真的允许了，于是我就回到内地探亲。父母儿子在天津，妻子一人在唐

山，我就两地来回走，逍遥自在地观赏派仗。十几天的假很快到期，我提前预购好了车票，准备到时返回内蒙。谁知就在要动身当天下午，我的牙齿又疼起来了，位置就在拔过的地方，弄得我一时六神无主，不知如何处置这“突发事件”。想来想去还是走进口腔医院。

医院里冷冷清清，医生也只有几位，听说都去造反了，只留下些老大夫，大概是无资格闹革命吧。给我看牙齿的男大夫，满头白发，身材高挑，用牙镜照着疼痛部位，仔细地观察一会儿说：“你刚拔过牙吧？里边的牙根未拔净，养几天还得拔。”呵！？我一听就愣了。原来是那个被打成“特务”的牙医，给我拔牙时发牢骚说怪话，在精神不集中情况下留下了隐患。幸亏这事发生在我身上，这要是碰上个革命者，人家不说他搞阶级报复才怪呢，找上门去准得有好果子吃。我如实地告诉大夫，我必须得今天回内蒙，并拿出火车票给大夫看，希望他能给我立即医治。大夫本想做些保守处理，让我回到内蒙再拔掉这半截牙，可是我又实在不想再见那“特务”，就将那位大夫情况说了说，这位老大夫最后说：“你若是非要今天拔，一是你得不怕疼，二是路上不要感染，不然出了事更不好办。”我都一一答应了，老大夫这才动手，拔出了那个牙根。

我的这两起关于拔牙的故事，跟那两位大夫的草率粗心，当然是有一定的直接关系。但是我却一点儿也不怪他们，在那样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里，凡事都以政治论对错，凡人都以阶级分亲疏，再敬业的人都被搞得心灰意懒，谁能保障工作不出差池呢？尤其是像我这样被专政的人，在漫长的劳改岁月里，碰上这样的事更不足

怪。现在由于牙疼回想起来，当做笑话随便说说，尽管多少有点苦涩，甚至有点黑色幽默，但是毕竟是我的一段经历，让今天的人知道一下，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。

这会儿满大街都有美容店，美发、美容、美甲，还有美齿，一看到这些招牌广告，就从心里有种羡慕感。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，实在太幸运太幸福了，赶上了可以美化个人的岁月，连身体任何部位都沾光。而我们所经历的年代，却是对心灵身体的摧残，这难道还不值得今天的人，为自己庆幸吗？

2002年3月22日

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我在北戴河休养，住在一家休养院里。我住的别墅阳台很大，每天晨昏时分，我就坐在这个阳台上，听虫鸟的婉转歌唱，赏花草的百态千姿，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天福。身处这样的环境里，人的神经是最脆弱的，寂寞和孤独罩上心头，有时竟然会想到人生。觉得人活几十年辛苦奔波，最后还是得重返来路，就会产生某种看透世事的惆怅。可是当我看到眼前那蓬勃生长的小草，冥冥之中仿佛受到了生存启示，这时才意识到生命还有顽强的一面。你看那丛丛小草，葱茏茂盛，青翠欲滴，充满着向上的朝气。小草不知忧愁不计荣辱，活得是那么快乐而自在，这不正是生命应该具备的素质吗。

有天傍晚，天空阴云密布，大地狂风飞刮，紧接着就是一场大雨哗哗地倾泄，不甘示弱的雷也赶过来凑热闹，轰隆隆暴躁地大声怒吼，把个原来宁静异常的疗养区，搅得失去了温馨的常态。后来雨渐渐地小了，却一直没有停息的意思，我就早早地睡下了。在宁静的夜里，听淅淅沥沥的雨声，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。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。我照旧坐在阳台上赏景听唱。这时我忽然发现，那些多姿的繁花，许多纷纷落地，那些茂密的小草，也萎缩了身躯，就连多嘴的虫鸟，都紧闭了歌喉，显然这是被暴风雨摧残的。一群活脱脱的生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了形。这是天公过于厉害，还是生命过于荏弱，我没有认真地去想，只是觉得有种莫名的怜惜。

很快又是晴天朗日。傍晚再来看楼前景色，花儿被摧残的容貌依旧，却已恢复了清爽的神态，虫鸟重新歌唱，只是声音不再那么动听，而那小草却生机重现，好

像不曾被风雨摧残过，越发显示出小草生命的坚强，以及机敏的自我救护的能力。看到这情景我由衷地赞美小草。

可是未过几天我忽然看到，小草又陷入了艰难的处境，有一长缕被人狠狠践踏，绝对不会再有自救的能力。一棵棵可怜兮兮的小草，在苦苦地挣扎着叹息着，说不定还有些许怨艾，或者是对自己命运的哀叹。我走到近前一看，这些小草正在枯萎，往日的清爽神情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多亏有一位好心的园林工人，把这些小草重新扶起来，并给他们喷洒洁净的水，让它们振作起来生活。这富有灵性的小草，还真的不负人望，渐渐地恢复了生机。这小草是多么知趣知足，仅仅给予一点小小关爱，就感动得如此不计怨怼，重新无私地献出自己的绿色。可见生命的需求并不都是那么欲壑难填，只要给予一点应有的关照和爱护，它就会以百倍的奉献回报人间。只可惜我们常常忽略了生命这点小小的需求，有的人为追求一己之利而放弃对他人的珍爱，这是多么的残忍和短视的恶劣行为啊。

联想到这小草的兴衰，结合听到的空难消息，我觉得人间的许多惨剧，是完全可以不再重演的，这首先就要清除那些错误的观念。比如过去提倡的不怕苦不怕死，就不应该笼统地当做一种英雄行为，不分场合情况地强行误导。如果大敌当前或者追求真理，在无法保存生命的情况下，当然需要义无反顾地献身，因为这样做也还是为了生存。倘若是在正常生活的情况下，人都是向往美好事物的，为何不珍惜这只有一次的生命呢？只有看重生命才会珍贵生命，只有珍贵生命才会保护生命。遗憾的是现在的人，只看重自己的生命和金钱，却

拿别人的生命当儿戏。

就在我回到北京不久，接连听到几起煤矿出事的消息，事故本来就够让人揪心了，不曾想还有矿主逃逸官员隐瞒，这种更为恶劣卑鄙的事情发生。我真不明白，这些人的五脏六腑，难道是石头做的吗？竟然见死不救。一个有法律做基石的文明社会，让这样的人来主宰能够文明吗？我不相信。这时我又想起在北戴河见过的小草，还有那位扶起小草的可敬的园丁。相比之下人有时候倒不如那些小草幸运。可是我们又能够说什么呢，只有轻轻地唉叹一声，表示一点做为同类的良知。珍惜自己的生命，更要尊重别人的生命，这个社会才会更美好。

2002年8月4日

跟着足球一起风光

心海
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跟着足球一起风光

每届世界杯足球赛，最活跃的观球群体，除了散落的各色人等，能够形成一定阵势的，大概要属作家中的球迷。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全国报刊谈球的文章，几乎都出自文人之手。有些写长篇小说的球迷作家，这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放下笔，坐在电视机前喝茶吸烟观球；有些本想参加外地笔会的作家，这时都会找个理由推脱掉，生怕错过一场可能精彩的比赛。没有任何时候任何题材，让这么多作家自觉地投入写作，而且每一篇文章都激情澎湃。这时作家写的短文几乎跟足球一样好看。

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，由于有中国队参加比赛，不管输赢总算冲出亚洲，跟着一起助威的球迷，就更少不了这些作家们。仅仅从我能够看到的报纸上，发表谈球文章的熟悉作家，大概不下十几二十位，还有些作家知道名字并不认识，他们共同构成了这届杯赛的文人方阵。像刘心武、陈建功、雷达、杨匡满、刘震云、刘醒龙、高洪波、赵丽宏、萧复兴、萧力军、朱铁志、孙武臣、孟久成、张伟刚等作家，历来都是世界杯足球赛的积极分子，这次写谈球文章就不必说，就连赵玫、徐小斌、徐坤这些女作家球迷，这次都或写文章或上电视大谈足球。这三位女作家的足球情结，我在几年前就有所耳闻，至于她们迷到什么程度，却没有谁具体地说过。那年在大连开中年作家创作会，她们“逃会”访问足球

教练迟尚斌的事，当时成为一段文坛佳话，我这才知道她们是真正的球迷。今年世界杯赛电视谈球节目里，小斌更是堂而皇之地成为嘉宾，在千百万观众面前侃侃而谈，也算是创作获奖之外的风光吧。

赵玫、徐小斌大连专访迟尚斌那次，记得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也去了，当时以为她不过是一位陪客而已，绝对不会是赵玫、徐小斌式的球迷，也未见她的作品里像徐坤那样出现过“狗日的足球”，这次见到她亲手制作的足球娃娃照片，以及她写的足球娃娃的文章，我才知道自己想错了，敢情这位文静的女作家也是个真球迷。还有一位作家是球迷我未想到，这就是我的老朋友作家林希。有天晚上我们两个通电话，我问他最近干什么，他说他正在看世界杯足赛比赛，接着他就在电话里，说起他看足球比赛的种种感悟。由此可见这足球比赛迷住了作家，让他们像写作时一样的快乐，说不定足球还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呢。读了张伟刚写蒋子龙看足球的文章，知道写《白鹿原》的作家陈忠实也是个球迷，而且迷到坐飞机专门去外地看球的程度，这也算是作家中的一绝吧。女作家中的球迷，原来只知道赵玫、小斌、徐坤，读了伟刚的文章发现，云南女作家海男也是个球迷，据说看球时还有初恋的感觉，可见迷得也够“段位”啦。这也算是足球的可爱吧。

有这么多作家看足球谈足球关心足球，那么是不是还有作家想伸伸脚踢两下呢？有的。那年我供职的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，跟江西的《足球俱乐部》杂志社，打算联合组织一个作家足球俱乐部，像影视明星足球队那样，在写作之余让作家们乐和乐和。跟国家体育主管部门一说，人家还真爽快地答应了，喜欢足球的作家们很

L. S. H. D. H. S. N. S. S. W. S. H.

心海
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高兴，中国作家协会有的领导也支持。后来因有人对此事提出质疑：“作家搞什么足球俱乐部啊，是不是还要搞钓鱼俱乐部呀？”好端端的一件事被他搅黄了。大家都非常扫兴。

真是岂有此理。难道作家就不是人了吗？是人就有七情六欲更有爱好，怎么就不能成立足球俱乐部呢，就是成立钓鱼俱乐部也未尝不可。再说作家玩足球钓鱼，也是一种生活体验，有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体验，说不定会写出有关的好作品哪。这有什么不好啊。

作家的主业是写作，这毫无疑问，可是除了写作也得有活动，没有个好的身体何谈写作。老一代作家未赶上好时候。1949年前的作家写作为了糊口，1949年后的作家在政治上遭难，别说是踢足球钓鱼这些事情啦，就是真正踏下心来写作都没有可能。直到近20多年来国家安定了，作家既不愁吃喝又不挨整，他们才有条件潜心从事写作，这个时期有不少好作品不断问世。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坛的中青年作家，许多人的文化素质比较高，对现代生活方式有一定的追求，给作家们创造了一个好的生存环境，这是非常正当完全应该的。比方这“狗日的足球”，既然作家们这么钟情，就不妨把他们组织起来，愿意踢的就踢两脚，愿意侃的就侃几句，说不定中国人又爱又恨的足球，因为有作家的介入成了气候呢？米卢、施拉普纳、霍顿这些洋教练，曾被一些国人捧得近乎于神，其实仔细想想他们的全部本事，有一半儿不就是靠一张会摆话的嘴吗。就是那位在一时激动下被塑了青铜像的米卢，也只提出了个“快乐足球”的理念，早知这一招儿也多少管点事，作家们侃的绝对比他说的更好听。

总之，这足球很让许多作家着迷，就连我这个不常看球赛的人，有球赛时也偶尔瞧上一两眼，那惊心动魄的争夺场面，着实让我也激动了好一阵子。至于足球比赛时的种种表现，给予人们的多方启示和无限联想，就更丰富了作家们的思路，在创作上有些帮助也是可能的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米卢的足球“快乐”说，在球场上的比赛用处不大，对于球迷们倒是很有用，起码在看比赛时不想那么多，输了赢了不就是那么回事，只要让自己快乐就是好球。学习蒋子龙“只为好球喝彩”，这才是真正喜欢球的正路子。只要看球快乐，咱就看球找快乐，这不是挺好吗。快乐了写作也就有了好心情。说不定有哪位作家，在好心情下写出一部巨著，获得个什么大奖名奖，岂不是大家更快乐。

足球，作家们跟着你一起风光。

2002年9月18日

两都步行街的黄昏

那时去奥地利，还没有直达航班，得由莫斯科换乘。一位熟悉莫斯科的作家，特意提醒我说，到了莫斯科，不管时间怎么紧，你一定得干两件事，一件是去逛阿尔巴特街，一件是买张《莫斯科新闻》报。我们到了莫斯科，因为是过境停留，时间只有一天，好多想去的地方，都没有来得及去，不过还是看了看红场，闲逛了阿尔巴特街。

阿尔巴特街座落在红场旁，是莫斯科的一条著名步行街。到莫斯科的当天下午，恰好有一点富裕时间，我们就结伴去了这条街。这条街好象并不很长，米黄色的楼宇，碎石的花纹路，典雅的方型灯，别致小巧的报刊亭，在落日余辉映衬下，都显得异常地宁静。街上弥漫着的浓厚文化气息和情调，立刻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，读过的那些俄罗斯小说，以及看过的苏联电影，在感觉上特别亲切。

刚步入这条街的街口，几位街头画家的画摊，就吸引住了我们。这里的画家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他们的绘画作品，大都是风景和人物，一件件摆放在摊前，供来往游客欣赏，如果你看中哪一件作品，当时便可以议价购买。据陪同我们的翻译讲，选购之前你赞扬几句，说某幅画画得非常好，画家以为你懂画，一高兴就会少要点钱。地摊画家很少名家，沦落到街头卖画，总有个

心海夜航

心海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面子问题，最怕别人瞧不起他，你一夸他画得好，他自然会得意洋洋。

在一位老画家的身后，我驻足观看了一会儿，他正给一位女孩画像。只见他手握粗炭笔，在画布上划了几道线条，一张透着青春朝气的脸面，就清晰地勾勒了出来。那娴熟的技法，那准确的眼力，仿佛都在告诉人们，这是一位以此谋生的画家。当我走到他的侧面，他暂停画笔微笑点头，像是表示欢迎，又像表示感谢，显得是那么彬彬有礼。我立刻向他伸出拇指，送上我由衷的称赞，他又用生硬的汉语，说了声：“谢谢”，接着继续他的绘画。

我们顺着街道往里走，这样绘画卖画的地摊，以及出售报刊古玩的地摊，大大小小的还有许多处。这种纯朴独特的艺术环境，不仅点缀了城市的街景，而且陶冶了人们的心灵，属于真正的俄罗斯民间文化。难怪那位熟悉这里情况的作家，建议我们到了莫斯科来看看这条街，这跟到了北京要逛琉璃厂有同样意义。在莫斯科度过的这个黄昏，虽说仅仅闲逛了阿尔巴特街，却也让我着实地感到满足和惬意。跟莫斯科的白桦林一样，让我久久难以忘怀，什么时候想起来，都有种说不出的愉快。

从莫斯科到了维也纳，我国驻奥国的大使先生，在欢迎宴会上致词，他特意说：“你们是作家，跟其他的来访者不同，建议你们一定要去克恩顿大街看看，时间最好是在黄昏。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。”至于为什么要在黄昏去，为什么我们一定会喜欢，大使先生没有仔细地说，这就更增加了对我们的诱惑力。

依照大使先生的指点，我们特意选择了个黄昏，来到著名的克恩顿大街。先是在圣蒂斯芬大教堂，观赏了件件精美的艺术浮雕，仰望了高入云端的教堂尖顶，而后就在附近的咖啡屋小座，边饮咖啡边透过窗户看街景。天渐渐地昏暗下去，灯盏盏地明亮起来。本来就玲珑剔透的维也纳，在五彩缤纷灯盏的照耀下，此时越发显得富丽堂皇，使人的感官和心气都很清爽。看来真正的黄昏来到了，正是逛步行街的好时候。

我们刚走出咖啡屋的门，就听到飘来悠扬的琴声，那深长悠怨的迷人旋律，分明是我们都熟悉的《小夜曲》。于是我们寻着琴声的方向走去。到了拉琴人面前才知道，其实正式演出还未开始，这支小提琴曲的演奏，是卖艺人在拉场子。更多的街头艺术家，正调试琴弦和擦拭乐器，为正式演出做准备。我们站在这里观看了一会儿，就继续往街的深处走，沿街都是带着各种乐器的艺术家。

走到街的一处，看见一位中年男子，在手风琴的伴奏下，正放声歌唱《桑塔露琪亚》，声音圆润高亢，声色也很有韵味儿。他个子不算高，身体略显肥胖，满脸络腮胡子，如果不是在街头，猛一瞧颇像大歌唱家帕瓦罗蒂，只是手中少了一块白丝绸手帕。不过这位艺人还是颇有磁力，很快就有许多路人围拢过来，静静地听他演唱一曲曲老歌。在维也纳这座音乐之城，古典音乐远比通俗歌曲，似乎更容易受人们喜爱。

过了不多久，琴声歌声此起彼伏，融汇在初上的华灯里，使这条古老的克恩顿大街，成了灯影歌潮的长河。这时我们才真正的明白了，大使先生建议的真正意

图。克恩顿是维也纳的步行街，也是维也纳的音乐街，更是维也纳的文化窗口，来维也纳的人不到克恩顿大街，怎么算是走到这音乐之城呢？又怎么能领略奥地利人对文化的痴情呢？

哦，从莫斯科到维也纳，几天之内逛了两个都城步行街，在一条街上赏画，在一条街上听歌，愉悦了我们的感官听觉，更激发了我们的无限遐思。

谁都知道，俄罗斯的绘画历史上，曾经产生过许多位大画家，他们丰富了人类的画廊，阿尔巴特这条步行街，就用画来展示风情，这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。奥地利这块音乐沃土上，曾经养育过众多大音乐家，他们的乐曲至今响彻世界，克恩顿这条步行街，就用音乐来装点黄昏，同样有着自己恰当鲜明的特色。可见把一条街辟为步行街并不难，难的是像这两条街似的如何有特点，而且这特点是这座城市乃至国家，过去和现在历史、文化的体现。这样的街给人留下的印象，就不只是没有车辆行驶，只许人行的表面形式，更多的还是民族文化的内涵。这也正是步行街的真正魅力所在。

你若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，就看他闪动的眼睛，眼睛是他心灵的窗户。你想了解一个城市的底蕴，就去逛它的步行街，步行街是它的真实面孔。别看这只是一条街道，绵长历史，万种风情，都可以在这或宽或窄的街上找到。

我国的一些大城市如今也有步行街。北京的大栅栏，上海的南京路，天津的滨江道，都是著名的步行街，他们同样透着文化味儿。信步走在这些步行街上，绝对没有浮躁的情感，以及商业浸染的欲望，有的只是

对这座城市的亲和。这大概正是人们愿意逛步行街的原因。不过逛过后总觉得缺点什么，这一处和那一处，这一条和那一条，好象没有太大的区别。那么到底缺什么呢？后来认真地想想，缺的不是别的，缺的正是阿尔巴特和克恩顿这两条世界著名步行街的特色。

2000年1月6日

心海航

心海航

夜梦与昼思

富建胡同记事

在北京火车站的对面，有条叫富建的小胡同，我大致还记得它的方位。有次去《北京观察》杂志开会，先到了一个小时，就想到这条小胡同看看，转来转去好久怎么也找不见了。就问一位老人，据他说，前几年盖国际饭店，这条小胡同就被拆除了。我听后，只是“噢”了一声，就再未说什么。而后就快快地走开了。

这就怪我多情了。其实这条小胡同，既不是我的出生地，也不是我的老住宅，只是因为《三月风》杂志在这里诞生，我参与过初创时的一些工作，仅此而已。那是在1983年，当时我在《新观察》杂志供职，《人民日报》的朋友冯并来电话，让我参加一本杂志的创办。既然是朋友热诚邀请，我也就不便多说婉辞的话，再说当时我的精力又旺盛，多做些事情也是种寄托。就这样走进了富建胡同一号院。这是一个老旧的四合院，不大，地处繁华市区却很僻静。到了那里才知道，这里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，由于这个机构刚刚起步，工作人员大都是自愿尽义务，根本没有任何报酬，不过每个人的工作热情都很高。一走进这个小小的四合院，就给人一种紧张而愉快的气氛，这是个机关却没有陈腐官气。

那天跟我先后脚走进这个小院的，除了我认识的冯并先生，还有《文汇报》郑新永、《健康报》张恩荣两位先生。接待我们的是刘刚奇先生和王勤女士。刘刚奇

先生当时任宣传部部长。王勤女士在空军部队服役，当时好像是生病在家休息，有时就抽空来帮忙做些事，就是由她找到冯并先生，邀请我们来商量办刊的事。先由刘刚奇先生简单地介绍了一些情况，这时才知道这个残疾人福利基金会，是由邓朴方先生出任理事长，要办杂志的设想就是由他提出来的。据说，在我们之前曾经找过几拨人，跟邓朴方先生当面商讨后，邓朴方先生都不十分满意，这样就又找到冯并等三位先生，而这三位考虑《新观察》办的不错，就建议冯并拉我来一起操办。自此我就跟残疾人福利基金会，有了一段尽社会义务的机缘。

记得跟邓朴方先生见面，是在他座西朝东的办公室。说是理事长办公室，实际上很简单，陈设就是几张简易沙发，还有一张铁架子单人床。邓朴方先生“文革”中受迫害致残，起居活动都需要别人帮助，跟我们交谈时就躺在小床上。这时在我面前的邓朴方先生，只是一位普通的年轻残疾人，意念里跟他的家庭根本联系不起来，所以当三位先让我发言时，我也就毫无顾忌地直率地说：“朴方同志，我们先说说我们的看法，然后再听听你的意见，如果我们的办刊思想比较一致，我们就帮助你们办这个刊物。如果想法不一样，你就再另找别人，以免耽误你们的事。”朴方先生见我如此爽快，他就立刻表示：“我看可以，你们先说说想法。”随后我们几个人，就逐个陈述了想法。最后达成这样一个共识，这本刊物不办成机关刊，要办成一个社会生活刊物，结合点放在：反映残疾人生活，提供残疾人想看的内容，这样，既有残疾人的特点，又不脱离一般读

心海夜航

心海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者，以便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。

如此爽快利落地，就决定了刊物定位，这在当时的中国，可以说是不多见的，因此我们都有了信心，当场表示愿意做这件事。

这样快就有了办刊眉目，邓朴方先生也颇感满意，他随后说了说他的想法：“我们办的是残疾人刊物，一定要高扬人道主义旗帜……”听他这样说，我们四个人不尽愣住了，当时理论界对此说颇有异议，还真没有人这样直接提出来。估计邓朴方先生看出了我们的心思，他就进一步解释说：“其实我们国家是最讲人道主义的，你们想想看，有那么多战犯经过改造，最后都释放了，这不是人道主义是什么？我们残疾人事业，当然要讲人道。”（大意如此）听了邓朴方先生的一席话，我们感觉他是个开明人，这就在办什么样的刊物上，打消了我们事先有过的顾虑，觉得完全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尝试。

办刊的思想是统一了，接下来就是刊名的问题，有的人说叫《强者》，有的人说叫《残疾人刊》，等等，几天都没有最后定下来。考虑不要为刊名的事情耽误时间，就暂时搁下做些栏目内容的设想。当时有人提出来，请几位领导人给题词，这在残疾人福利基金会，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别说有邓朴方家庭背景了，就是没有邓朴方先生在这里，当时也还有别的高干子弟，刘刚奇先生就应诺由他办。他首先想到的是，请邓小平同志给题字，跟邓朴方先生说了后，邓朴方非常明确地表示：“这不行，哪能儿子办刊物，老子题词，谁都行，反正都是叔叔、伯伯的，我想总不至于被拒绝。”结果

心海航



夜梦与昼思

请了胡耀邦、王震两位领导，给这家新创办的刊物题了词。

这本由残疾人组织办的综合刊物，经过短短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各项工作基本上就筹备就绪了。随后我们召开了个新闻发布会，地点在贡院胡同四川办事处招待所，由邓朴方先生亲自主持并回答提问。这个会开得很活泼生动，像聊天似的交流情况，既发布了新闻，又听取了意见，对办好这本刊物很有益处。就是在这次会上，有的记者（好像是《文汇报》驻京记者刘群先生）对拟定中的刊名，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，认为不应该这样直露，最好含蓄一点又有意义。邓朴方先生当即表示同意，并让我们办刊人再想想。我便悄悄询问邓朴方先生，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成立时间，他告诉我说某年的三月份。可能是受大家发言的启发，我的灵机一动想出了“三月风”，一来是三月正是自然顺序的春天，二来是三月是残福会成立月份，而加上风字且有春风之意，这样也含有改革开放的机遇。邓朴方先生觉得可以，当场征求大家意见，普遍认为比预想的名字好。从此在中国的报刊林中，多了一本名为《三月风》的期刊。

刊物有了名字，很快又有了稿件，接下来就是版面设计，以及发行上的事情。那三位朋友都是办报的，关于期刊上的事情没我了解，这两件事又自然放到我头上。我就找来《新观察》的美编刘国庆先生，请他设计创刊号的版式和封面，同时找来在《新观察》工作的刘景立先生，帮助跑出版发行这些具体事宜。封面的《三月风》刊名题字，由郑新永先生操办，他认识书法家沈

心海夜航

心海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鹏。沈鹏先生的字潇洒飘逸，而且很有富贵气，给这本新杂志大为增色。《三月风》杂志正式出版以后，在长城饭店举行了一个首发式，规模很大，来宾很多，立刻在新闻出版界有了影响。随后我们又请了几位著名作家，担任这本杂志的顾问或编委，以便增加它的社会影响力。我们这四个创办人的任务，自此算是完全圆满地完成，陆陆续续地撤离《三月风》。但是我们跟残福会的一些人，如刘刚奇先生、孙中华先生等却成了朋友，我从《新观察》调到作家出版社，还曾建议他们创办出版社，并帮助刘刚奇先生草拟办出版社方案。

国内的民间团体邀请港台艺员，来内地演出谁家第一个，我没有跟别人询问过，反正我知道，残疾人基金会是比较早的一家。就在我们筹办这个杂志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邀请香港艺员奚秀兰，经过几次与她的经纪人商谈，最后在首都体育场举行了义演。《三月风》杂志专门派记者对奚秀兰采访。正是因为有这样近水楼台的条件，《三月风》也就成了国内杂志中，比较早的报导香港艺员的一家。创刊号的封面就是用的奚秀兰照片。

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美籍华人作家江南先生来访，我跟他谈作家出版社出版业务时，他知道我帮助创办了《三月风》，这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非常高兴。他说：“这是善事，积德的事，凡有能力的人，都应该帮助残疾人。”在他去世前给我来过一封信，还念念不忘给《三月风》写文章。他写道：“在国外也很重视慈善事业的，你们做的事很有意义。杂志出来一定寄给我，我还可以给写点文章。”可惜还未容他看这本杂志，更

心海航
夜
L. S. H. S. N. S. W. S. H.

没有来得及写文章，江南先生就被一颗罪恶子弹夺去了生命。这也算是给《三月风》杂志留下的一段佳话吧。同时他的话也更让我认识到，我们帮助创办这本杂志的真正意义，体会到为残疾人做点能够做的事，无论对谁都是应尽的社会义务。

如今，那个小院早就被不相干的人忘记了，即使有人偶尔提起来，我相信也不会动情，然而对于我却完全不同，它记述着我的一段经历。所以每每看到《三月风》杂志，我就会想起那座小院，以及那些让人难忘的日子。这时心里就会有种欣慰感。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做点事也是幸福啊。

2000年11月14日



夜梦与昼思

BEIYINGCESHEN

背影
侧身



走近诗人艾青

年轻的时候，喜欢诗——古代的、现代的，如同陈酿和新酒，都让我如醉如痴。开始只是读诗，后来学着写诗，还真的发表过一些，但是，终究未能成功。这说明，我跟诗无缘。无缘，不便强求，从此不再写诗。

跟诗无缘，却跟诗人有缘。在当代著名的诗人中，总有十几位，是我多年的朋友。像崇拜诗一样，对于这些诗人朋友，我都有敬佩之情。尤其是诗人艾青，他的人品文品，更是让我敬仰。

如今艾老走了，离开他满含泪水深沉热爱的土地，到他该去的地方去了。再也看不到他的笑容，再也听不到他的歌唱。我们永远再也见不到这位“诗坛泰斗”了，我们只能用回忆深深地怀念他。想起同艾老有过的接触和交往，越发感到他是那么正直、善良、真诚，他的为人如同他的诗文一样，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。

可以这样说，在喜欢上新诗的同时，就喜欢上了艾青的诗。五十年代在《文艺学习》杂志社的会上，曾经亲聆艾青谈诗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大诗人，从此，每次拜读他的诗，自然而然地跟他的形象连在一起，这就更增强了我对艾青的诗的兴趣，这时我是多么希望有一天走近艾青啊！

还未容我寻找走近艾青的机会，在五七年那场政治灾难中，艾青就倒了霉，热爱艾青的读者，再也读不到他的诗了，他的名字也在报刊上消失。我自己因为喜欢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文学又写了一些东西也遭批判，最后被戴上“右派”帽子送到北大荒，开始了漫长的定罪不判刑的流放生活。那时在北大荒流放的“右派”中，有许多赫赫有名的文化人，像我知道的聂绀弩、吴祖光、丁聪、丁玲、黄苗子、尹瘦石，等等，艾青也在其中，只是跟我们不在同一个农场。由于这些人在社会上名声大，他们来北大荒的情况，自然引起大家的注意。跟我在一起流放的文化界“右派”，有的是诗人，有的是同我一样的诗歌爱好者，我们常常背着管教人员一起谈论艾青，即使在那种特殊的境遇里，我们也想见见这位久仰的诗人。后来艾青从北大荒去了新疆，我们更没有机会见到他了。

我真正地走近艾青，是在二十几年以后，艾青唱着《归来的歌》，从新疆回到北京。那时，我的“右派”问题还未解决，从内蒙回到北京，被一家大报借调来编副刊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艾青的诗《红旗》，刚刚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，尽管版面位置并不显眼，但是做为艾青即将复出的信号，这首诗立刻引起了读者的注意。于是我向报社的分管副总编辑建议，是不是可以考虑设法找到艾青向他约稿，以便使我们的报纸副刊有更高的品位。可是话一说出口，我又有有点后悔了，因为自己也是“右派”，万一被人误解上纲上线，那非得吃不了兜着走了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的两位上司，人都很开明，他们经过认真研究，同意向艾青去约稿，并决定由我负责。这样就让我有机会真正地走近了艾青。

那时候要找艾青的人很多，有外国友人，有报刊编辑，有一般读者，他们向有关方面打听艾青住址，常常是被很有礼貌地回绝。我在五十年代就认识老诗人蔡其矫，老蔡是艾青的朋友，我通过老蔡的引荐，自然很顺

利地找到艾青。打这以后我跟艾青、高瑛夫妇成了朋友，这么多年来他们给过我不少关心和帮助，我对于他们二位的为人也有了较多了解。

艾青从新疆回到北京，他的创作热情非常高，我每次去他家，他都有新作拿给我看。他那时写的《高山的风》、《镜子》、《花样溜冰》三首诗，经我手在我们报纸副刊发表，由于在版面处理上比较显著，艾青非常满意，这样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信任。他曾对我说，他从新疆回来以后，在各报刊上发表的作品，只有我们报纸版面处理得好。他还告诉我，他过去在报纸上发表作品的位置，不是放在头条，就是像张桌子放在中间。言外之意是，我们未因他的问题没解决而有顾虑，这使他非常感动，这之后只要是我去约稿，他从来没有拒绝过。这种作家和编辑之间的相互信任，后来发展成忘年朋友之间的信任，连我代别的报刊约稿，艾青都肯给我面子，使我感到艾老是个很重友谊的人。北京有家大报副刊编辑，几次找艾青约稿都未拿到，这位副刊编辑跟我认识，他知道我跟艾青交往比较多，让我给他帮忙，我答应帮他试试看，成不成没有把握。我们一起到了艾青家，我跟艾老一说，他非常爽快，立刻打开抽屉，让我们从他新写的诗中选。

我调到《新观察》杂志工作以后，跟艾青同在中国作家协会一个大单位，我去他家的次数更多了，杂志社的同仁都知道这个情况。那年杂志社领导打算在《新观察》封面人物照片上配诗，决定约的第一位诗人就是艾青，想请他给足球运动员容志行的彩照题首诗，杂志社领导就把约稿的任务交给了我。我去艾青住处那天是个下午，恰好还有一位认识的诗人在他家，我便把来意跟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高瑛大姐和那位老诗人说了说，他们都认为艾青不会答应，因为他很少有让人命题作诗的时候，我听后立刻心里凉了半截儿，不过仍然有些不死心，还是想亲自试探一下，完不成约稿任务也总有个交待。我先是跟艾青闲聊别的话题，后来问他看电视看不是足球比赛，知不知道足球运动员容志行，待这些得到肯定答复之后，我便乘机向他约稿。艾老明白了我跟他聊天的意思，笑着说：“原来你是在套我呀，好吧，我写写看，过几天你来取。”没过几天，接到高瑛大姐的电话，我立即赶到艾青住处，拿到了艾青这首诗。艾青说：“你看行不行，不行我再写。”这首只有十二行的短诗，既写了足球比赛的场景，又赞扬了运动员容志行，我非常感激艾老对我工作的支持。这首诗是不是艾青写足球比赛的惟一的诗，我没有问过艾老和高瑛大姐，这首诗是《新观察》杂志封面上的第一首诗，我想大致是不会有问题的。我把这首诗的诗稿带到编辑部，杂志社的领导和同仁们都很高兴。

艾青、高瑛夫妇都是乐于助人的，认识他们的人谁有困难找到他们，只要是能帮上忙的事从不推辞。我在报社编副刊时，工作比较紧张，有时还要上夜班，很想换个宽松的工作。艾老知道了我的心思，他立即跟高瑛大姐商量，介绍我去找著名记者子冈。当时子冈大姐正筹备《旅行家》复刊，急需要人，艾青夫妇推荐我去当编辑。忘记后来是什么原因未办成，使我失去了在子冈大姐手下工作的机会，但是对于艾青夫妇和子冈大姐的帮助，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那年得知子冈大姐生病住院，我特意去北京卫戍区医院看望，并当面向她再次表示感谢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著名作家。艾青夫

妇长期在逆境中生活，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听到别人有过不幸的遭遇，最容易引起他们的恻隐之情。不知是谁告诉了艾老和高瑛大姐，我爱人曾在“文革”中受到迫害，至今身心健康都未完全恢复，他们不止一次地吩咐我要好好照顾。我爱人是学音乐的，做过多年音乐教师，为了医治她的精神创伤，那年拿到一本新书的稿费，很想给她买架钢琴，只是还缺三百多元钱，艾老知道以后，立刻让高瑛大姐接济我。当时他们也才从外地回来不久，家中人口多，还要应酬朋友，经济上肯定不会宽裕，我自然不会为难他们。但是，他们的这份真诚心意，我是会永远记住的，现在只要看到家里的钢琴，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。

我在文化界前前后后混迹有几十年，认识的文化人应该说不算少，由于中国过去的不安定政治生活，文化界这个特殊群体中，有的人为了保护自己，常常就会把思想遮罩起来，在公众场合甚至朋友面前都不说真话。我接触的诗人艾青，却是个非常真实的人，他有孩子般的坦诚，同时又有经世老人的豁达，这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艾青一家从新疆回到北京，开始好长时间居无定所，艾老好像根本不介意这些。跟他有着相同命运的一位老作家，刚回北京也是没有固定住处，后来住进了木樨地的部长楼。我以为艾青会对此事有想法，就对他说：“艾老，人上了年纪，住平房更方便。”艾老听后宽厚地笑了笑说：“你别安慰我了，我知道，人家不给我。”仅此说说而已，既无牢骚，又很真诚，许多人恐怕难做到这样。还有，中国作家协会首批享受政府津贴的人，除了像冰心、臧克家这样成就卓著的作家，大家知道后没有任何议论，对于个别利用职权抢先获得的

心 航

夜梦与昼思

人，群众难免在私下里有些说法。我去看望艾青时，闲聊中跟高瑛大姐说到此事，不料让艾老听到了，我只好从实招来，并代当权者寻找理由圆场。我说：“可能是考虑你的级别高，没有给你。”艾老听后笑了笑，无所谓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别安慰我了，人家不给我。”既没有摆成就，也没有说怪话，泰然而真诚地处之，同那些依仗权势掠取名利的人，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。

熟悉艾青的人都知道，他的语言充满智慧和幽默，几句话就能把你和他的距离缩短，哪怕是头次见他的陌生人，听了他的话立刻会消除初见时的拘谨。艾老的爱憎心里有数，同样是平和而幽默，很少见他直通通的表述。他有次重病初愈之后，我们去看他，见他的面色、精神都很好，大家说多亏有高瑛大姐精心照顾。这要是在别人，无非是夸夸老伴儿。艾青则幽默地说：“你们说的完全对，高瑛是个好‘饲养员’，看把我养的多壮实。”对妻子的夸奖和感激，尽在一句平淡幽默的话语中，这就是诗人艾青的表达方式。同样，对个别熟人看法，他也是很少议论，说到的时候，总是把鲜明的态度放在幽默的语言中。有次他生病住院，我去看望他，说话中问他，都有谁来看过，他说了几位朋友的名字，说到作协领导时，他说马烽来过，还说了别的人。我知道有一位作家，过去搞活动总要请出艾老来，这时艾老重病住院，我想他应该来看望，可是艾老没有报他的名字，我就顺便问了一句。艾老温和而又尖刻地说：“他吗，在他的眼里，我不过是块抹布，用完就扔啦。”这是多么机智形象的表达方式，远比那种直通通的指责更深刻。

我见艾青的最后一面，是在他逝世的前几天，这是

多年来惟一的一次——没有见到他的笑容，没有听到他的话语，只见他紧闭双目静静地躺在那里。

这一天像过去许多时候一样，我跟诗人徐刚相约走近艾青。艾老刚刚从病危中被抢救过来，本来医生是不允许外人探视的，高瑛大姐见我们两个人来了，她请求医生破例照顾我们，我们才得以见到弥留之际的艾青。看上去艾青依然很平静，脸颊丰润，没有倦容，不像刚经受过重病折磨的人。这次再不能长久地停留了，我们只在病床前探视片刻便悄悄走开，到医院会客室跟高瑛大姐谈艾老的病情。这些年总有许多次了，艾青生病住进医院，都是由高瑛耐心地照料，艾老的生命才一次次地延伸。他们二位患难与共四十年，这是文学界人人尽知的事情，特别是在艾老多病的晚年，倘若没有高瑛大姐多方关照，很难想象艾老会生活得这么安适、愉快。

如今艾青走了。我想起他上路的那天，在八宝山给他最后送行的人中，除了文艺界的他的朋友们，还有不少艾青的普通读者，这在过去类似的场合并不多见。倘若不是艾青生前有话——不举行丧事活动，给他送行的人会更多。一生靠笔墨生活的人，在读者中能够赢得真诚的情谊，并非每位有成就的作家都这么幸运。艾青倒是艾青。艾青的名字和他的诗篇，永远会留在人们的心中。

1996年6月18日

夜梦与昼思

心海航

夜梦与昼思

想起作家秦兆阳

其实并未经意收藏文人书画，十多年来积攒下来，竟然也有了几十幅，其中还不乏文学大家的墨宝。

我未迁入现在新居那会儿，住房比较局促，四面水泥墙壁，不是被各种橱柜遮挡着，就是因墙面坚硬楔不进钉子，只好把这些书画叠起放在箱子里，有时想观赏观赏，也只能铺在桌子上或床上，但这终归不是赏画的正路。

人说中国画装裱以后挂起来才好看，我过去始终未能享有这样的眼福，直至搬到现在的住房，厅大了，墙空了，才有条件把画舒展地悬挂起来。

在挑选装裱这些书画时，发现赠我有字有画的作家中，却是秦兆阳先生送给我幅数最多，总有三四幅吧。这也难怪，秦兆阳原本就是书画家，平日里又跟我过从较多，我当然也就先得“月”啦。如今秦兆阳先生已作古，观画思人，倍感亲切，从而想起了一些关于秦兆阳先生的往事。

我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，秦兆阳正主持《人民文学》的工作，许多有才华的文学青年，都或多或少得到过他的指引。我缺乏较高的文学天分，自然无缘受教于他，但是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，我还是比较早就知道了。尤其是他写的谈创作的文章，只要听说在哪家报刊发表，总要想办法找来仔细阅读。真正跟秦兆阳有较多

接触，并在后来成为忘年朋友，是在“右派”问题传说要改正的时候。

我那会儿还在内蒙流放，为了打听有关“右派”改正的消息，请假自费来北京，住在一家报社的招待所里。这家报社招待所住着不少文化界的“右”号人物，原来都是各报刊社或文化部门的业务骨干，被划“右”以后送全国各地去劳改，这会儿跟我一样自费来北京听消息。这些命运相同的人到了一起，不是闲聊各自坎坎坷坷的生活经历，就是互相交换谁又听到什么消息，剩下的时间大都用在结伙串门儿上。

那段时间跟我经常在一起的人，有《人民日报》两位资深的记者，还有一位中国作协老编辑，这三位都是抗战时期的老文化人，他们都是秦兆阳的朋友，经过他们的引荐，我才有机会认识心仪已久的秦兆阳。秦兆阳因“右派”问题曾发配广西，这会儿也来北京等候改正的消息。他自己有房子落脚，大家又有着相同的境遇，他的家理所当然成了我们常去的地方。后来我调到《新观察》杂志社工作，编辑部距秦兆阳的家不过二十分钟的路程，只要有空闲就溜达着去找他聊天儿，两人的关系也就渐渐亲近起来。这期间我得到过他不少的帮助和教诲，他的高尚品德和正直为人，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那时因“右派”问题到外地的人，改正以后回到北京，许多人一时找不到工作，只能自己东冲西撞地到处乱碰。秦兆阳要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事，当时也还没有最后敲定下来，他却不辞辛劳地为朋友的工作奔波起来。我那会儿已借调到《工人日报》编副刊，记得是在一天下午，秦兆阳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急匆匆地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跑到报社来找我，让我给他一位从外地回北京的诗人朋友想想办法，看可不可以《工人日报》谋一份差事。我当时在《工人日报》也还未站稳脚跟，有几位原来在《工人日报》被错划“右派”的人，也在等待安排工作，秦兆阳的这位诗人朋友的忙一直未能帮上。不过秦兆阳对朋友事情的热诚，却让我非常感动。当时我曾想，照一般人的情况看，自己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呢，哪还顾得上先考虑别人呢？秦兆阳却肯为朋友的事四处奔忙。

秦兆阳当年培养的青年作家，有的后来也被划成“右派”，虽说这跟他并没有直接关系，可是一提起这些事他总是心神不宁。然而对于有才华的文学青年，他又依然忍不住地想去扶持，希望他们早日成为文坛的创作骨干。有位后来知名度颇高的女作家，在当时只发表过几篇不错的小说，很想找位文学造诣高的名家给些指点，经我介绍认识了秦兆阳。秦兆阳认真读过她的小说以后，把她叫到自己家中，耐心地跟她一起谈论她的作品，足足花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，在场的我和《光明日报》的编辑都很感动。这位女作家的一个中篇小说，后来在全国小说评奖中获一等奖，从此在文学界名声大振。秦兆阳知道后非常高兴，他跟我说：“我这个人的脾气改不了，一见到有才华的作者，就打心眼里感到高兴。”他还跟我说起过当年对两位作者的小说有不公正的处理，言语间流露着真挚的不安心情。

熟悉文艺界情况的人都知道，在这个群体中生活的人，你想完全不抛头露面或寻觅清静实际是很难做到的。而秦兆阳却拥有自己的一份宁静。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，在别人看来这是求之不得的美差，他却跟我说过多次想辞掉这个职务，过自己想过的

清静、淡泊的作家生活。当时有一些作家劝他还是不要辞掉，一是有出国观光的机会，二是可以在一定场合说说话。对于这两样别人看重的事情，秦兆阳却不以为然，他似乎更愿意把时间留给自己。那年作家协会决定让他率代表团出访意大利，服装、名片好像都准备好了，他突然打了退堂鼓。当时国门打开不久，许多人想出国而没有机会，他的这一举动难免让人感到不好理解。我去他家串门儿的时候，跟他说起了这件事情，他非常郑重地跟我说：“我年轻时是学画的，意大利又是艺术国家，我何尝不想出去看看？可是我又一想，出去不能光是看，总得说话呀，假话不会说，真话不能说，还是不出去的好。”原来就是这么一个理由，他就把这份美差给推掉了，足以看出秦兆阳为人处世的真诚。这种不说违心话的真诚，在今天的作家身上，我觉得是弥足珍贵的了。这种品德让我想起秦兆阳的画来，他最爱画的题材便是高洁的静荷和挺拔的青竹，这岂不是秦兆阳先生内心世界的最好写照吗？

我调离《新观察》杂志社以后，办公地方距秦兆阳的家比较远，加之又有家务公事缠身，再没能像过去那样常去看他，只是偶尔通过电话问候。后来他的公子秦万里跟我在一个单位工作，连电话也少打了，只是时不时地跟万里打听他的近况。那年《中国老年》杂志社有个活动，朋友委托我请几位著名作家，我便代请了艾青、张志民、王蒙、李国文、姜德明、谌容、张洁等人，我想这正是个好机会，不妨也请秦兆阳出来散散心。我在电话里给他通报了几位的大名，他一听都是些老朋友，立即愉快地表示愿意见大家，那天他的兴致非常好，无拘无束地跟大家闲谈，说是许多年没有这样

了。尽管朋友们说的文学界的情况，他有些陌生，不多搭话，但是还是饶有兴趣地听大家讲。《中国老年》杂志的编辑知道他擅长书画，请他给刊物题字作画，他当即浓墨大毫写了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：夕阳红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笔墨，觉得比他过去赠我的书画更显得洒脱和沉静，只有经过人生大波并有所悟的人，在书画中才会表现出这种深远的情愫。

秦兆阳先生去另一个世界，转眼已近两年，这次由他的画想起一些往事，仿佛他并没有走远，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。只是老人喜欢清静，独自在家中读书作画哩。

秦兆阳先生画中透露出的平和心境，却又分明显示出他待人处世的宽容，这使我多少感到欣慰，不然我们会对这位好人有更多的担忧。

1996年7月10日

心静者寿高

去年好像也是在秋天，跟朋友们到北京大学，给季羨林先生祝寿；今年秋天再次走进燕园，还是给这位老人祝寿，而且是正逢九十大寿。在临近八十岁的时候，季羨林先生写过一篇散文，说自己“没有八十岁的感觉”。时间一晃过去了十年，如今季先生已经年届九旬，确如季先生好友冯友兰先生多年前对他所说：“何止于米？相期以茶”。季先生能有如此高寿，除了他身体内在的因素，与为人处世方面的豁达恐怕也有一定的关系。对于我们这些晚辈人，不啻是种启迪和激励。

在季先生九十华诞那天，老先生依然是精神焕发、思维敏捷，在他自己的感觉上以及外人的印象中，好像都没有明显的年龄痕迹。而且还不止于季先生自己，连比他年长或年轻的朋友，尽管有几位也已经年至耄耋，在神情和心态上给人的感觉，似乎也没有老得与人难以交流。看到这些知识界泰斗级人物有如此好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，我们在座的人打心眼里感到高兴，不由地跟同桌的朋友一起议论这些知识老人何以会如此长寿？

按照眼下长寿者的介绍，不是说经常锻炼，就是讲注意进补，仿佛这就是长寿的秘诀。然而在许多季先生的文章中，我却不止一次地听人讲述，季先生一不锻炼二不吃补药，而且就连饮食也很简单；还有这次聚会在座的，我比较熟悉的漫画家丁聪和方成两位先生，都是年逾八旬的老人，他们也在文章中说过，平日很少锻炼

季羨林先生文集

心
航

夜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和进补，同样也是如此高寿。这就怪了，那么这些老人的长寿“秘诀”是什么呢？

我想长寿者，注意锻炼，适当进补，自然很必要，但是比这更重要的，恐怕是洁净的心境，如果说长寿有“秘诀”的话，这也应该算是一种吧。倘若满肚子都是坏水晃荡，终日算计着升官贪污害人，即使用药物能够延长性命，那也不过是“植物人”一个，哪里还算有血肉的真正的人。以做学问为根本的知识界，本来是个应该清洁安静的所在，这些年有的人却也心浮气动，把许多心思用在了名利场上。像季先生如此高寿的学者，却至今仍是笔耕不懈，没有个清静的心态怎么行。从这个角度看待寿命短长，似乎更有积极意义。

这些淡泊名利心灵洁净的老人，别看他们平日衣食简单，总是一心埋首做学问，却因有顺其自然的好状态，远比借助外力增寿更可靠。而且这样的人也会有更多朋友，像季羨林先生这样的仁者，所以会有那么多老友新知祝寿，还不是景仰先生的文尚人品文德呵。由此看来，当人们讲述延年益寿时，有的说“仁者寿”，有的说“动者寿”，实在还应该再加个“心静者寿”，季羨林先生和他的高寿朋友们，就是这方面的最好的证明。

2002年10月18日

迟到的送行

汪曾祺先生走了，他上路的那天，我未能去送他。

我去成都开会的头天下午，李国文兄来电话给我，他说听人讲，汪曾祺先生病重了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其时他刚从广州回来，一下飞机就打来电话，可见他对汪老的惦记。几天前曾听说汪老病了，因为忙于杂志社的事情，还没有来得及去医院看他，这会儿又传来这样的消息，我真觉得不好相信。可是这种事情也不好询问别人，于是我想起了林斤澜先生，林先生是汪老的挚友，汪老的一举一动，林先生都会了解的。当从林先生那里得到证实，汪老已于头天病故，我立刻愣住了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只是一个劲地安慰林先生，请他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。

当我询问林先生，我和我们杂志社的同事，可不可以去汪老家，表示一下我们的哀思和敬意时，林先生说家里不方便，我们也就只好再坚持。我在去成都之前曾叮嘱杂志社的同志，一定要随时探听向汪老告别的时间，届时代表我和杂志社送汪老上路。不曾想这一天的准确消息，他们一直未打听到，终于留下了我们的歉疚。在我个人尤其是如此。

汪曾祺的名字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先是读他的作品，后来是听人说起他。而真正跟汪老有接触，是在1987年的春天，他和别的几位作家，一起有过一次云南之行。那时汪老的年岁还不大，不过六十多岁，出于对汪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老的爱护，还是安排了我负责照顾汪老，这样一路上我便有机会，跟汪老朝夕相处十多天。

汪老的青年时代，是在云南度过的，汪老对于云南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，起初我并不怎么了解，到了昆明以后，我才发现敢情他是这么爱着云南。记得我们的房间刚刚安顿下，我到洗手间匆匆洗过一把脸，出来就找不到了这位汪老先生，我挨屋挨户地找过都没有他的影子，又跑到院子里喊叫也仍无动静，我只好跑到街上去寻，结果在一家小食摊找到了他。这位老先生坐在一张小桌子前，正端着一碗酒有滋有味儿地喝着，还跟店主有滋有味儿地聊着，我走过去好半天他才发现我。等我说过找他的经过，他笑了笑说：“瞧你说的，这地方我比你熟，闭着眼睛也能走回去，你放心好了。”我只好给自己打圆场，说是怕他喝多了，回去行动不方便，他说：“这你又错了，我的酒量，我最清楚，绝不会过量。”接着他就把我拉在桌子前，让我坐下陪他喝酒，我从来不喝酒又怕扫他的兴，只好在他对面坐下来，听他和店家聊天儿。汪老离开云南以后，是不是回来过，我没有问过他，从他谈话的内容听，起码总有一些年，他没有踏过这片土地。他向店家询问，某某街道的情况，某种吃食有无卖的，以及别的昆明往事。倘若他在近期来过，我想是不会问这些的，这也足见他对昆明的兴趣。

这位年过半百的店家，知道眼前这位可亲的老者，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以后，要说的话立刻多了起来。这个话题从此也成了汪老的兴奋点，我们在云南游历的十多天里，汪老总是给我们谈他的联大情结。后来在汪老那些写云南的散文里，我见有许多篇都是写西南联大的

生活，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名篇《泡茶馆》、《跑警报》、《昆明的果品》等等，无不浸透着汪老的悠悠情思。当然，在云南这片美丽、神奇的土地上漫游，像汪老这样极富才情的作家更是激动不已，一路上给我们讲了不少的笑话，使得我们忘记了颠簸的山路上的疲劳。这些天的相处，使我们也感觉到，汪曾祺不仅是位可敬的作家，更是一位可亲的朋友，他的平易，他的随和，他的才学，他的经历，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后来的几年里，我又和汪老及其他文友，一起参加过泰山、承德的笔会，这就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汪老在1957年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，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作家，正值盛年失去了创作的好时机，按道理说点不受听的话也可理解，可是我从未听他有过任何议论。在泰山有次林希我们几个人一起聊天儿，当汪老知道林希和我也曾被划“右”，他说：“年轻人懂得什么政治？不过也好，受点磨难，可以使人早日成熟。”这既说明汪老心胸的豁达，不想纠缠那些陈年旧帐，又可以看出汪老为人的厚道，自己受了委屈也不过多计较个人恩怨。正是有了这样开阔的心胸，所以在汪老的作品里，我们才会感受到一种纯净的氛围，没有浮躁，没有矫情，坦坦荡荡地倾诉对人生的感悟。可是在创作上汪老却一丝不苟，有什么想法总要明明白白地说出来，记得在他去世的前些天，我们《小说选刊》召开小说茶会，汪老在谈到他喜欢的作品时，毫不隐瞒地说了三个人的名字，然后又补充一句话，另一个人算半个，我只承认这三个半人是真正的小说家。在这次会上，林斤澜先生谈到什么是小说，汪老搭话时还有过一番妙论，可惜我的记性不好，无法在这里复述了。这次的小说茶会主要

人，因为无论是做人抑或是为文，汪老都是令人十分敬佩的。我们把他的作品书画留下来，就是要记住他生命的闪光点，像他那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

大家非常喜欢、敬佩的汪老走了，他上路那天太匆忙，我未能赶上去给他送行。此刻只能默默地祝福他，祝福他这位好人，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依然生活得自在开心。想画画你就画画，想写作你就写作，想做菜你就做菜，只是烟酒一定要控制。大家说，你所以会说走就走，这同你未能控制住烟酒有关，谁知道呢？反正大家都希望你永远快乐。

1997年6月12日

CLNOENENWZK

心海航
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悠然自若一轻帆

每次跟袁鹰先生一起饮茶，听他用轻缓舒畅的声调聊天儿，常常让我想起他那本散文集《风帆》。

这是20几年前读到他的一本书。那时我还在内蒙古流放，根本没有想到几年之后，我会重回北京生活工作，更不会想到有机会认识书的作者。后来认识了袁鹰先生并多有接触，感受到他待人的宽厚处事的豁达，这时我总是不由地把袁鹰先生，跟他那本书的名字连在一起。袁鹰先生不就是一叶轻帆嘛，那么从容，那么悠然，在漫漫的人生长河里迎风展开。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，在文坛报界半个世纪，经过多少世事沧桑，见过多少好人赖皮，竟然如此不惊不诧，心如秋水般的宁静，实在是难能可贵啊。反正我是学不来做不到。

记得是在10多年前，给《人民日报》写过一篇短文《心中的渔火》，谈我年轻时学习散文写作的情况，文中提到几位给我影响的散文家，其中就有袁鹰先生。文章见报后别的文字未动，惟有袁鹰先生的名字不见了。后来问编辑才知道，是做为部主任的袁鹰，在看版样时自己圈掉了。从这件小事情可以看出，这位在编辑岗位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，有着多么严格的职业自律观念，这跟那些用职业谋私的编辑相比，在品德上简直有着天壤之别。其实这完全是袁鹰先生的过虑，像我这样年纪已经不轻的作者，又多少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，绝没有以讨好换取名利的想法，何况我又不是直接跟他打交道。

心海
夜航



夜梦与昼思

有次跟袁鹰先生一起在外地开会，晚上无事情可做正好聊天儿，我跟袁鹰先生说：“我读的您的第一本书是《风帆》，那时正是‘文革’后期，没有什么像样的书好读，在单位图书馆看到这本书，就借出来放在枕头边，每天睡觉前就看几篇。后来我从内蒙调回北京，走的比较匆忙，书忘记还了，这会儿还在我这里。”袁鹰先生听后，只是轻哼一声，没有说更多的话。我想袁鹰先生如果还记得，此时他应该明白，我在文章中之所以提到他，并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目的，而是他的作品确实给过我影响。自然也就对他格外地敬重。

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美好的书缘，所以认识袁鹰先生这些年来，每次他有新书出版都要送我，在书上题签时跟我称兄道弟，除了感动从来不敢造次接受。就是在平时的称呼里，尽管别人呼“老田（袁鹰本姓）”叫“袁鹰”，我也总是在他笔名的后边，恭敬地加上“同志”或“先生”。不为别的什么，只为保持认识之前，我对他的那份尊敬。因为他是一位值得让人尊敬的文学前辈和师长。

真正认识袁鹰先生，并开始有密切交往，是在“右派”问题改正后，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。在《新观察》杂志，在作家出版社，在《散文世界》杂志，在中外文化出版公司，在《小说选刊》杂志，于公于私都有接触，更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，自然也就有了进一步了解。这时我发现，做为老编辑，他是那么敬业；做为老作家，他是那么勤奋；做为老同志，他是那么随和，从不张扬轻狂，从不吹嘘卖弄，永远让人觉得好接近。在文学界具有他这样资历成就的人，不能算是很多可也不算太少，然而像他这样跟晚辈不太分彼此的，起码在我

认识的人中不多见。袁鹰先生属于那种靠人品赢得人们尊敬的人。不是像有的人只是因为地位显赫，人们不得不在表面上应付他，在背地里却微词不断骂声不绝，下了台走对面人们都不屑搭理。

我这个人有个习惯，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，这就是，自认为人品好的人，总是经常来往，自认为人品欠佳的人，碰上也不见得说几句话，更不会搞虚与委蛇那一套，因此也就吃了不少的亏，所以经常提醒自己接触人多注意。我跟袁鹰先生一认识就很投脾气，在他跟前可以完全敞开心扉，无顾虑地说心里话说真话，把他当做一位自家兄长相信。说实在的，在我置身的文学圈里，能够无拘无束说话，而且绝不会遭暗算，包括袁鹰先生在内，只有几位人品好的师长。我一直把这件事视为晚年生活的幸运。

在多年的接触中，袁鹰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他的宽厚。他在《人民日报》主持副刊几十年，扶持过相当多的作者，有的后来成了著名作家，有的后来混成文学官员，大多数依然对他以诚相待。但是也有个别势力眼的人，觉得无须再靠蹬袁鹰先生肩膀攀高了，见面也就没有过去的热情。当朋友们一起说到这些事情，袁鹰先生总是处之泰然，一笑了之，很少听他说什么鄙夷之词。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，误认为袁先生处事过于谨慎，竟然连个明显的是非，都不愿意正面表示对错。

跟袁鹰先生渐渐来往多了，我才知道自己想法不对，他为人处事还是有原则的，对于那些实在看不下去的事情，他有时也会观点鲜明地发表意见。前几年作家协会有人提出，要把作家协会建成“美丽的林子”，想以此增强对作家的凝聚力。这种提议的出发点是好的，

也很浪漫，只是不见得真正可行，因为团结作家和组织创作，这是非常具体细致的事情，口号再响亮还得实际去做。有一次作协主席团开会，我正好应邀列席，袁鹰先生非常坦率地对这个“林子”之说表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，大家都很赞同袁鹰先生的看法。

袁鹰先生淡泊名利，圈里的人大都知道。以袁鹰先生的人品、资历、成就，在我这个中国作协会员看来，当个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，还是会让几千名会员心悦诚服的，可是袁鹰先生自己好像并不计较这些。在我跟他交往的20多年里，一起饮茶的时候不少，一起开会的时候更多，文友们聊天免不了会说到正派人的荣升和下三烂的发迹，他从来都是淡淡地说上几句。很少像有的人那样，总是拿别人跟自己对比，认为某个位置只有给他，这世道才算公平。实际上世上的事情哪有那么公平，又不是分生日蛋糕，只要人在场就有你的一份儿。

最近袁鹰先生又寄赠我一本新书，他在书的扉页上，写有这样两句诗：“花开花落等闲过，尚情怀似旧时”，我读后颇为欣赏，从中透出的自然心态，如同一股清新的风，吹散我因暑热积存的烦躁。不由地想起他在一篇新作中的文字：“我不敢奢言什么‘超越自我’之类的话，只求能够保持几分清醒。‘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’。闻道，也是一种清醒。感受古代哲人这种执着豁达的襟怀，推窗遥望浩渺幽邃的星空，顿觉心平如水。”这段蕴意深邃的文字，是在一个午夜听广播，最先得到和感受到的，当时，万籁俱寂，身心相拥，听着听着不禁眼泪湿了枕畔。那一夜想了好久好久，仿佛一下子更多地了解了袁鹰先生。

我在团结湖居住的时候，常去水碓子菜市场买菜，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

夜
梦
与
昼
思

有时遇到袁鹰先生，见他跟我一样提篮买菜。听《人民日报》的朋友说后才知道，敢情这位老作家也是个“家庭主夫”。我妻子的身体不大好，许多家务活得我来干，难免有厌恶心烦的时候，就常常地抱怨发火儿。知道袁鹰先生的家务事，比我的还要多还要重，就真的不好再说什么啦。前些年去过他的家，见他既侍候老父亲又照顾残疾女儿，自己还要上班工作业余写作，真也难为他了。可是从未见他有过埋怨和不悦，在家里不管多么累多么忙，出门总是轻轻松松高高兴兴，依然是一位洒脱豁达的文人。

有时朋友们一起说起袁鹰先生，我就想：人生在世，名声可大可小，官位可有可无，最要紧的得有个平和状态——心情不浮，行为不躁，始终如一地做自己的事情。就像那江河里的风帆，随着水势风力起伏漂荡，悠然自若地永远前行。这就是最快乐的人生，这就是最难得的境界。人哪，如果都能这样活着，岂不更有滋有味儿。

2002年7月16日

猜想张光年先生的遗憾

张光年先生逝世后百天，北京文学界的朋友们聚在一起，追思这位老诗人老评论家，《张光年文集》首发仪式同时举行。看着他那煌煌五卷本大书，朋友们无不感慨系之，对他的勤奋表示由衷敬意。特别是他以光未然笔名写的《黄河大合唱》歌词，经作曲家冼星海谱曲后成为不朽之作，至今仍然回响在全球华人当中，成为振奋中华民族的主旋律。张光年先生担任文学界领导职务时，他扶持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，多部小说经他评论力荐获奖，成为新时期文学作品的代表。做为一位作家、评论家、领导者，能够创造下这样的业绩，张光年先生无愧于自己的一生。

那么张光年先生的一生有无遗憾呢？我以为有的。跟每个人一样有他自己的遗憾。可是光年先生的遗憾是什么呢？不知道他生前说过没有，如今我们只能妄加猜想。在追思会上有人发言说，光年先生亲自校阅了文集，却没有看到这部书的出版，就匆匆地离开了人间，这不能不是他的一个遗憾。这话当然没有说错。但是我覺得比这更大的遗憾，恐怕还是生前他没有机会，在公开场合让他说心里话。尽管这只是我的冒昧猜想，没有更多的直接的根据，但是从他私下的聊天中，我们也能隐约地感觉到。

光年先生生活在20世纪，是个充满灾难的百年，外忧内患，动荡不安，知识分子在沈浮跌宕中生存。光年

心
航
夜
梦
与
昼
思

心
航
夜

夜
梦
与
昼
思

先生置身在这样的境遇里，其思想行为很难超越现实，自觉不自觉地做了些事是可以理解的。特别是“反胡风”“反右派”这些运动，矛头直接指向知识分子，光年先生做为领导者伤害了一些人，事情的对错一看便十分清楚，这里就不再细说。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些历史上的事情，人的善恶真假也以此区分。善良的人真诚的人有了过错，觉悟到了他会表示歉意；险恶的人虚假的人有了过错，意识到了他也要死扛着。所以我以为用品德做标准比用思想做标准衡量人更接近人的本质。

作家从维熙在会上发言说，他跟光年先生一起去日本访问时，看到一眼水花喷放的温泉，光年先生当时触景生情，联想到一些过去受压制的作家，说了一番对自己往日过错歉疚的话，我想这应该是光年先生的真实心迹。听了维熙的发言，身旁的评论家也是光年先生的老部下刘锡诚跟我说，维熙说的情况是对的，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，当时中国作协主要负责人就是光年，他不仅允许原来作协被错划“右派”的人回来，而且原来在外单位被划错的人他也接收下来，并且都一一做了妥善安排，这本身就说明他在修正自己的过错。我听了不禁连连点头称是。

同样的例子还有一个。今年出版的第20期《老照片》杂志，有一篇题为《吕荧——惟一敢于为胡风申辩的人》的文章，作者闻梅访问张光年先生时，他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事隔多年，具体情况记不太清了，不过，确有这样一件事，一次反胡风的会上，我突然站起来，向正在发言的吕荧同志提出质疑。那时候，整个儿是个人迷信，执行上面的决策。开始也吞不下，然后就紧

跟，犯错误，经过“文革”才认识了。吕荧同志我不熟，很对不起他……不要再说这件事了，你们搞这段历史，根据当时的情况，该怎么写就怎么写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。”从这段引述的文字里可以看出，光年先生对自己的过错是认帐的，态度也是恳切真诚的。

从张光年先生这两次公开场合的谈话，这样大胆猜想光年先生的遗憾，我想不应该算是牵强附会吧。这次出版的《张光年文集》许多人注意到了，涉及到政治运动的内容不多，如果光年先生健在，能够在出席文集首发式，跟他的朋友们解释这些事时，我想说不定他会借此机会，公开地表达他对伤害过的人的歉意。我相信他有这样的勇气，可是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，所以我说这才是张光年先生最大的遗憾。

2002年5月30日

心海夜航

心海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好一尊“笑佛”

跟林斤澜先生在一起，感觉非常宁静快活，忘忧忘烦，忘名忘利，忘记尘世间的污垢。他不只是笑口常开，而且是笑声不绝，嘻嘻声又脆又亮，带着鲜灵灵的水音儿。再看看他那张脸，慈眉善目，容颜舒展，简直是“笑佛”一尊。

知道林斤澜先生的大名，是五十年代。那时我在一家报社供职，我的组长房仲甫先生，是林斤澜先生的老同学，时不时地跟我提起他。还有一位忘年朋友，当时在《北京文学》的考诚先生，跟林斤澜先生同在北京文联，当然就更少不了说到他。而比这两位说得还多的人，一位是柯慧能，一位是吴梅影，这两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，当时都在劳动人民文化宫，从事职工文艺的辅导工作，由于都比较喜欢文学，当时跟我多有来往，她们少不了谈论熟悉的作家，自然也会提起林斤澜。这就是我最早知道的林先生，只是那时还没有机会跟他接触，我就因“右派”案落魄，从北京发配到北大荒、内蒙。这一走就是22个年头。

真正跟林斤澜先生交往，是在政治气候由阴转晴，我从外地回到北京以后。起初大都是开会时见面，当然也就无暇多谈深聊，我只是尊敬地打打招呼。后来多次跟他一起参加笔会，每次都是朝夕相处七八天，彼此之间也就有所了解。这时我渐渐发现，林先生特别爱笑。好笑的事情，就自不必说了，不太好笑的事情，有时他

也哈哈大笑，仿佛人间的荣辱浮沉，都在这朗朗的笑声中，被冲淡化解随风飘散。这时我总是怀着羡慕的心情，欣赏他那美滋滋的笑模样，并且在心里想：多么好的性情呵，我哪怕有他的一半儿，就会少去许多烦恼了吧。

我们一起上泰山那次，总有10多位文友，到晚上就扎堆聊天儿。汪曾祺先生和林斤澜先生，是我们这拨人中最年长者，两位又都是可亲可敬的人，大家总是主动凑到他们房间。北京文学界的人都知道，汪、林这两位是好朋友，抽烟饮酒可搭伴儿，说话聊天儿也投机，就连性情好象也相似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譬如，起码是我跟这二位接触时，有两件事他们很少议论：一是关于官位，一是关于是非。就是听到这类事情，汪老总是说句俏皮话，林先生则是哈哈地一笑。这俩位先生都属于那种，经历世间无限事，参透人生几多情之人，别人锱铢计较的事情，他们压根儿不想往心里装。如果论资历和成就，这二位在这两方面，比文学圈里有的人，要高出一大截儿，更不要说好人品，可是他们从不看重那种虚华。

大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态，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才显清纯，林斤澜先生的身体才这样好。林斤澜先生已是76岁高龄，前不久跟我们一起去了浙江，游瓯江、爬雁荡，不仅毫无倦容，而且一路说笑，思想的敏锐不亚于年轻人。我们这次是乘飞机而行，林斤澜先生却来回乘火车，据跟他结伴的陶大剑先生讲，林先生一路上很少睡觉，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儿。旅途生活非常快乐自在。林、陶俩先生都是温州人，据陶先生讲，他们在温州停留的几日，林先生更是高兴至极，见到年轻时的

伙伴，看到熟悉的故乡景物，忧如回到了那远去的年代，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惬意。

在林先生面前，我是后生晚辈，应该称他老师。可是见他如此随和，无论跟谁都平等相待，我也就抖胆放肆了，更多的时候叫他“林老”，有的时候叫他“老林”“斤澜”，还有时跟他开个玩笑叫“小林”，不管怎样叫他都不介意。如叫“小林”他更是痛快答应，而后便是一串脆脆的笑声，把他的快乐无私地传给你。每在这个时候，我总是想，一个人能活得平和淡泊，说起来比较容易，真正做到却很难，因此林斤澜先生的性情，很让我敬佩折服，每见他一次就有一次的感悟。就如同置身青山碧水间，被大自然氛围陶冶之后，全身心都觉得轻快爽利，许多杂念顿时荡然无存。

在当今的文坛，论年龄论创作，林先生都是个人物，却很少充“老大”。有次在闲谈时跟他说起，有的作家看不起同行，他听后平和地说：“其实完全没必要，作家就跟木匠一样，无非是个三级工六级工之分，还不都是靠耍手艺吃饭，个人写个人的就是了。”我听后颇为感动，心想，难怪林斤澜为人冲淡，原来他把自己的身份，看得是这样的平常。倘若像有的人那样，本来是个三流作家，偶然误坐一流位置，就想让人尊为一流，或者无人捧场就自我吹嘘，反而让人瞧不起。像林先生这样不恃不傲，倒是让人尊敬并乐意接近，自己和别人都生活得快活。

林斤澜先生已是七旬开外的老人，以他健康的身体和豁达的襟怀，还有那不亚于年轻人的敏锐思想，相信在新的世纪里，他还会写出不少的好作品。林斤澜先生以小说闻世，散文随笔也有名篇，这几年这两样都常

见。要是以我自己的喜欢，我倒是希望林先生多写散文随笔，用平和的心态和从容的文字，记述悟出的人生真谛和文坛往事。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，是去年我们结束青田之行，归来时在温州机场候机，偶然发现一张《温州晚报》，上边恰好有林先生一篇散文，是写文学前辈沙汀先生的。文字太少，读得不过瘾，想再多读，自然就这样想了。

2000年1月5日

心海航

心海航
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心海夜航

心海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幸福的高莽

在文人圈里，我认识的高莽，可算是个幸福的人。

中国当代文坛艺界，有那么多顶尖人物，如郭沫若、茅盾、曹禺、老舍、冰心、巴金、田汉、钱钟书、艾青、季羡林、蔡若虹、吴晓邦、李德伦，等等，高莽都直接近距离接触过，而且写过他们画过他们，有的他还陪同访问俄罗斯，给他们做俄文翻译。最近高莽寄来新书《文坛剪影》，当读着书中精美的文章绘画，我就想，应该怎样给高莽冠衔呢。作家？画家？翻译家？社会活动家？每种称谓放在他的身上，既不虚饰又不夸大，都是最恰当的真实表述。更不要说他是研究员，当过《世界文学》主编，这两个学者、编辑家的头衔，我还没有算在其中。高莽的学问可是货真价实呵，不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，来中国干嘛要给他授勋呢？

50年代，我还是个文学青年时，读过乌兰汗的译作，也就记住了这个名字。其后划为“右派”被迫远走边疆，终年累月在荒野大漠劳动，就再也没有机会读书，一时淡忘了乌兰汗这名字。80年代作家出版社恢复，我为首任图书编辑室主任。一天《中国作家》副总编辑张凤珠，拿来书稿《久违了，莫斯科》让我看，作者署名就是高莽。从凤珠大姐的介绍里，我才知道高莽就是乌兰汗。不过高莽、乌兰汗这两个名字，在东北工作过的凤珠大姐和老作家李纳大姐，她们好像都不正式地这么叫他，而是习惯地叫他“小四儿”，这样我也就

心海航
夜梦与昼思



夜梦与昼思

知道了他的第三个名字。乌兰汗——高莽——“小四儿”，其实都是这位高先生，一位来自哈尔滨的文化人。乌兰汗是翻译时用的笔名，高莽是写作绘画用的真名，至于这“小四儿”的来历吗，我就不详了，更不好意思地去打听。

认识高莽才发现，这么一位有多种成就的学者，不仅谦虚，而且极其随和平易，什么时候见到朋友，总是主动问寒嘘暖，不认识他的人绝对不会想到，他是文坛译界的大名家。后来两次去高莽家约稿，知道他有一位高龄老母，还有一位患眼疾的妻子，生活上都需要他精心照顾，可以说是个孝子贤夫。了解了高莽的家庭情况，对于他待人的真诚随和，我也就完全能够理解了。一个对待家人都无责任心的人，怎么想象他会对朋友真诚呢？

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平日里很少串门儿，跟朋友们相见，大都是在公开场合。近几年身体时有不适，就往北京协和医院跑，高莽的医疗关系也在此，我们俩几次都是在此见面。有一次坐在一起候诊，随便地闲聊天儿，忽然他有所悟地说：“咱老哥俩老在这儿碰头，再好不过。”说着他从背包里，拿出笔和纸，说：“正好，我给你画张像吧。”我说：“记得有一次，在欧美同学会开会，你给我画过一幅，连看都未让我看，这回可得给我呀！”“当然，马上兑现。”画很快就画好，让我看了看，他又拿回去，在上边写了一行字：“距八宝山越来越近了”，他可能想到我会忌讳这句话，立刻又填上一句：“说的是我不是你”。其实生死本是正常事，活得如高莽这样平和淡泊也是我的心仪。生死事一旦想得明明白白，绝对不会计较这些的。我有过22年的贱民经

历，更是从死亡线上过来的人，对于这生死的事早已经通达，自然也就不会在乎这句真话。

高莽如今已经退休了。可是他依然很忙，忙写作忙绘画作翻译，还要忙家里的杂事。他从昌运官搬到南城的新居，我还没有机会去，从他电话里的口气，我依稀感到还算满意，因为至少在居住面积上，他的家不会再那么局促。但是我相信有一点他不会忙，用自己拥有的成就名声，去找相关的人要个人好处，或者要个虚名壮壮声势。过去他未这么做过，现在他更不会这么做，就做为一个真正的人来说，高莽同样是一位幸福的人。

任何虚名都有过时的时候，惟有好的文章佳作可以留下，越到老年越活得真实，这不是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？高莽，老弟愿意学习你。活个真实，活个明白，活个清爽，活个自在——哪怕一点点也好。这不正是老年人真正的美好心境吗。

2002年1月3日

“长不大”的老画家

要是我没有记错，那是三年前的秋天，在中国美术馆参观一位画家的画展，我遇到了著名漫画家丁聪。

当时他正在同几位画家一起合影留念，拍照的相机“咔嚓”声刚停，丁聪便招手叫我：“来，咱们‘老同学’一起照一张。”

在场的画家中，有几位我们都认识，立刻投来不解的目光，仿佛在问：一个是画家，一个是文字编辑，一个快七十岁了，一个才五十出头，他们怎么会是同学呢？丁聪凭着他漫画家的敏感，好像意识到了朋友们的疑惑，他马上解释说：“噢，我们是五七届‘北大’农垦系同学”。

熟悉我们经历的朋友，这时都笑了。他们知道，在一九五七年那场政治风暴后，丁聪和我都曾在北大荒军垦农场劳动改造，难怪丁聪戏称是“北大（荒）”农垦系同学。这时丁聪已年近古稀，坎坷的经历，岁月的流逝，并未磨掉他漫画家特有的幽默和乐观。我同一位画家朋友说，你看这个丁聪，总是那么有朝气，我常想起他画上的签名“小丁”，六、七十岁的人仍然这样自称，好象永远“长不大”。

我说丁聪“长不大”，并非是对这位著名画家的不敬，恰恰相反，自从我知道他那天时，便对他的人品画品怀有诚挚的敬意。

1957年我只是个报纸副刊的一般编辑，而丁聪则早

心 航

夜梦与昼思

已是蜚声中外的漫画家，倘若不是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，我们不可能在同一“地平线”上生存，在我们这群“落魄”的文化人中，有的同丁聪一样著名的画家、作家、记者，依然放不下昔日的架子，总想显示“趴下的骆驼比羊高”的优越感，处处表现出某种自我欣赏的傲气。丁聪则不然。有次我正在野地里理发，不一会儿来了一位中年人，跟给我理发的人和蔼地点了点头，然后便展开画册在那里画速写。他走了以后，人家告诉我说，他是画家丁聪，原《人民画报》的副总编辑，从此我便记住了丁聪这个名字，后来又多次听人说起过他的为人处事。

我真正认真地读丁聪的画作，是在我任《新观察》编辑的时候，那时丁聪、方成、王乐天等著名漫画家都给我们供稿，但是几乎每期都有的好像只有丁聪，就象现在的《读书》、《群言》杂志，每期上都有丁聪的新作。有的报刊编辑向丁聪约稿，见他答应得不爽快，常常给丁聪“揭老底儿”：“你怎么给《新观察》画呢？”丁聪立刻会笑笑说：“那可不一样，从《观察》时，我就给他们画，我们是老‘关系户’啦”。这样我就有幸经常拜读丁聪的漫画原作，他画中的深刻内涵、文化气息和艺术表现，使我在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思索一些事情。有一次他拿着给老舍小说《四世同堂》的插图让摄影记者张祖道翻拍，我先抢过来欣赏，在我心灵上引起的震撼不亚于读老舍的原著。我曾自告奋勇代丁聪拿给老舍夫人胡絮青，胡先生读后连声夸好，说是给《四世同堂》增色不少。

丁聪和方成这两位漫画家的画，我一直比较喜欢。我并不懂画，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，只是觉得，这两位

的画很少有直露的粗浅，读时极耐人寻味，有着某种深沉的文化气息在感染着你。后来我了解到，这两位画家的文化修养都很高，作品也就出手不俗，方成会画能写，这是人所共知的，有他的大著《挤出集》等为证。丁聪则是个书迷，他每次从西郊进城，总得在书店泡几小时，只要购得几本好书，有时连饭都顾不得吃。我抓住了他这个“弱点”，不免以此为诱饵，引他答应我托办的事。如最近我代朋友向他约稿，他在电话里大诉繁忙之苦，想拒我登门造访，于是我灵机一动，说是有书给他，他马上爽快的答应了。真是爱书如命的画家。

那天我们到丁聪家里，朋友见他依然满头乌发、腰板硬朗，说他不像一位“老人”。丁聪听后赶紧自报家门，说他已经年过七旬了。丁聪从上中学时便开始画漫画，至今已在这块园地里耕耘半个世纪，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清楚。如果把他所有的画都拿出来开个展览，我相信那一定是一部中国社会生活的风情史，读者会从中看到几十年来的世象百态，同时也会窥见画家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心迹。丁聪自己曾说：“我这一辈子，是在‘始于漫画，终于漫画’中度过的。”这恰好道出了丁聪的夙愿。

始于漫画，终于漫画。丁聪开始画漫画签名“小丁”，现在依然在画上签名“小丁”，今后还要在画上签“小丁”之名，这位七十多岁的老画家，看来永远“长不大”了。如果这表明一位漫画家的思想、才情、机敏和艺术追求的不衰，我是多么希望丁聪永远不要“长大”呀，因为惟有这不灭的童心才会使创作永葆青春。

1988年2月6日

心海航
夜梦与昼思

心海航
夜梦与昼思

夜梦与昼思

结识于苦难中的画家

著名书画家尹瘦石先生，从年龄上讲是我的前辈，从名望上说是我的师辈，他的人品更是令我敬仰。只是由于40年前那场劫难，把我们一起抛到北大荒，用著名画家丁聪先生的话说，成了“57届北大（荒）农垦系”同学，这时大家才不分长幼尊卑。但是自打认识尹瘦石先生以后，我一直是称呼他“尹老”，表示对这位前辈书画家的尊敬。

1958年“反右运动”结束以后，国家机关和军委各总部的“右派”，上千人从北京发配到北大荒，在军垦农场从事笨重的惩罚性劳动。刚开始许多人都集中在云山畜牧场，尤以文化界的“右派”最多，其中不乏一些著名文艺家，如书画家丁聪、黄苗子、尹瘦石、杨角，如电影演员李景波、郭允泰、管宗祥、张莹，如著名记者朱启平、高汾、戴煌，等等。我就是在这时候认识尹老的。

在来北大荒的这批著名艺术家中，尹老既到过重庆又到过解放区，因此关于他也就有些传说，诸如给毛泽东画像、重庆画展等等，按照人们当时的那种思想，尹老也就比别的名人更引人注意。尽管当时身处逆境之中，我们的行动不很自由，但是这些画家们仍不忘学业，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写生作画。那年我和戴煌等难

心海航
夜梦与昼思



夜梦与昼思

友，重返北大荒云山畜牧场，农场的人特意找出尹老的北大荒写生画，给我们这些人欣赏，使我们又重温了往日的生活。

这批著名书画家，毕竟是特殊人才，各方面都很重视。他们好象没有劳动多久，有的人就陆续地调走了。“右派”改正以后回到北京，有次跟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张钦若先生，说起那年这些画家调走的事，原来是为迎接建国10周年，都去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布置。这之后我也就再未见到过尹瘦石先生。

结束了在北大荒的劳改生活，我又被发配到内蒙古劳动，一直到“文革”后期经过审干，分配到《乌兰察布日报》工作，我这才又重新进入文化界。有次跟蒙古族作家安柯钦夫闲聊天儿，说起“反右”后我在北大荒的情况，他问我认识画家尹瘦石先生不，我说：“尹瘦石是位大画家，我认识他，他不熟悉我，在一起没有呆几天，他们就调走了。”这时我才知道，尹老也在内蒙古工作过，曾任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主席，文艺界许多人一谈起他来，无不啧啧称赞其德艺双馨。

后来不知是内蒙哪位文友，把我的情况说给了尹老，他特意让人捎来一幅画，使我非常地感动，觉得尹老很看重患难之情。因此，在我正式调回到北京工作以后，我特意到尹老金台路寓所看望。那好象是个秋天的傍晚，他正坐在一张椅子前饮酒，这张代桌的椅子上放着酒菜，他边饮边跟我们聊天儿，显得非常地安详惬意，我做为晚辈看到这情景，真为这位老艺术家高兴。心想，倘若不是赶上改革开放的年代，仍然是“以阶级

斗争为纲”，这位有才华的老书画家，谁知会怎样度过后半生呢？

第五届全国文代会召开时，尹瘦石先生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，有时一起参加文艺界活动，若是老人家先看见了我，总是悄悄地走到我的身边，主动询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，全然没有像有的暴发户文人那样，钻营上个一官半职马上脸就阔，就连对待老朋友都要端起臭架子。尤其让我感动的是，尹老先后迁居西坝河、方庄，每次都把地址电话告诉我。但是考虑他事情多又要作画，我只是打打电话问候，却没有好意思去打搅。连他答应给我写幅字，我都未好意思去拿，原因是这会儿送书画如送钱，谁还想主动跟书画家伸手呢。后来听文联的朋友们说才知道，我的想法完全错了，尹老的书画从来只赠不卖。

我们那年重返北大荒，考虑路途艰辛劳累，年事较高的难友，就没有请他们同行。到了850农场云山畜牧场，场领导一再跟我们说：“你们下次再回来，请上那几位老先生，也一起回来看看。”回到北京以后，我们把这一邀请信息，分别转告给丁聪、吴祖光、尹瘦石三位，后来听说丁、吴二位曾结伴前往，尹老大概是脱不开身，没有一起去重温那段岁月。在《曹禺全集》出版座谈会上，见到尹老时，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儿，我曾对他说：“等您什么时候想去，我给您联系，或者我陪您再去一趟。”不曾想这个愿望还未实现，这位老画家就匆匆地走了，再也不可能到那片黑土地上看看，说不定还有点遗憾呢？

其实要是依我说，不去重温那段恶梦般的生活也好，情感上的折磨还再其次，主要是回想那些无端流失的时光，总让人觉得不免有点惋惜。尤其是像尹瘦石先生这样的艺术家，倘若没有1957年那场劫难，正值盛年又是艺术成熟期，他该会创作出多少好的作品，奉献给他热爱的人民。今天我们怀念这位老书画家，就不能不提及这件事情，目的并非是要追究谁的责任，而是想告诉后生晚辈文艺家们，他们今天生活的环境多么好，从而更能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。这也是对尹瘦石先生最好的纪念。

1999年3月9日

心海
夜航

夜梦与昼思

“泥土”上的“苦难草”

——怀念诗人鲁藜

老是自己当做珍珠，
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；
还是把自己当做泥土吧，
让众人踩成一条路。

鲁藜：《泥土》。

我知道诗人鲁藜先生，是在天津一中读书时，那时学校里有文学社，我们这些喜欢文学的孩子，就都纷纷地参加活动。有次鲁藜先生来讲课，讲到他自己的作品时，我记住的有两首诗歌，一首是《生活》，一首就是《泥土》，别的作品就渐渐忘记了。但是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给我影响最大的，以至于让我吃了苦头的，就是这首仅有四行的《泥土》。

照我当时的理解，这首短诗《泥土》，其意义是积极的，所以经常地背诵。遇到喜欢诗歌的朋友，若没有读过这首诗，我就主动地给他介绍，朋友们也都挺喜欢。经过多年的人生风雨剥蚀，早年读过的一些诗歌，有的早已经忘得精光，唯有鲁藜先生的这首《泥土》，还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除了因为比较喜欢之外，还因为有着苦难情缘，每每想起这首诗歌，就会想起劫难经历，同样，每每想起劫难经历，就会想起这首诗歌，当然更会想起诗人鲁藜先生。

喜欢文学的少年人，总是免不了做作家梦，为了让美梦成真，就像现在的“追星族”，我们那时也有心中偶像。我最早的诗人偶像，就是艾青、戴望舒和鲁藜，只要有他们的诗集出版，手头的钱再紧也要买。在“反胡风运动”中，我挨批判受审查，开始的起因，就是鲁藜的诗集《星之歌》。

50年代，我在中央某部工作，由于自幼喜欢文学，认为机关环境呆板，实在没有多大意思，就终日里读文学书，便被人看作不安心本职工作。久而久之成了“落后分子”，那时我是个共青团员，就经常受团组织的“帮助”，后来见我实在不可“救药”，当我一提出来到大学读书，立马就被组织上批准了。从此我就心安理得地，准备报考北大中文系，当一名当时提倡的调干生，以便毕业后实现文学梦。在此之前，我做过编辑，发表过作品，按当时的条件，我认为自己考北大，还是有一定把握的，所以非常高兴地备课，等待随时走进考场。

谁知就在这当口上，一场“反胡风运动”，像突然袭来的风暴，把个知识界吹得东倒西歪。我这个沾点边儿的人，当然也就无法幸免，何况我还有“前科”。一下子便由“落后分子”，跃升为运动的审查对象。

我年青时生活比较散漫，住在机关单身公寓里，脏衣服、常读的书报，总是往床上乱堆放。有次去逛王府井书店，见有本新出版的《星之歌》，就顺便买了回来，随手扔在了床头枕畔。有一天一位同公寓的人，到我屋来串门儿，坐在床上随手翻阅诗集，并问我鲁藜先生的情况，我就跟他说：“鲁藜是天津的诗人，我在读中学时，听过他讲课，对他的诗比较喜欢。”他听后连连点头儿，我就建议他读读《泥土》，他翻到这首短诗，就

心 航

夜 航

夜梦与昼思

认真地读了读。事情就是这么平常简单，发生过也就忘记了，我根本没有往心里去。

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。“反胡风运动”开始不久，报纸上登出了舒芜的信，还有那个厉害的“编者按”，胡风先生一夜之间成了敌人，跟他有过来往的鲁藜先生，当然也就在报纸上被点名。中央各部委机关政治学习，联系实际进行检举揭发时，那位同公寓的积极分子，突然想起那本诗集《星之歌》，以及我说过的关于鲁藜的话，他就在单位检举揭发我。其实，他是人事司的干部，跟我并不在一个司，材料转到我所在的劳资司，司里本来就对我有看法，一下子就如获至宝，立刻便组织团员“帮助”我，让我交代有关情况。我成了这次运动的重点。

我当时正在忙于准备功课，不想让审查影响大学考试，就坦诚地讲述了在天津，如何听方纪、孙犁、赵树理、鲁藜、阿垅、王琳等人的课，以及一起参加文学社活动的同学，完全是基于对组织的信任，我才无遮无拦地做了交代。不曾想组织上并不这样看待我，在这些同样讲过课的作家中，他们特意提出鲁藜和阿垅，让我交代跟他们有无组织联系。天哪，这哪里是对我的“帮助”，明显地是要政治栽赃，我一听就火了，在一次团员的“帮助”会上，我狠狠地对会议主持人说：“我从天津到北京，证明我情况的人，没有一个超过25岁，你们调查去好了。”说完就当即退出会场，表示自己的抗议。

就在这时，报纸上刊出了写侯红鹅（林希）的通讯，不久又转来孔庆珊（山青）的材料，这两位当时有些名气的青年诗人，前者是我的同学，后者是我的朋

友，他们两人都在单位里受审查，我被怀疑与“胡风集团”有瓜葛，在别人眼里这就更是确定无疑了。不久我被保卫部门通知，问题未下结论前不准报考大学，并正式接受组织上的审查。这事就发生在我要考试的前一天下午。

这就是鲁藜先生这首《泥土》，在1955年“反胡风运动”中，让我吞食的第一颗政治苦果。不仅使我多年的大学梦破灭，而且还丢失了别的美好事物，但是也使我开始认识到，人情的险恶，运动的可怕，生活并非真的那么美好。只可惜没有吸取应有的教训，在1957年“反右派运动”中，再一次遭遇“阴谋”被定“右派”。接着就是北大荒、内蒙古的流放，整个的青年时代在劳役中度过，早年的理想和向往全都白白断送。当中国的政治天空，开始渐渐地晴朗起来，我的“右派”问题改正，鲁藜先生的问题得到平反，我们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。鲁藜先生不知听谁说的，知道了我受牵连的事，1981年他来北京开会时，特意到《新观察》杂志社，看望我这个当年他的崇拜者。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地交谈。这时我已经是人到中年，年龄比当年的鲁藜先生还大，自然也没有了往日的冲动，但是说起少年时代的往事，我的心中依然有着美好的情愫，只是经过艰难岁月的冲刷，多少增加了一些人生的苦涩。这倒并非是真正的成熟，而是品格上溶进了泥土的本色——平实，无论看人度事，都比早年更实际更慎重了。

送走鲁藜先生以后，我认真地想了想当年的事：这政治运动竟是这么神奇，在政治家手里就如魔术布袋，没有的事可变来，有的事又可变走，照这样的做法折腾平民百姓，我们怎么能有安定的日子过呢？就拿我受鲁

藜先生牵连的事说吧，那会儿明明不存在的事，却非要像真的似的往有里整，这会儿我真的跟鲁藜先生坐在一起，反而相安无事没有了挨整的危险，可见“实事求是”精神的真正贯彻，对于国家和个人命运的重要。

鲁藜先生逝世后，林希特意打来电话，告诉我这个悲痛消息。在痛悼老诗人的同时，那些几十年前不愉快的事情，又自然而然地袭上我的心头。我忽然觉得鲁藜先生的《泥土》，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，你看呵，他幼年在外国生活，为了追求革命回到祖国，他这粒真诚的种子，撒在了他热爱的泥土上。当他满怀激情迎来曙光，本可以在祖国大地上，长成一棵无忧的树木，却被人为地培植成“苦难草”。幸好他没有视自己为珍珠，而一直把自己当做泥土，这样也就少去了被埋没的痛苦。所以在复出后，他依然激情满怀，讴歌新时代的生活。

1999年5月8日